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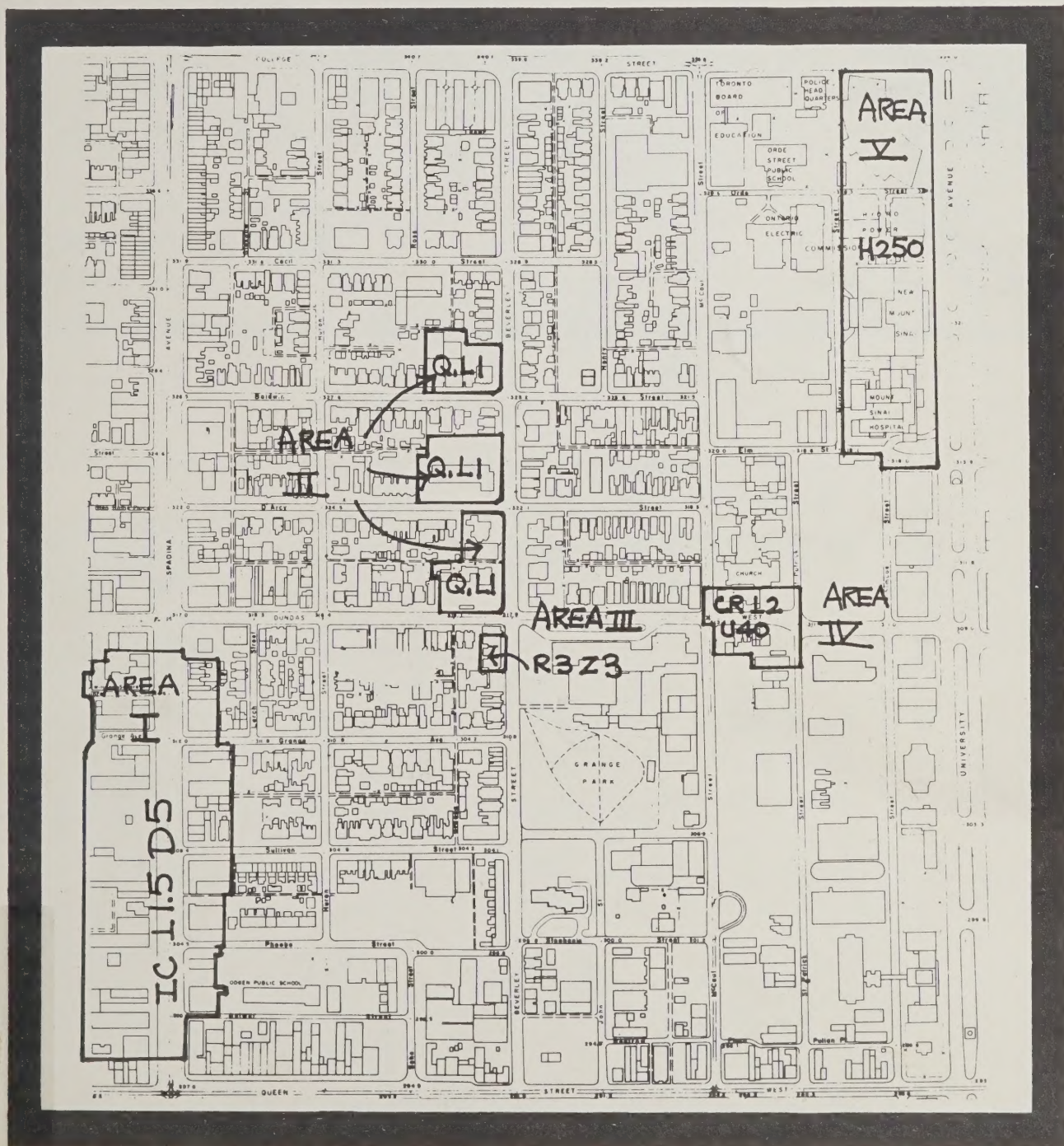
海外述林

月刊

THE CROSSROADS monthly

Vol. 1 No. 4

EAST SPADINA PART II PLANNING STUDY



士巴單拿東南區第二部份計劃圖則

余柏

097.1

no.4
77:Apr.)
JADA_HK

設計局、引導會、新華埠

那些人可以申請加拿大公民權 (入籍) 請準備來加留學的人士注意!



PARK AVENUE ACADEMY



- ★ 安省政府教育部和加拿大移民和人力部承認的私立中學
- ★ 一九七七年九月新學期開始接受入學申請

*Application for the Fall term of 1977 begins now,
please write to us for further
details or call 961-2753.

180 Bloor Street West
5th Floor
Toronto, Ontario
M5S 2V6

協助學生申請留學護照

三國演義
三國志演義
三國人物與故事
儒林外史
老殘遊記
西遊記
徐霞客遊記
前漢演義
後漢演義
東周列國誌
鏡花緣
全清詞鈔
全清詞鈔
小說詞語滙釋
詩詞曲語辭滙釋
國學十二講
毛詩正義
先秦文學史參考資料
兩漢文學史參考資料
魏晉南北朝文學史參考資料
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
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

思雅書舍 提高閣下閱讀水平的地方

加拿大多倫多市登打士西街
二〇五號二樓C座
電話：598-0296

列寧全集（共三十九冊／人民出版社）
辭海（合訂本／中華書局）
遠東英漢五用辭典（梁實秋主編／遠東圖書公司）
最新實用漢英辭典（梁實秋主編／遠東圖書公司）
通用新字典（商務印書館）
梅蘭菊竹畫法大全（香港萬里書店）
花鳥畫法大全（香港萬里書店）
怎樣畫工筆花鳥畫（宏圖出版社）
芥子園畫傳（巢勳臨本／全）
一百二十回的水滸（上中下三冊）

紅樓夢八十回校本（四冊／中華書局）
潔本紅樓夢（茅盾叙訂／香港學林出版社）
一百二十回的水滸（羅貫中纂修／三冊／商務）
水滸（二冊／中華書局）
「水滸」評論集（學習與批判叢書／文學出版社）
水滸新談（雙翼著／萬源圖書公司）
梁山與梁山英雄（雙翼／萬源圖書公司）
紅樓夢（四冊／中華書局）
唐詩三百首（清陳婉俊補註／香港商務印書館）
大亨小傳（費滋傑羅著／喬志高譯）

元明清文學作品選讀（香港進修出版社）
中國古典文學小叢書（盒裝十冊／香港進修出版社）
古代散文選讀（樊茹選注／中華書局）
先秦散文選註（羅根澤編／香港中流出版社）
魏晉南北朝散文選註（陳中凡選／香港新月）

歡迎郵購

海外述林目錄

CONTENTS

館獻文港加
Canada-Hong Kong Resource Centre
1 Spadina Crescent, Rm. 111 • Toronto, Canada • M5S 1A1



第一卷第四期 (總第四期)

Vol. 1 No. 4 April, 1977

1977年4月號

Written by Liang Chi-Chao.
English Translation by Lee
Wai-man and Frank Moy

本刊資料室	4	設計局、引導會、新華埠 Planning Office, Steering Committee and New Chinatown
本刊採訪組	5	訪問城市建設計劃部城設計員羅嘉齡 Interview with Yvonne Lo, Planning Staff of the City Planning Office
本刊採訪組	7	多倫多市華商會主席溫仲先生訪問紀錄 Interview with William Wen, Chairman of the Chinatown Business Association
多倫多市華埠社區聯合委員會 于仁	8	我們的說話 Our Position: The Grange Community Coalition 安省華僑史彙編之二——多倫多市唐人街的變遷歷史 Chinese Canadian History, Part II: The Changing Face of Toronto's Chinatown
本刊採訪組	9	訪問黃伯濤實業公司黃伯濤先生 Interview with Steve Wong of Steve Wong Real Estate
滿地可·郭唯理	10	退縮中的滿地可唐人街 The Shrinking Montreal Chinatown
七劃生	11	請準備來加留學的人士注意! Foreign Students Intending to Stay in Canada Please Take Note!
本刊記者 仁	13	禁假日營業的影響 The Effects of the Sunday Closing Law on Chinatown 誰是加國總理最佳人選? Who Is The Ideal Choice As Prime Minister of Canada?
于天	14	加幣的價值 The Value of the Canadian Dollar
何海生	15	民生與經濟 (長篇連載之四) Peoples' Livelihood and Economics (Fourth in a series)
李安納	17	中華會館: 它的創設因由和功能 The Chinese Benevolent Association: Its Origin and Functions
方生 向東 金帛 二丁	21	四度時空: 滯結 Four Dimensions: Congestion 「民意大會」裏的「民意代表」 The 'representatives of public opinion' 旅 Travel 送友人——復憶三年前一往事 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a Valediction
中文傳譯諮詢處	23	那些人可以申請加拿大公民權 (入籍) Who is Eligible to Apply for Canadian Citizenship
中文傳譯諮詢處	24	如何申請安省政府廉租屋宇 How to Apply for Ontario Government Housing
關自守	25	〈按圖索驥〉簡介 Man Without a Map 東歐電影文化之西漸 The Westward Movement of the Film Culture of Eastern Europe
方生	26	北美洲華僑史 (長篇連載之四)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North America (Fourth in a series)
梁啟超	27	琴 A HARP
端木蕻良	29	露天酒吧 (詩) Open Air Bar
阮志雄		我是白馬王子 (詩) I Am The Prince On A White Horse
癭石		「白毛女」…………… 一齣現代革命舞劇 White Haired Girl
本刊資料室	30	
香港·李萬	31	香港風光——小花園觀棋記 Watching A Chess Game in Petite Garden
方生	32	醜女之戀 A Love Affair of an Unattractive Woman
香港·李萬	33	陶朱公 (電視劇本) Tau Chu Kung (Script for Television)
關自守	35	自嘲自受集——血本無歸 A Chapter on Self Cynicism …………… A Total Loss
	36	編者的話 A Few Words from the Editor
	38	Interview with Samuel L.C. Yang, Lawyer, Vice-Chairman of the Chinatown Planning Association
	42	Interview with Doug Hum, Co-Chairman of the Grange Community Coalition
	46	Multiculturalism and Education: Are Children the Victims?
	48	Oh Canada! Lament of a Foreign Student
	51	Travels in the New World

編者按： 專題討論和報導華人社區是本刊的特色

。近日多倫多市士巴丹拿東南區（俗稱新華埠；其實，這個稱號名不符實，因該區的範圍頗廣，而居民數目華洋參半。爲了方便起見，在這裏我們也引用「新華埠」的俗稱）引導會發表該區的將來發展初步計劃，隨即引起一片爭論。爭論的焦點包括多倫多市新華埠是否已經出現過度發展的現象？新華埠內是否應有更多的居民以配合區內的發展？目前居住在區內的居民會否因爲人口密度過高而帶來的交通擠迫、道路安全、區內公共設備不足而感到不便？在新華埠建築大量栢文是否便可以解決屋荒？而該區目前是否有屋荒的現象出現？華埠發展蓬勃對華人的社會地位是否有助呢？所謂華埠發展是怎麼樣的一種發展呢？這一連串的問題均是每一位關心華人社區的人所欲解答的。本刊就這些問題走訪了各有關方面的人士，並且接到有關團體發出的立場書，文件等等。以下是他們的意見和來信，讀者可從中找出一些爭論的輪廓，因而得出一些結論。本刊歡迎各僑胞來信討論。

設計局、引導會、新華埠

本刊資料室

按多倫多「市區建設計劃局」在七二年後定出的分區設計方法，多市市中心區被劃分成八個分區，「舊華埠」的發展問題是屬於「市中心區」（Downtown）的建設計劃員所料理，而「新華埠」區則屬「士巴丹拿東南區」（South-East Spadina）的建設計劃員所料理，最近發生問題的是「新華埠」區，因爲「士巴丹拿東南區」計劃員預備向「市區建設計劃局」建議除將該區的純商業樓宇可建面積減低一倍半外，並保留登打西街至皇后西街的一段士巴丹拿街作「輕工業兼商業混合用途」，而不是按一九七五年四月九日所通過的地方方法作：「低密度住宅樓宇，工業兼商業混合用途」，因該區沒有足夠的輔助設施如學校及公園等以支持更多家庭住宅單位。

多市「市區建設計劃局」在一九六九年通過了一個有關多市市中心區土地利用的「第一部官方計劃」，市區設計到七二年，在市長龔比的促使下進入「第二部」的設計，主要爲穩定市中心區各區的居住人數，但「第二部計劃」一共草擬了五年，至今尚未完成，據消息：多市市議會希望能在六月暑假休會前能討論「第二部市區建設的建議書」。

在市區設計方面，設計員的提議與商戶及發展商的希望，往往是有出入的，所以在八個分區中，皆各成立了一名爲「引導委員會」的組織，該會的工作是將計劃員對該區的設計建議，通知該區區內的各方面人士，進行討論，而收集他們對發展建議的提議，修訂計劃員所作出原本計劃，然後再開會與各有關方面人士商量，但「市區計劃局」不一定完全接受分區設計員所提出的建設提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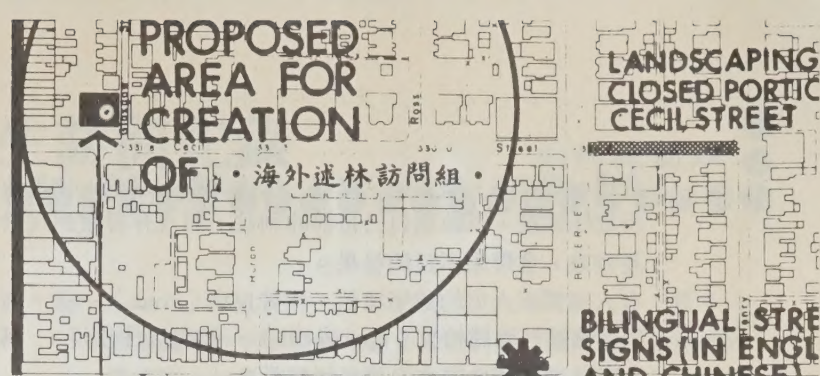
目前出問題的一截士巴丹拿街按七五年四月九日的地方方法是准許興建低密度住宅樓宇的，但這「方便」在新建議中「消失」了，七四年的地方方法批准在是段士巴丹拿西邊，可建地盤面積兩倍的住宅樓宇，或地盤面積五倍的工業用樓，或兩倍半的非住宅用樓，而在是段士巴丹拿東邊則可建地盤面積兩倍半住宅樓宇，或地盤面積五倍的工業用樓，或非住宅用樓。當時地方方法的內文表示：希望這種劃分能配合華人和區的需求，但却特別指出登打西街以南的一段士巴丹拿街有工業的存在。

在一九七五年八月公佈的「西華埠土地利用分配建議初步報告書」中，計劃員曾提出「新（西）華埠」的高度化商業發展帶來的問題包括：居住樓宇減少；有特點及歷史價值的樓宇被拆除，影響加濶登打西街提議；使附近橫街的交通，泊車及服務性工作大出問題。



訪問城市建設計劃部區域設計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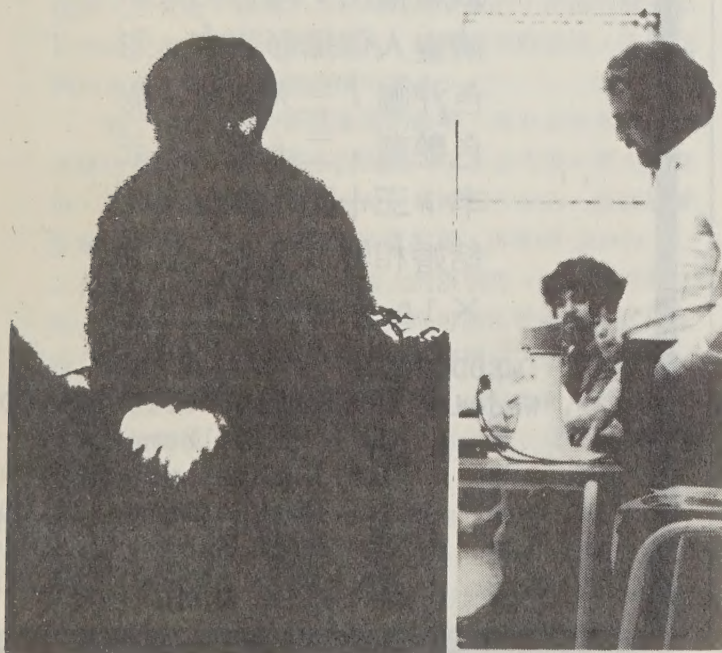
羅慕齡 (Ms. Yvonne Lo)



問：可否簡單的介紹一下城市建設計劃部（City of Toronto Planning Board）？可能有許多人由於對你們的認識不足而有誤會。

答：我們屬於市政府（City Council）的部門之一。以前，市政府的城市計劃方案，未有民衆參與意見。一九七二年市長Crombie上任，認為對於城市的今後發展，要重視採納民意，因此就成立了好幾個城市計劃分區辦事處，作地區性研究（area Study），徵詢民意，將居民的需求寫成報告書呈上市政府核准。

本來，政府打算在本區（指由University至Spadina Ave.，College St.的南面）建設公共機構，例如在Beverley及Baldwin之間建立高層水電站（Hydro.），沒有照顧到居民的利益；同時，發展商（developer）亦看中了 McCaul 與St. Patrick 一帶，將舊樓拆去，預備建設高層樓宇。在一九七二年，我們動手寫一份基本建設計劃報告書，將居民的願望及意見反映給市政府，希望選擇更適合的地點實行這些建築計劃，同時亦跟發展商接洽磋商。當時，我們可以說是頗受民衆的支持。當年十一月第一次開民意大會，有二、三百人出席，其中不乏中國人。我們的初步計劃，得到一致性的支持。出席會議的人士，贊同成立一個特別委員會，以進行詳細討論，於是，士巴單拿東南區引導會（South East Spadina Steering Committee）於一九七三年一月成立，該會歡迎本區居民、業主及商人參加。以後，每隔兩星期定期舉行會議。



問：請你解釋一下你們跟引導會的關係，以及引導會的情形，特別是開會的情形。

答：引導會的組成，沒有固定的成員，在決議時亦沒有按照正式的民主程序（例如提議，附議，舉手通過等），而是視乎一致的意見（consensus），由於一般人對參予公眾活動（participation）比較生疏，而且對改善居民環境的意義認識不夠，所以反應頗冷淡。將意見呈上市政府，要有正式的公文，由我們計劃局代做，此外許多行政的工作，例如寫會議紀錄，印發文件等等，我們都提供了服務。其實，我們不應該有太多的額外工作負擔，因為我們是直接向市政府負責的一個部門，而不是引導會僱用的人員。引導會的獻議（recommendation）並非全盤接受寫入報告書，最後的決定是由市政府作出。

問：既然向來參加引導會的民意大會反應冷淡，為什麼三月二日在 University Settlement 開會討論第二部份（Part II）計劃的民意大會時反應那麼熱烈，甚至是過激的情形？

答：因為對於住宅區環境的改善，商人的興趣不大，常常業務過忙，沒有參加。至於上兩次討論到沿士巴丹拿（Spadina）由書院街（College）到皇后街（Queen）一段的工商混合發展，關係到不少資本家的業務發展及利潤所得，誠如一位先生所說「火燒到肉」的情形，因此，發展成工商混合區，抑或高密度的大廈區，是個敏感的題目。所以，當晚很多人情緒激動，秩序混亂，甚至對翻譯有刁難的情形。如果大家在開會時能保持冷靜和理智，尊重對方的意見，困難可以慢慢解決，辦起事來也容易些。

問：那晚有頗多在座者對引導會表示不滿，請問引起這情形的爭論中心是甚麼？

答：目前，住宅居民、商人及業主對我們有不同的要求；我們要兼顧雙方的利益，往往很難兩全其美。站在業主及商人的立場上看，最好是實行放任政策，沒有任何限制，自由競爭。但是，過度的發展，會造成人口密度劇增，樓宇價格上漲，嚴重的影響到許多勞苦大眾（working class）的生活質素（living quality）。這樣造出唐人街繁榮的表面，是否可以算是一種良好的現象呢？

目前新唐人街的發展，已引起了頗多居民的不滿情緒，有人投訴餐館的垃圾臭味，亦有居民感到泊車困難，車輛威脅到兒童的安全。即使對商人來說，也未必完全有利的。目前在新唐人街有些新落成的商用樓宇，由於舖租過貴，不適合做小本生意的商人投資，所以仍是空着，有些商號亦因新唐人街發展過速而不能維持下去。如果目前商人興建高層樓宇，今後難以保證沒有惡果。藉多開餐館，多做生意，使華埠繁榮昌盛，具有吸引力，祇是利於一部份商人。

發展一個社區，須要顧全整體，按步就班的達成，如果執行放任政策，祇顧到自己目前的利益，而沒有考慮到大眾及將來，會帶來不良的後果。

問：有人認為唐人街的建築陳舊，像貧民窟 (slum) 一樣，應該讓建築商改建柏文 (apartment)，改善居住環境，為什麼你們不讓他們大刀濶斧地進行？

答：我認為說是貧民窟，是言過其實。在一九七二年，建築視察員 (building inspector) 跟我們作過調查，認為這些房屋的建設結構 (building structure) 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狀況良好。如果在表面上覺得陳舊，加以刷新的話，要業主自己願意才行。安省政府亦有房屋翻新的計劃 (指 Ontario Home Renewal Programme)，居民若須要，可以向政府申請貸款，在結構上翻新一下。可是這個計劃目前仍未大量推行，因為手續上頗麻煩，而且承建商 (contractor) 都不願意做這些細微的工夫。

興建廉租高層大廈 (cheap rental high-rises)，若管理不善，亦會造成居住環境上的問題。因此，這個提議並不能有效地解決辦法。至於有人認為多倫多有許多學生及單身工人 (working singles)，可以建築單人的柏文。這類建築在大學附近都有。我們認為固定的人口因素是以家庭為單位，要保持華埠經濟的穩定，就須首先重視這部份的社會成員。至於較高尚的住宅；是否有很多人在入息上有足夠的能力或願意付出高昂的租金遷入，却是個問題的。

問：政府有沒有建築廉價住宅，照顧入息較低微的或上了年紀的人？

答：有。在歐格斯特士 (Augustus) 建的高齡市民住屋 (Senior Citizens Housing)，每月祇須付九十多元。目前市區非牟利房屋置業公司 (City Non-Profit Housing Corporation) 在水電站舊址處進行翻新及建築四層柏文計劃，可以容納一百五十三個單位，入息低微的人士可以申請，祇須付出薪金的四份之一。

問：有人提到華埠商業發展會威脅到工廠遷址及工人的生活。請問本區的工廠是否應予保留？

答：去年五月我們調查了四十九間工廠，其中針織業 (needle trade) 佔一半以上。以前，人們有一種錯覺，以為工廠應設在郊區。最近，我們寫了一份報告書呈上市政府，認為這些輕工業應予保留。這些工廠的工人大部份住在鄰近，如果將工廠遷到郊區，工廠及工人都感到不方便。在一個社區內有點輕工業，是個理想的情形，我們希望不是清一色地發展商業，或住宅，或公共機關；而是有商業，學校，住宅，輕工業，公園等等的平衡發展。

問：目前在唐人街餐館林立，請問你們在權力上或責任上有否加以干涉或鼓勵？

答：我們對商業性樓宇祇能從建築使用面積等方面加以管制，至於作何用途，並不是我們權力範圍內所考慮的。商人呈上購買樓宇的申請，我們祇能依地區性制律 (zoning by-law) 來處理，商業發展成怎樣的地方特色，是依照自由選擇及自由競爭的原則進行。至於由於餐館過多，不少人週末駛車到唐人街飲茶或吃飯，造成泊車困難，是我們面對

的重大問題之一。在唐人街附近泊車的規例不能設太多。目前的一個解決辦法是建築多層停車場，我們現在正在與 Toronto Parking Authority 接洽，但仍未達成協議。

問：回到那晚民意大會的情形，請問當時有一位先生代表了二十多個團體向你們質詢為甚麼接不到開會通知，請問你們怎樣解釋呢？在溝通民情 (communication) 上，你們受到很多責難，可否講述一下？

答：在通知上，我們已盡了所能。由於經費有限，不能做到很全面。自士巴丹拿東南區引導會成立以來，公開的民意大會已有三十多次，因此，對許多社團來說，不能算是陌生。我們在快報及醒華發表過新聞稿作通知，我們亦有人沿門挨戶地派發通知及通訊，所以，指責我們的人士，最好先瞭解一下我們的苦衷。至於該位先生提到的團體，許多都超出了我們管轄的範圍。某些團體會址可能更改，或人事上有所調動，因而接不到我們的通知。當然，如果有可以改善的地方，我們會盡力而為。

問：最後，我們想知道新唐人街在蓬勃發展，會否影響到舊唐人街的衰落？

答：在舊唐人街亦有新的發展。你可以看到一些近兩年來剛建成的樓宇，也可以看到將會有不少舊屋翻新。目前一直有商家希望在舊唐人街處經營生意，有申請書交來。至於有一些店舖會受威脅的情形，亦實有其情，不過，新唐人街的發展對舊唐人街大致上影響不大，至少不會造成舊唐人街衰落的情形。

華麗攝影

Maria Photography
499 College St. Tor.
967-0791

最新推出，本世紀最新
油畫人像攝影放大，彩
色沖曬，三天起貨，彩
色艷麗，二十張 六元
半，三十張 九元半，
結婚相特價全套六款 8
× 10 只收七十五元。

WEDDING..

72.	Wedding Story Photos..\$	179.00
8	x 10 With Album	
12.	8 x 10 With Album	129.00
24.	8 x 10 With Album	225.00
36.	8 x 10 With Album	315.00
72.	8 x 10 With Album	599.00

● 多倫多華商會主席溫仲先生訪問紀錄

本刊採訪組

按：溫仲先生是華商會的主席。本刊訪問祇代表他個人的意見。

問：請問溫先生對目前士巴丹拿東南區工商區域的劃分，有什麼意見？

答：最好，我們先從多倫多唐人街發展的歷史來看待這問題。從整個歷史來看，華埠人口從稀疏到眾多，市政府由保守走向開明進步。以前華埠在 York St., Richmond St. 以及皇后街 Queen St. 附近，一直由依利莎白街 Elizabeth St. 向北移向登打士街 Dundas St. 成爲一個 S 型的華埠中心。後來政府徵購皇后街 Queen St. 依利莎白街 Elizabeth St. 南段及華埠的一半樓宇，以 tax assessment 爲基礎，向業主分期償還，造成華人資本家的重大損失，要買回同樣地價的樓宇或重新經營同樣的商業是沒有可能的。在華人不願意的情形下徵用房屋，可以說是「強徵」。同樣情形下，市政府亦向其他地方徵購，例如加潤馬路、建立政府行政的建築物等等，均引起市民的不滿。後來由一些比較開明的議員建議和合理的要求下，政府遂尊重民意而通過了一條議案，規定凡政府徵用的任何物業，必須根據市值作適當的處理，例如一屋換一屋（house to house）。法例雖然保障了業主的起碼權益，然而對華埠的商業發展却不起保障，若果業主在某些財團的高價利誘下，隨時會將物業出售，使華埠的發展蒙受到損害。例如假日酒店 Holiday Inn（在依利莎白街 Elizabeth St. 及栗子街 Chestnut St.）向業主收購。（過去華人多將勞苦所得的錢寄回國，又由於移民例的限制，因此財力上較薄弱，業主不及西人多。）市政府曾將登打士街 Dundas St. 南邊，從卑街 Bay St. 一直到栗子街 Chestnut St. 立案作爲市政廳擴展用的特別地區 special area for City Hall Expansion，迫使華埠無發展之餘地。在1964年有保留華埠的運動，千餘人到市政廳開會，發言人有省和市的議員，都表示同情華人的處境，這條不合理的法案才取消。從這些歷史事件來看，華人一直是受到損害，迫使向政府就範，所以我們以後再不容許有同樣的情形發生。

到了1968年由於香港暴動的影響，有不少資本家將資本轉移至北美，多倫多亦因而流入了不少外資。華人的資金，須要有個發展的地方。目前華埠在市中心，北面是醫院地帶，東面 Yonge St. 的地價甚高，再東的 Jarvis St. 不合理想，因此在發展上有很大的限制性。目前華埠兩邊的士巴丹拿 Spadina Ave 發展的可能性最高。我認爲應該「物盡其用，地盡其利」，起高層樓宇可以減輕費用，從而減低租價。而目前的重新劃分（rezoning）限制了樓宇的使用面積，是對華人不公平之處，會令我們將來無發展之餘地。

問：關於外資流入及發展過速，你的看法如何？

答：對於外資的問題，我們感到很矛盾。一方面我們覺得外資在發展上有需要，表示歡迎，另一方面我們擔心外資會將本地的商業擠垮。當地華僑固有的利益，我們亦需要保護。目前新唐人街的發展過速，已造成樓宇空置的問題，而

商業競爭性也很嚴重，過多同行同業，而租金及維持費亦非常高。如果繼續在士巴丹拿以目前速率發展下去，問題會更惡化。如果地下作商場（mall），樓上做住宅，那麼，這些住宅每月租金非四、五百元不可，誰能住得起呢？除非是入息高的專業人員（professionals），目前的發展情形，會令地價過高（over price），要不是財雄勢厚，怎能站得住腳？其實，外來的投資不一定在唐人街，可以向其他地方發展，我們華商會有商業輔導組，介紹各種不同行業的投資。據我所知，近三、四年來華埠的物業已超過正常價值三四倍以上，而擁有這些物業的資金來源大部份是流資或間接由流資支持。目前的華埠商業，有供過於求的現象，但對於將來的發展，我們亦須有筆資金，所以，外資流入對我們的利害關係來說是很矛盾的。

問：對輕工業的發展，你有什麼意見？

答：有人認爲輕工業受擠迫遷出而使許多人失業或轉行，是不成理由的，因爲這些工廠做工的許多工人並不住在附近，有很多住在 Riverdale 或其他地方搭車返工。住在華埠附近而在工廠做工的則不見得多。相反地，他們大多數是在華埠的商界內工作。至於有空裕的工廠大廈很多。由於過去數年來華埠的物業被一些財團或流資的搶購，價值反常地上昇，正如我上面所回答過的情形，因此影響到廠家的業主待價而沽，加上目前的工廠大都是超齡的，或者不符合現代工廠的設備條件，他們早已打算另覓理想的工業區遷移。在價錢上他們是很化算的。所以，認爲商業排擠工業，那是絕對不成理由。

問：你認爲目前市政府應讓華埠怎樣發展？

答：我認爲目前所加的制限太多，原來七倍的祇能起作五倍，原來兩倍的祇能起作倍半。這個限制，對將來的發展有很大的妨碍。目前的情形，當然是過度發展，適度的限制，仍是應該有的，不然益了財雄勢厚的外來資本，而本地，尤其是小資本的商業，根本沒有可能跟大財團競爭，試問，那一位本地的僑商能拿出資本來貼補利息或其他費用？更不須要談到改建或重建所需的偌大資金了。本地的僑商，很明顯地是被排擠或淘汰了。目前有些小資本的就在 Broadview 與 Gerrard 之間做生意或置業，就是這個原因。因此，我本人認爲一方面須要顧及整體，另一方面要放眼將來，不要再加限制，維持現狀，是比較合理的。暫時的現狀，加以合理的引導，我們須維持下去，至於將來發展如何，我們不能預料。

以過去華埠歷史作爲基礎來研究未來華埠的發展是最重要的。我們必須向市政府發展部作備忘錄的建議，要在目前以登打士街爲主，南北發展。在未來的華埠很可能逐漸向那些接近登打士街的橫街小巷發展，這是有可能的趨勢。當然，這些未來的問題我們會逐漸地向市政發展局去討論或爭取的。歷史的事實，給予我們的啓示是：必須團結一致去爭取合理的權利，否則，華埠的範圍會越來越縮小，或被迫他遷，屆時受害的人又是華僑。

我們的說話——

多倫多華埠社區聯合委員會

一個社區是否完善，視乎區內的建設是否符合居民的需要。區內的人口密度，工商業的比例，學校，公共場所，泊車間和行人安全等等均足以影響居民的生活環境。使這些基本的生活條件得以實現，不僅是政府有關部門的責任，區內居民的積極參與，亦成為不可缺少的因素。「城市建設計劃部」的士巴丹拿東南區計劃第二部份正是政府和該區居民經過五年多的商討和研究後，才製訂出來的計劃，它反映了該區居民維護自己生活環境的基本意向。

士巴丹拿東南區的人口數目約在八千名左右，其中華洋人口數目參半，根據一九七一年該區的人口統計數字顯示，區內百分之四十三的居民為華人，百分之卅六是英裔加入，餘下的則包括有葡萄牙裔、法裔、德裔和烏克蘭裔加入等。居住在士巴丹拿東南區的華人大部份是在隣近工商業區工作的人仕，大商人只是由於生意範圍才留在區內，他們一般居住在北部人口密度較低的住宅區，對於由於人口密度過高而產生的種種不利

便，他們不會體會。再者，華人大商家僅佔士巴丹拿東南區華人人口的絕少部份。

基於上述了解，「華埠社區聯合委員會」就士巴丹拿東南區「計劃第二部份」的問題上採取如下的立場：

(一)「計劃第二部份」主要是以維護此區居民生活環境為考慮，以他們的利益為依歸，基於這點，本聯合委員會對「計劃第二部份」予以原則性的支持，並繼續鼓勵本區居民對此項計劃發表積極的意見。

(二)「計劃第二部份」並非如一些華人地產商及業主所指責的，是一個對華人社會有着直接打擊的計劃書。把「計劃第二部份」描繪成是「摧毀」華埠，更是誇大其辭，無中生有的說法。我們認為，倘若有人把此事宣揚為「華洋之爭」則顯然是別有用心之歪曲。事實上，「計劃第二部份」對在華埠居住及經營小型商業的華人，只會是起着保護的作用。

(三)在士巴丹拿東南區範圍的華人地產商既是組成士巴丹拿東南區的成員之一，但他們絕非是區內的唯一代表。本聯合委員會反對任何人口裏說「保衛華埠」實則為了保障其個人的利益。

(四)由於大商家的反對，「計劃第二部份」有被轉變成為專為大商家服務的危機。我們對此表示反對。我們支持現存在東南士巴丹拿區的計劃過程。本聯合委員會基於士巴丹拿東南區的大多數居民利益，將堅決與有關方面爭取到底。 ■

安省華僑史之二

多倫多市唐人街的嬗變歷史

· 于仁 ·

編者按：多倫多市的唐人街可以說是北美洲東岸，除了紐約市的之外最大的唐人街。其近年來的急遽發展，更使它的面貌煥然一新，但這還是本世紀七十年代開始以後的事。本世紀初期，它的原來面目又是怎樣的呢？相信很多旅居在多倫多市，新一輩的移民是有興趣的。因此，我們在這裏輯錄了一篇有關早期多倫多市唐人街歷史的文章，俾大家了解它的歷史嬗變經過。

按多倫多「市區建設計劃局」的「西華埠土地利用分配建議初步報告書」稱：華僑是於一九〇〇年初抵多倫多聚居的，他們最先的居處是 King 與 Queen 之間，在 University Ave 以東地區，即現時 York 街與 Richmond 及 Adelaide 的交界地方，華人初期的生意是以餐館及洗衣店為主。按照一項資料，到一九一六年時，在該處聚居的僑胞已有二千人左右（參看附圖）。

到一九二〇年時，多市因要發展市中心區，僑胞聚居地被逼沿 York 街北遷至 Queen 街以北地區。York 街在 Queen 以南的一段的「華埠」被「發展」了。

在一九三〇年，華僑聚居的地方已伸展至伊利莎白街及登打西街一截，按「西華埠」報告稱：當時亦有一些華僑遷居至 Centre 及栗子街去。一九二〇年至五〇年，「舊」華埠的雛形開始確定，但到五〇年末期到六〇年初期，多市政府決定在 Bay 與 Centre 街之間，Queen 以北 Hagerman 以南的地區，興建新大會堂，而徵收土地，華僑的店舖被逼北遷集中地在伊利莎白街北段及登打西街（Bay 與 University 之間一截）發展。

新大會堂（市政府大樓）在一九六四年建成，「用」了半個華埠的土地，加國歧視華人移民的法例，在一九四七年被取消，大量新移民及舊僑民的親屬一起擁至，礙於「舊」華埠地區狹小，不少僑胞東遷至 Broadview 區，西遷至 University 以西的地方居住及經營生意，但大體而言，華埠的商業中心仍然留在 Bay 與 Centre 街之間的一段登打西街 及伊利莎白與栗子街內。

在六〇年至七〇年間，大部份華僑居住及營商的地方，似乎是以 University 來劃分，以東的一段登打西街為商業區，以西的一帶橫街為住宅區，在這區中間也有些華商家庭式的店舖。

市政府在六九年曾一度企圖將登打西街南面加闊四十五呎，這建議如被執行，即表示將該段街道南面的華商店舖「消滅」了，在華商大力反對下，政府終於將這建議暫時擱置，但這個威脅是仍然存在的。

「新」華埠的發展是在七〇年開始，由七四年至今發展的速度一直沒有鬆懈，發展範圍起初只集中在比利華街與士巴丹拿街間的一段登打西街，這段街道的兩傍已發展得八八九九，但在發展這段街道的同時，有不少華商開始在 College 與 Queen 之間的一段士巴丹拿街的兩旁發展，也有一些在附近的一段 Queen 街置業，所以「新華埠」所涉及的範圍是頗為廣闊的。 ■

訪問黃伯濤實業有限公司

黃伯濤先生

◀海外述林採訪組▶

問：請問黃先生，對於目前士巴丹拿東南區城市的計劃引導會（Steering Committee）的意見怎樣？

答：導引會中的職員幹事，沒有一個是由本區華人正式選派的中國人做代表，因此常常忽視了中國人的利益，而且在作風上不夠民主，在開會那晚（指三月二日）我有舉手，得到主席的許可，可是輪到我發言時，主席以太夜為理由宣佈散會，而在座的不少民衆願意繼續開會。所以，我認為導引的幹事中應有華人，同時作風亦要較民主；如果大家都認為建一倍好，那麼就一倍，但如果僅是導引會主席的意見，就過於專橫。史巴勞（Sparrow）提出民意大會沒有表決的必要，我認為這樣做沒有把多數人的意見加以重視。其中一位發言的曾小姐代表四十多個工人，認為要保留工業，她的意見雖是片面之辭，似是而非，但亦有發言的機會。目前還沒有人能代表工業界發言，沒有理由阻止中國人參與籌劃。我不是偏幫贊同發展的一方面，我的意思是因為華人佔區內人口絕大多數，華人意見應受尊重，華人利益應受照顧。

問：請問黃先生對目前本區保留工業的意見怎樣？

答：工業產品多是出口，工業無須在大城市中心發展，而商業若不依賴於人口則無以繼續生存。我是從事地產業的，感到士巴丹拿有許多空置的工業樓宇都非常陳舊，可以說是功用已廢（functional obsolete）。要發展工業須有現代化的機械設備，而本區沒有能力做到。那晚開會時，曾小姐提到華人工友失業，要照顧及解決，我認為她應該調查一下本區鄰近有沒有工業樓宇空置着。不僅是Spadina，在Wellington, Adelaide 一帶有許多工業區，在Bathurst與King之間有Alliance 工業大廈，空出百分之五十五。由於地價高，工業不適宜在市中心；即使是建築商願意建工廠大廈，廠方亦因地價高而不願買或租貴而不願租，結果造成損失。

問：請你對目前華埠發展發表點意見。

答：一九七〇年以來，不少華人商家自香港、台灣等東南亞地方到多倫多投資；因為需求量大，地價上漲。須知華人做生意仍以華人為主要對象，有很大的限度；原因是：①對外市場不明瞭，②跟本地西人的商家沒有接觸（contact）。餐館、雜貨、海鮮等小本生意，當然祇是適合在華埠開張。自一九七二年至今為止，新唐人街的租金幾乎漲了三倍。由於本區之發展有限，因此有一部份在東華埠發展，如Danforth Broadview一帶。一般華人喜歡聚居在一起，尤其是上了年紀，不諳英語的人。如果離開唐人街太遠的地方居住，便感到大大的不方便，故此還是選擇了唐人街。目前唐人街許多住屋年久失修，不符理想。而Spadina一帶的地價很高，限制太大，舊樓又須付出一筆可觀的數目重建或裝修，才能符合今日的用途。如果在建築上限制太大，勢必造成租金極昂，無人過問。如建屋投資不合化算，就沒有人來投資，即使房屋倒塌，亦不會重建；於是，樓宇不僅不增加，反而會減少，屆時無屋可租，區內亦漸見荒蕪。因此，我感到目前政府的「土地用途及面積再劃分」的計劃（rezoning）會帶來不良後果。

問：你是否認為目前華埠人口過密？

答：目前本區人口約八千，但沒有根據說是到了飽和點。至於交通擠迫，找不到泊車位的問題，是一直存在的，並不限於華埠。即使不讓華埠發展下去，亦不能藉之解決。

問：目前有餐館宣佈破產，請問是否說明華埠過度發展？

答：餐館破產的原因很多，不能歸咎於華埠過於發展及同行同業太多。我認為應考慮到：①由於整個加拿大經濟體系的衰退，②由於本身質素不好，或管理不妥善。商業應幾乎自由競爭，成行成市。你看看 Yonge St. 不是一樣嗎？商業要吸引人，就是成行成市才行。

問：據聞從前香港有個投資的集團，想在 Shuter St. 興建新華埠，後來結果是怎樣？

答：據我所聽聞，那個地方本是住宅區。重新劃為商業區的要求，不獲市政府通過。而且在 Yonge St. 以東的建築很零落，有教堂、酒吧、停車場、政府樓宇等等，不很理想。

問：你認為如果政府實行放任自由的政策，會不會有大魚吃小魚的情形？

答：首先要解釋的是：大魚吃小魚是商業競爭中免不了的現象，有之亦不足為怪。然而亦不是肯定的。由於這裏人工高，做大生意的要雇用很多人，而小行業發展成家庭的，無須支付人工，反而站得住腳，因此，有以小壓大的可能性。

問：你目前認為市政府應該讓華埠發展？

答：住宅區居民的密度仍不很高，在日落時士巴丹拿街有一段沒有行人，因此該處應有適量的住宅、商店等，有普通廉價的 condominium 也好。至於發展成為怎樣的程度，也沒有研究過，但依目前的情況看來，仍是不夠的。一些成功的商號，要擴張營業，須要有新的地段。限制建築會減少使用面積而增加租金，間接地影響了顧客（consumer，例如起價）。市政府最重要的是尊重民意，讓區內佔大多數成員的華人有機會加入導引委員會作委員。在目前這方面顯然還未做好。



本刊由第三期起新闢「安省華僑史」一欄，追述華人在安省的歷史。由於編者見聞有限，閱歷不多，歡迎安省各地僑胞惠賜稿件。此外，有關的資料、掌故、軼聞、圖片、文件等均一律歡迎。借出物刊登後定必送還。請與我們聯絡，謝謝。

我們的電話是：416-598-0296



去年十一月十二日，一個名為「關心滿地可前途公民委員會」(Commission on the Future of Montreal) 在一次公開會議裏指出滿地可的唐人街是目前加拿大各地唯一衰退中的唐人街。該委員會進一步地認為「滿地可市的心臟地區正在陷於住宅區轉為灰色商業區的急遽改變的痛苦掙扎中」，而唐人街受的打擊却是最大的。新的城市發展帶來的壓力使原來聚居在區內的居民遷移至市內各地去，滿地可的唐人街形成於上世紀的六十年代，有着多於百年的歷史進展。但是，到了本世紀的四十年代，據非官方的統計數字顯示，當時滿地可祇有七十個華人家庭；在一九七三年末，華人家庭在該市的數目增至四千個，人口約有三萬之眾，而居住在唐人街範圍內的却祇有一千人左右。

「關心滿地可前途公民委員會」的說話並非無所指。較早時候，另一個名為「滿地可拯亡」(Save Montreal) 的市民團體曾經呼籲政府停止興建座落在唐人街的佳花利歐大樓 (Guy Favreau complex)，據該工程計劃的經理利碧克(R.A. Leblanc) 說，建築工事原定於去年十月開始。佳花利歐大樓是聯邦政府打算把設在滿地可的個別辦公部門集中在一起。根據一九七五年的預算是二億四百萬元加幣，佔地大概二十八萬平方尺，包括位於當車士打大道 (Dorchester Boulevard)，聖歐賓街 (St. Urbain Street)，占美士 (Jeanne Mance) 和拉哥車天里街 (Lagauchetiere St.) 的範圍。過去的三四年來，區內屬於唐人街的屋宇亦逐漸被拆除。位於當車士打街和仙尼滙交界的德化連公園 (Dufferin Park) ——區內唯一的公園——最近亦被改為停車場。在計劃興建佳花利歐大樓的範圍內，目前還有八幢樓宇屹立着，這包括滿地可唐人街的三座教堂。其中之一是在拉哥車天里街和仙尼滙角的華人天主教堂。該堂建於一八三五年，最初是一間由蘇格蘭宗團主義者 (Scottish Secessionist) 主持的教會的所屬物，並且是滿地可市由基督教徒興建歷史最悠久的教堂。雖然該建築物一度被聯邦政府沒收，並且限令所有佔用者必需於去年十月遷離。利碧克說將會保存華人天主堂，而隔鄰的學校將成為地盤的辦公室。

另一教堂的擁有者，滿地可中華基督教長老會 (Chinese Presbyterian Church) 的陳保羅牧師在去年五月三十一日在「滿地可拯亡」委員會的會議上指責政府出賣對該市唐人街作過的諾言。他指出：

(一) 政府曾經許下諾言重建長老會的教堂，結果却撥款不足；教會方面曾經依循法律途徑，要求政府實現承諾。法院判教會得值，而政府却在上訴時贏得原狀。華人長老會沒有足夠的金錢向最高法院申訴。

(二) 政府允許給與唐人街土地，結果是滿地可市府提出把唐人街的土地租賃給教會，租期為六十三年，每年繳費一萬元，期滿後，土地歸滿地可市府所有，而教會將一無所得。

(三) 在新教堂建築沒有完工之前，保證不會停止教會的宗教聚會。可是去年初，佳花利歐大樓建築工程的經理人却通知教堂必須在短期內搬出。後來在教會的力爭下，才把搬遷延至去年十月。

聯邦政府和市政府單方面把唐人街迫離原有的地區，並沒有順利地完成。去年八月廿日，魁北克省的文化事務部長尚保羅·拉利亞 (Jean-Paul L'Allier) 宣佈計劃把唐人街四座樓宇列入歷史勝蹟的名單內，包括上述有着二百四十四年歷史的華人天主教堂。這計劃一經接納後，佳花利歐大樓的建築工事可能得到無限期的擱淺。根據該省的文化產物條例 (Cultural Property Act)，魁北克政府對任何歷史陳跡點內五百呎範圍擁有完全的控制權。任何人在決定拆除、裝修或改建該歷史建築物之前三十天，必需通知部長。

正如多倫多市舊唐人街的商人一樣，滿地可唐人街的華商在獲知唐人街的樓宇將被政府收回，作為建築佳花利歐大樓之用後，便考慮向東遷移，搬到距離有數個街位的聖羅倫士大道 (St. Lawrence Boulevard) 和聖多明尼加 (St. Dominique) 去。儘管已如上述，聯邦政府已允許該教堂保留在佳花利歐大樓的範圍內。天主教堂的鄧多默神父 (音譯 Thomas Tan) 也考慮搬離該區，滿地可唐人街會否成為歷史名詞，華人的表現似不若「滿地可拯亡委員會」來得積極，何解？

加費！加費！

在一片漲價聲中，一直以來均被公眾認為與社會沒有多大直接關係的大學亦遭波及，儘管口稱自己是超凡入聖的大學生主觀地不願受社會的事物影響，可是如今卻在通貨膨脹，物價高昇的踐踏下，成為經濟惡性循環打擊最大的受害者。過去的一年間，除了魁北克省外，全加拿大各地均調整了大專院校的學費。其中受波動最深的要算是外來學生。

去年，阿畢打省的大專學院、大學和工業專門學校的收費增長了百分之二十至一倍半不等。阿省政府決定了每年花在大專教育補助費的增長率將不超過百分之十一。新的跡象顯示，下一學年度（一九七七年至一九七八年）該省大專院校將再度增收學費。鄰省曼尼吐巴的大學在去年則平均增加了百分之九的學費，而個別學系作出了更大幅度的增高收費。以牙醫學院為例，前年的收費為五百五十元，去年則高昇至七百元，即是說加了百分之二十七的學費。

在加東大西洋海岸的紐賓士域，省政府決議把教育經費作大量的削減後，紐賓士域大學當局在譴責政府的同時，宣佈了把學費提高一成。去年暑假期間，安省的大專和大學事務部長皮納先生亦宣稱要增收外來學生的費用達三倍之多，並且根據一九七五年年來發表的麥基安——韓德遜報告（McKeon-Henderson Report），在今年至明年間，把本地生的收費提高百分之六十五。勞華·史高詩亞（Nova Scotia）省的教育部也要該地大學的收費「標準化」，將它的收費增加到全國收費最昂的達好事大學（Dalhousie University）的水平。一九七四年，一個名為皇家委員會建議該校，縱使它的學生名額可能降低百分之三十，也要把學費增收二倍半之多。

在紐芬蘭，愛德華皇子島，沙氏革全雲和卑詩省的大學就讀的學生同樣地付出較往年為多的費用。魁北克是唯一例外的省份，大專學生仍然繳納如往常一樣的學費額。

本地學生

為甚麼近年來大學生一直面臨着極大的經濟壓力呢？最主要的原因當然是因為教育經費短絀。政府早在數年前便已宣佈目前的數年內將為經濟「緊縮時期」，並且着手削減對教育、衛生和福利部門的開支。鑑於政府撥款支助之不足，大專院校不得不把收入的來源轉移至學生的身上。

雖然大學的收費劃一，並不以家庭背景，種族或性別的不同而另自收費，可是，受影響最大的還是來自貧窮家庭的學生吧。據不同的調查顯示，在各大學裏，學生大部份是來自中等和高等入息家庭。一九七一年，加拿大教育部諮商委員會發出的柏茲尼尼報告（Peltchinis Report）指出約有一半加拿大人的年薪是少過五千元的；而在大學裏，祇有四份一的學生人數是來自這個階層的家庭。受薪階級所繳納的稅在全國的稅收中佔了失常的比例。在一九七六年至一九七七年的經濟年度裏，透過個人入息稅和零售稅的徵收，受薪階級繳納的稅額總數高出大公司繳付的四倍之多。大部份受薪階級的子弟們均沒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可是他們卻繳納較有錢人更多的稅額來支助自己享受不着的教育機構。

上面的一些統計數字顯示的事實是：加拿大的大專教育出現着越來越替有錢子弟服務的趨勢。

外國學生

其實這個名稱是指由外國來加就讀並在畢業後回到原居地的外來生，其英文稱謂是 International Student 而非 Foreign Student。蓋有心人則故意混淆移民學生和外來生的分別，我們在下面再作解釋。

在安大略省，每年大約有一萬一千多名外來生在各學院內攻讀，佔了全省大學生的人數百份之五。在多倫多大學，近年外來生的數額大概為二千名左右，為該大學的學生總數百份之四。

去年五月四日，安省學院和大學事務部部長哈利·皮納博士宣佈外來生的學費將要加至每年一千五百元；即是說，增加了差不多三倍之多。由本年一月起，初抵加拿大留學的外來生將依照新的分類收費方法繳交學費。直至一九八〇年一月時為止那些已經在安省各大學內就讀的外來生則不受此新的收費方法影響，除非該生在這期間完成修讀目前的學位，而繼續進修下去。

決定的不公平

很多人都抱着一個錯誤的觀念，認為安省部份大學決定對外來生施行分類收費的制度並非首創，其它國家亦有雷同的收費方法。其實目前除了加拿大和愛爾蘭共和國的一些大專院校外，世界上沒有任何其它國家對外來生採取分類的收費方法的。一般人也許錯誤地認為英國和美國的教育機構，也像安省部份的大學一樣，將學生分為外國學生和本地學生，並且各自有不同的繳費項目。事實並非如此，最近英國才取消了向外國學生施行分類的收費方法。至於美國，外來生到某一州的大學就讀，所繳納的學費是較該州公民的為高，這祇不過是由於他來自州以外的地方，並非是原來居住在該州的人。根據這個方法，來自其它州份的學生與來自外國的學生繳納的費用無異，都是要繳納高出於原居在該州的學生們所付的費用。由於美國聯邦政府在教育經費上給與各州的支助不多，因此；來自州以外的學生是要負擔更多的費用。目前加拿大聯邦政府是與各省府平担教育經費的。美國政府對外國留學生從來沒有採用過分類的收費方法。

加費的「理由」

在宣佈要加收外來生學費的時候，皮納先生提出了兩點基本理由來支持這決議：

- （一）在過去數年間，安省的納稅人越來越關心自己的稅款用於外籍大專生的教育上。
- （二）其它的國家，包括英國和美國均實行分類收費制。

常被問及如何察覺「公眾越來越關心」的時候，皮納並未能引用具體的例子來引證他的論調，並且從此絕口不提第一點「理由」。一個由安省溫沙大學中國學生會主持的「反對加學費特別委員會」在一封公開信裏反駁皮納先生的第一點時指出它不過是藉口吧了。「反加會」引述去年六月三日出版的多倫多大學學生報（Varsity）的報導，在一九七三年至七四年的學年裏，安省一萬八百四十名外來生每人平均在安省花費了三千元加幣，較諸政府資助每名學生約二千九百四十元還多出了六十元；即是說，單就那年，安省政府便從大學生身上進賬了六十五萬元。

無論如何，安省納稅人的金錢開支是值得關心的。可是連皮納自己也承認要外來生多付學費亦祇能替安省的納稅人慳回目前安大略省大專教育預算款項千份之六，即是慳回安省納稅人每人平均少於一元的金錢數目。

故意歪曲

從上面的論據看來，明顯地，支持分類收費制的理由是不能夠成立的。但是，它的推出卻並非毫無因由。最主要還是由於近年來，安省各地的人對少數民族子弟們「佔」去了專業學院的學位一事表示不滿。儘管這些人明知有色人種子弟們大都是移民或土生，在安省的法律上是平等的，而這些學生的家長們也如其它安省居民一樣繳納稅項，爲了維持白人在專業領域內的優勢，便有意地歪曲移民子弟，給公眾製造出一個錯誤的觀念，以爲他們是外來生。上文提到的名詞 Foreign Student，其實便有此用意。

甘受壓榨和短視

筆者曾經就分類收費制和數位持學生護照香港來的學生談

論過這件事。他們大多數是採取無異議的態度，認爲既然「寄人籬下」，到別人的地方來求學，人家要怎樣便怎樣好了。這種論調，看來似是而非。其實，加拿大學生到世界各地留學的很多，別國政府（除了愛爾蘭外）並沒有要求他們多付學費。在歐洲留學的加拿大學生，部份更可以享受當地的免費大學教育。

安省教育部宣告對外來生採取分類收費的制度後，有關團體的反應不一。安省七間大學的中國同學會除了在多倫多市開了一日討論會，在大學的學生報登了一封公開信後便不再見有任何其它行動了。例外的是溫沙大學的中國同學會，他們成立了一個「反對加學費特別委員會」外，並且積極透過各種媒介和活動來宣揚自己的觀點，更發起一個簽名請願運動來向校方爭取平等。

其它華籍學生對加學費和分類收費制採取漠視的冷淡態度是可以被理解的。持學生護照的留學生，部份因爲自己已經身在加國，祇要在一九八〇年前畢業而又不打算繼續進修，則分類收費制對他們是沒有影响的。那些進了研究院的學生，也許對申請研究金，助學金已摸熟門徑，就是繼續讀下去，經濟來源是不成問題的。更自私的一種心態則是部份持着物以罕爲貴看法的留學生，他們認爲分類收費制當然使部份有意留學的人，由於不能付出這筆龐大費用而裹足不前，在香港的留學生數目自然減少，他們回港找工作，甚而將來在社會爬升的機會因而大增。至於屬於公民或移民身份的華人學生，由於沒有直接切身之痛，認爲更無關心他人之必要了。

筆者希望那些暗地裏沾沾自喜或漠不關心的人不要過度高興，分類收費制也許目前對閣下沒有多大影响，但有誰肯定在申請來加留學的名單上沒有閣下相熟的親朋戚友呢？

黃伯濤實業公司

STEVE WONG REAL ESTATE LTD.

443 DUNDAS ST. W. TOR.

869-1650

買賣地產
物業投資
樓宇管理

樓宇估值
大小按揭
代理出租

地產週報

免費贈閱

迎迎迎迎迎

今年一月一日開始在安大略省生效的「零售生意假日法例」，對華埠店舖的影響將達那一個程度，目前尚難斷定。這法例是在去年一月一日通過的，規定大部份商店，在週末（星期六及星期日），必須停業一天，好使大部份的工作人士，能於同一天內共渡假期，硬性規定必須在週日休息的觀念是否正確，仍是頗具爭論性的。

在一月間，多市警方曾對若干華埠店舖作口頭的通知，表示他們如按當時的方法經營實屬違例，而會被檢控，後來在華商及第六區議員要求下，警方曾一度承諾會暫緩執行這法例，直至市政局屋宇及發展委員會作出更明確的「旅遊豁免區」為止。但在三月十日警方突改變主意，而表示要在十三日開始執行這法例，警方的理由是：多市總檢察長命令他們必須也在華埠內執行這法例，因為華埠鄰近地區的商店也依照華埠內的「違例」商店在週日營業，而警方是不能厚此薄彼地執行職務的。

「零售生意假日」法例並不是完全禁止所有店舖在假日中經營，按該法例的第三條款稱，共有七類零售商店是免受管制的。屬此種類的店舖，根本不需政府什麼特別豁免，已可在假日中營業。但華埠內的店舖，有不少是包含着數行生意的，所以為免犯官非，皆被「逼」在假日中停業了，獲法例豁免的店舖如下：

第一類是零售食物、報章、期刊、烟草、古董或手工藝品的店舖，這些店舖必須在二千四百呎面積以下，而在假日營業時，店內不得超過三人。

第二類是菜房，而店內工作人員不得超過四人。

第三類是汽油站及車房，育花室及花園工具舖、鮮菓蔬菜店。

第四類是在週六已休息的商店，但在週日營業時店內不得超過七人，而使用的面積不得超過五千呎。

第五類是獲得特許的賣酒地方，旅遊地方，或與宗教有關的零售及服務店舖。

第六類是設在教育，消遣及娛樂地點內的食物或物品零售攤檔。

第七類是餐館酒樓，旅館酒店，洗衣及其他使用硬幣的服務地方，租賃汽車及船隻，和修理汽車及船隻的地方。

華商目前極為希望政府能將新舊華埠區列作「旅遊豁免區」，因為如是「旅遊豁免區」，所有在區內的店舖均一律獲准在假日經營，而不需要逐一地作個別的申請，在另一方面華商亦正在要求政府增添可營業店舖的範圍，加入禮品店，服裝店，皮革店，旅行社，中菜舖，影相館，花店，五金店，美容院及美髮店等。

就「零售生意假日法例」，第六區市議會鄧協及史巴勞曾在一封公開書信中表示：他們公認對多倫多及附近地方的華人社會而言，星期天是社交上重要的日子，所以一些華埠餐館及商店是有照常營業的必要，但維護僱員權利方面，工會則極希望大部份工作人士盡可能於同一天內休息了。而住在華埠鄰近住宅街道的居民，亦可於假日免受交通及泊車煩惱困擾。

他們皆反對放寬可獲豁免管制的商店的種類，他們謂：如果所有商店都可每週營業七天，大規模的商店，因有能力僱用職員輪流上班，小型及家庭式經營的商店反而會蒙受損失。

在這法例被執行後，最感不便的要算那些住在華埠以外，而只靠假日到華埠購物的僑胞，他們實需重新習慣別一購物方式，而避免只在週日才到華埠去購買食物及家常用品了，因為開工的店舖礙於法例，只能用三名工作人員，今後實在不敷應付大量的顧客的。

誰是加國總理最佳人選？

· 仁 ·

大部份加拿大人對自由黨黨魁杜魯多似乎仍頗具信心，根據今年二月份的蓋洛普民意調查指出，每五名加國人士中，有三人認為杜魯多較進步保守黨黨魁賈克更具才能，這可能是加國人士在遇上前所未有的困難（魁北克省的執政政黨為一鼓吹獨立的派系）時，皆希望能由一個有經驗的人士掌舵。

該調查指出：被訪問者的百份之四十三是支持杜魯多的，支持賈克的只有百份之三十，支持其他人士的佔百份之四，另有百份之廿三不作選擇，在去年十月，蓋洛普曾作一次同樣性質的調查，當時「魁北克人黨」尚未取得魁省的政權，賈克以獲得百份之卅六人士的支持而領先，杜魯多只得百份之廿八，其他人士佔百份之九，不作選擇的佔百份之廿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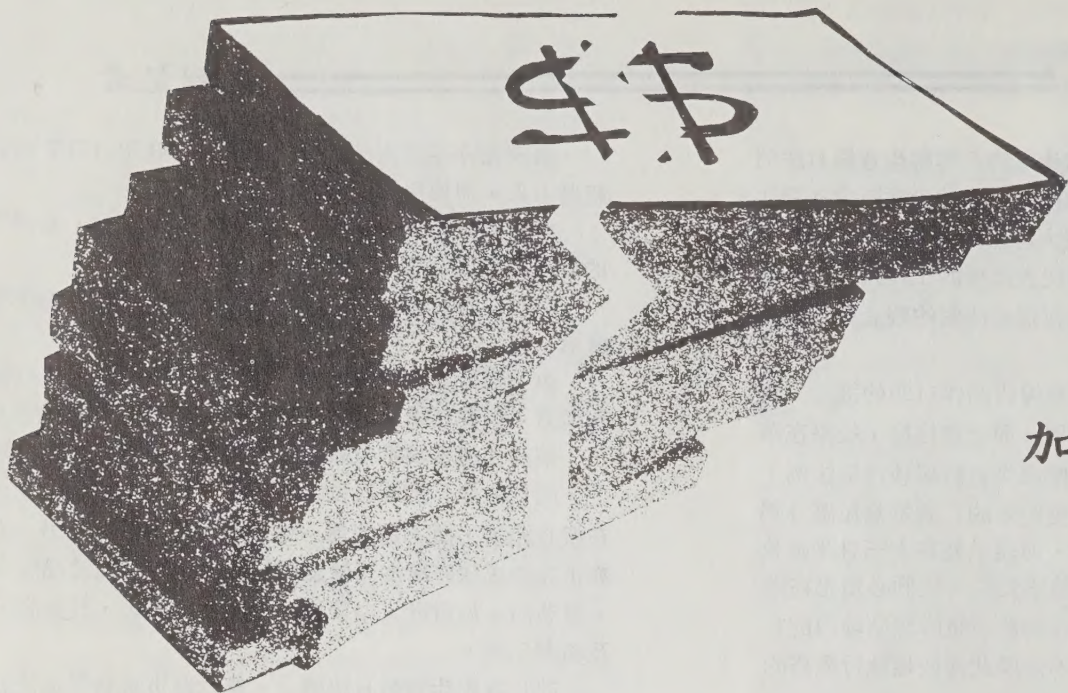
這次意見調查是在杜魯多向美國國會發表演說前搜集的，所以不可能謂國民是受了他那次極為成功的演說所感染，在魁北克省，百份之五十五的被訪問者支持杜魯多，百份之十六支持賈克；在安大略省百份之四十四支持杜魯多，百份之廿九支持賈克。

以下是這次意見調查的詳細結果：

	支持 杜魯多	支持 賈克	支持 其他人士	不作選擇
大 西 洋 省 份	29%	45%	3%	23%
魁 北 克 省	55%	16%	5%	24%
安 大 略 省	44%	29%	5%	22%
草 原 省 份	33%	39%	3%	24%
英屬哥倫比亞省	31%	40%	7%	23%
總 數	43%	30%	4%	23%

蓋洛普民意調查的準確程度為：百份比的差距不會超過百份之四，廿次調查中準確率達十九次，接受這次調查的樣本為一千〇卅五名超過十八歲的人士，而皆是用面對面的直接查詢方式。

根據別一項蓋洛普民意調查，自由黨在三月份的受歡迎程度已由二月份的百份之卅五，增加至百份之四十一，而進步保守黨的受歡迎度則由百份之四十五，跌至百份之卅七，結束該黨年多來一直帶先的優勢。



加幣的價值

· 于天 ·

去年初華埠各商店及酒樓餐廳的收銀機上，皆放上或貼上一張臨時製成的小「聲明」：美金補水，每元三仙。東主當時必定認為：如按慣例以美元當加幣收數，而不需顧客補水，不但不能顯示出加幣的「升值」，同時實在是與自己的荷包過不去呢！如他們希望這現象是長期性的，而特別為「補水問題」做一個醒目的小膠牌，這將是他們的「小損失」了，因為加幣較美元偏高實只是一「怪現象」，而在最近的將來勢難再會出現。

說加幣高於美元為「怪現象」一點沒有過份，主要因為加國的經濟是極度依賴美國的經濟，如加幣高於美元將會直接影響及加國的出口，況且加國的產品，早已因生產力日減而缺乏競爭力，製造商及出口商是最不能接受加幣不自然地偏高的一羣。加幣畸形地兌美元升值，可能增加了入口商及一般消費者的購買力，但對加國整個經濟而言，是害多於利。

加幣去年的「升值」不是來自它本身的實力，而是因金融市場對加幣需求增加而已，造成這種暫時性大量需求的原因一方面是加國各銀行當時的利率較其他地方為高，所以引來若干游資，這些希望賺取利息的外資在進入加國時，需要兌換為加元，所以增加了加元的需求量，另一方面，加國聯邦及省政府在海外金融市場借貸，在去年加國這兩階層政府一共在海外借了八十億美元，這數目佔了美國及歐洲金融市場貸出的款項之半數，這筆龐大借款在取回加國應用時，是要兌換為加幣，而更增加了加幣的需求。這兩點是直接做成加幣偏高「怪現象」的最主要原因。

紐約 Oppenheimer & Co. INC. 的經濟專家 Martin Pomp 在去年底曾表示：加幣的價值每元只相等於八角六仙至九角二仙美元，他這聲明使加國的經濟專家嘩然，並一致批評他言過其實。但在二月尾，加國 Bank of Nova Scotia 的副總裁 Robert Mac Intosh 亦作了一類似聲明。他說：加國今年的國民總收入將不可能達到官方估計的百份之四點五至五之間，而只可以達到百份之二，他並且表示：加幣兌美元的差距每元將

可能達到十仙之分別，而在今年內兩種貨幣的差距將在八仙範圍左右。

直接導致近月來加幣暴跌的主要原因是魁北克省局勢的不安定，去年十一月十五日當「魁北克人黨」上台隨後的十五天間，加幣兌換美幣的差距，每元一度跌至六個仙，這跌勢逼使「加拿大銀行」（加國的中央銀行）放出了八億〇二百九十萬美元的儲備金，才把跌勢遏止着，當加幣在十二月及一月間回升後，「加拿大銀行」雖然取回了七億三千八百六十美元的儲備，但對比下，一共損失了六千四百卅萬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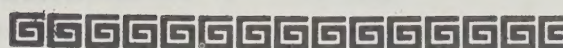
在一月卅一日時，加幣每元可兌換九角八點二三仙美金，但到二月廿八日時，每加元又跌至只值九角五點〇八仙美元，加國中央銀行在二月份用了四億〇二百五十萬美元儲備去支持加幣。這種情形今後仍會繼續的，在加幣價值一起一跌中，不少因恐慌而拋售加幣的一般市民，往往中了「貨幣炒家」的圈套。

加幣疲弱無力是不容否認的事實，在加國銀行一再減利息以刺激國內投資後，不少存放在加國銀行內套息的游資開始大批外遷，加上聯邦政府及省政府縮減外貸，金融市場上的加幣需求大跌，另一方面由於魁北克省的局面引至人心惶惶，加國出口表現軟弱及西部穀麥可能會因天旱而減產等因素，加幣要反彈回過往的水平，在短期內是件頗難成功的事，一般市民最忌的是跟風拋售加元，因為這是頗為危險的玩意。

海外述林發行全加拿大

美國 香港 英國

廣告效力最大



第四章：發展民生的道路：民主？專政？

不少落後國家的經濟發展，停滯不前；亦不少曾一度高度發展的國家，面臨經濟倒退的現象。這到底是什麼緣故？是不是無可避免的呢？

經濟停滯或衰退當然不會是人民的願望。毛澤東說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按道理說，人們都應有促進經濟發展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既然如此，大家都期望和願意致力達成的經濟美景，何以不能實現？

問題關鍵在於：人與人之間有利益衝突和互相抗衡束縛的現象。當經濟發展的動力因摩擦而受到了障礙，停滯和不景氣就必定會到來。

一個例證

讓我們試看附圖。我們假設一個國家可以行兩種不同的社會制度。在第一個社會制度之下，A是剝削階級，B是被剝削階級。圖表內的數字代表A和B每年收入的增長。由於A是剝削階級，不論彼此決策如何，A的收入增益總是高於B的。我們假設，這國家要達致全國收益增長的最高額，A應採取A1，B應採取B1。可是，因為不論A的決策如何，B採取B2總會對自己有利，B便自然會選擇B2。在這情況下，A將選擇A2，結果全國收益只能增加八百萬元。我們清楚地看到，假如A和B達成協議，互相信任的話，A1和B1的選擇將會對雙方都有利。①

在A和B兩個階級的敵對性不能消除，因而在決策上不能達到協議的時候，這個國家的經濟便遲滯不前，個人平均收益就隨着人口增長而下降。

假如這國家的制度發生了根本的變化，A和B改變了剝削的階級關係，他們彼此決策的關係假定變成如表內右下角顯示的情況。這個時候，互不信任的結果仍會把經濟增長拖慢。但無論如何，生產力已比前大大提高了（下面將會說明）。在這樣的國家裏，互助合作、彼此信賴的教育仍是需要的。反過來，如果國內的人民仍是以自己的集團利益為主，不顧整體利益，結果會選擇了A2和B2，國民收益的增長只得一千二百萬元。在這情況下，一個精明能幹的領導或可強制A1和B1的政策，從而把全國收益的增加提升至二千萬元。舉例來說，星加坡是接近階級對立下的專政；中國則接近階級比較平等的一黨專政。

		不公平權益下，A的決策		平等權益下，A的決策	
不公平權益下，B的決策	A	A1	A2	A1	A2
	B1	11 8(A) 3(B)	9 9(A) 0(B)		
平等權益下，B的決策	B1			20 10(A) 10(B)	15 15(A) 0(B)
	B2	9 5(A) 4(B)	8 6(A) 2(B)	15 0(A) 15(B)	12 6(A) 6(B)

附圖：某國的國民收入增益表。數字以百萬元為單位。每方格左上邊是A和B收入增加的總和。

經濟發展的過程

人是經濟發展的原動力。這是關係民生發展的最重要法則。

過去，一些學者以為經濟發展是一個機械的過程，只要有大量資金的投入，加上科技的革新，經濟就自然會「起飛」。從以往的發展經濟來看，事實並不如此。非洲的加納自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五年，每年實際投資百分之十或以上的國民所得（這比 Rostow ②要求的百分之十，多出一倍），卻不見得有什麼成績。自一九六四年至一九六九年，加納的個人平均收入事實上反而降低了！如果落後國家在發展中缺乏的關鍵因素（The Missing Factor）是資金，為什麼一些產油國家，聚積了大量資本，仍不能「經濟起飛」？另一個流行的假設是：入息低的人不會主動地把部份收入用作投資。這說法也是不正確的。事實上，在有利投資的條件下，即使收入很低的人的投資額也可以大大提高。日本早期的發展就在很大的程度上，依靠小規模的傳統式工業和農業。

既然經濟發展的原動力來自人，民生發展搞不上去主要因為人的因素未能盡量發揮：不平等的社會制度和人際關係，把人本來具有的創造力和積極性壓抑了。近二、三百年來科技和學術得以空前飛躍，反映了社會關係的改變，和人類創造力的解放。

在封建社會和殖民地經濟裏，多數人民被統治階層和地主貴族壓迫，生活艱苦，然而生產力的提高對他們卻往往沒有好處，創造力和積極性因而埋沒了。

現代高度工業化的國家，過去都是在擺脫了封建社會的枷鎖和國民經濟獨立自主的情況下，才發展起來的。

第一個進行工業革命的英國，直至十四、十五世紀，仍是相當封閉、自給自足的農奴經濟，對外對內的貿易都不活躍。十二、十三世紀，由於歐洲大陸佛蘭德地區發展了毛織業，開始從英國大量輸入羊毛，英國的貿易才漸趨蓬勃。這刺激了新興城市，促進了國內的商品貿易。隨着商業的勃起，貨幣形式的地租取代了勞役形式的地租，農奴便開始獲得了人身自由。這些「佃冊農」（Copyholder）得到了若干權利的承認。這是

生產力和創造力獲得解放的第一步。商業的興盛容許了分工和大規模的製作，刺激了工業的發展，新的技術和社會關係隨着創造力的解放和利潤的刺激而出現了。

可是，英國資產階級的興起實際上象徵着新的剝削階級的出現。新興的階級加緊了對外的掠奪和對內的新形式的剝削。英國的經濟發展損害了別的國家，也損害了數以萬計在國內極苛刻環境下工作的童工、女工，和廣大的勞動人民。這個時期的英國社會的不平等和不人道，在狄更斯、蕭伯納等人的作品中，得到了充份的揭露。

英國的發展經驗並不值得欣羨。愛格·奧文斯（Edgar Owens）和羅拔·蕭（Robert Shaw）指出^③，英國在印度支持了一系列對農民剝削的富豪，加強了當地統治階層對人民的剝削。那種名叫沙民打里（Zamindari）的土地制度，在印度獨立時雖然已告取消，但是遺留下來的殘餘作風仍阻礙着印度農業的發展。

由此可見，全面的經濟發展只有在人的積極性和創造力不受束縛的條件下才能成功。要是只有小部份的人獲得解放，其餘的人仍受剝削的話，發展只能是局部的。農奴制轉化到資本主義制，只解放了小部份人的創造力，已足以造成十八世紀的工業革命，一個具更多參與性的制度（即民主），毫無疑問將會把人的創造力提升至歷史上空前的境地。我們應清楚了解：民主不但不是經濟發展的負累，且是經濟發展的有利條件。

民主的意義

多年來受西方文化影響極大的我們，往往以為容許不同政黨存在、實行公開選舉政要、維護言論自由就足以達到民主。可是，一個實現了上述條件的國家可能還是不民主的，或者說只是有形式上的民主，而實質上為小部份的剝削階級服務。

愛格·奧文斯和羅拔·蕭指出，很多殖民地獨立之後，雖然建立了西方民主的政治形式，這形式卻「只不過鞏固和承認了殖民前的權力結構。選舉反映了統治集團的影響力而非人民的意願；成立了的國會組織缺乏實際權力，僅起安全門（Safety Valve）的作用，讓人民吐一些冤氣而不是解決問題。在這些國家裏，民主制度缺乏了一項最重要的特色——選擇。」^④

這些國家，一貫以來由特權階級統治，羣衆多是文盲或教育程度很低的人。加上極大的貧富差距，「民主制度」的變成徒具形式的櫥窗，是很易理解的。

真正的民主足以迅速把人民的積極性提高，有助於發展。這跟櫥窗式的「民主」很不同。若干人仕以為在發展中國家，解決糧食危機是最要緊，「民主」的確立只居次要的地位。更有一些人以為在發展中國家行使「民主」會妨礙生產力的前進。他們都是混淆了「真民主」和「假民主」。

真正的民主有三個內涵，包括了政治、經濟、和社會的民主。目標都是提高每個人的參與性，發揮每個人的潛在創造力。

政治上的民主，指人民有平等參與影響決策的權利。這並非否定國家需要有領導才能和執行決策的專人。政治上的民主要求這些專人必須由人民委任（直接由人民選舉或由人民代表委任）和向人民負責（人民有行使監督的權利）。政治上的民主也要求人民有組織、討論、集會、結社、出版等自由。政治上的民主需要經濟上的民主才能確立。否則，貧富懸殊和財產世襲的情況出現，政治權利就不可能平等。

經濟上的民主，指人民在選擇職業、購物、儲蓄、投資、移居、旅行上有平等的機會。經濟上的民主，一定要在財產不得世襲和教育機會均等的條件下才能實現，而且是和政治上的民主相輔相成的。惟有在政治上民主的情況下，合乎集體利益的法律和制度才能確立，經濟上的民主才不會演變成吃人的局面。

社會的民主，指分工不同，性別不同，宗教信仰、種族、文化背景不同的人在社会上有同等的地位。沒有政治和經濟上的民主，就不可能有社會地位的民主。人民對社會地位的民主的意識不高，也不可能維持經濟和政治上的民主。因此，我們須要一種正義感的羣衆教育。

大家可能已覺察到，一旦社會地位的民主確立，「階級社會」已轉化成「無階級社會」。這有點像共產主義的理想世界。分別是：我這裏說的「無階級社會」裏的人，不是或未必是共產社會的大公無私的人。我不相信無階級社會要等待全人類的「思想覺悟」已變成如此高超才能達到。只要我們從制度上爭取政治和經濟的民主，從思想上進行正義感的羣衆教育，努力爭取社會地位的民主，「無階級社會」就在眼前。

一旦無階級社會來臨，附圖A和B對立的身份已經失去，生產力的解放將更加徹底，專政已無須存在了。

結語

有人說：「歷史常常重演」(History Often Repeats Itself)。毛澤東說：「階級鬥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實際上，階級鬥爭就是歷史重演的原因。本世紀已經有了兩次世界大戰，現在列國仍繼續加強武裝自己。難道人類永遠不懂得吸取教訓的嗎？我看原因就在利益衝突和階級鬥爭。利益衝突導致互不信任，各懷鬼胎的國際關係和勞資關係。要歷史悲劇不再重演，要人類不再重蹈過去的覆轍，唯一的方法就是消滅階級。消滅階級就要確立民主。發展民生有兩條路可走：一是賢明的專政；一是真正的民主。既非民主，又非賢明的專政的國家必會因利益衝突的尖銳化而漸趨沒落。那一個國家行真正的民主，那一個國家的經濟肯定會飛躍的，而且給人類指向光明、和平的道路。

下期預告：

註：

- ① 圖表的數字只供設譬之用，但是，由於利益衝突、互不信任而導致減產或浪費的現象，俯拾即是。如國際間的武裝競賽就是一很好的例子。
- ② W.W. Rostow,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1960.
- ③ Edgar Owens & Robert Shaw, Development Reconsidered, P. 150.
- ④ 同上書，頁151。

其他參考書目

- (一) J. P. Powelson, Institutions of Economic Growth, A Theory of Conflict Manage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1972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二) 社會發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 (三) 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簡史，樊亢等編。人民出版社。1973.
- (四) 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1949.

圖一：一八八四年城市華商呈三藩市中國總領事黃遵憲之函牘。

具稟廣南英商林甲亞省城多利和商民舖戶
 為憂慈日進金銀 奏請設法保護事 切英商林甲亞省城
 多利和商民自通商以來地方日開商工日多現英商貿易舖
 戶約有百十間其藥舖金舖銀舖名舖作業工約計六十
 七千人使國官人向皆厚待華人惟境連美國近年其
 苛刑之罰而通時形爭食之概光緒五年曾王苛例漢案紳
 果人丁稅銀的拾元並征商民等重求金上前陳總領事據
 法辦理後英使英耶太大臣行文英國政府駁辦又任商
 民等控按按察司署審得癘疫例英意去年不科誤
 議院又於今年議之苛例禁止華人前往既在該境者又
 抽丁稅銀拾元并有限禁限貿易工作所屬種種之例諸
 次第施行此外患日迫之大端也華人在該地者向皆安分營生
 通年人亦眾多習染惡其後點點者被者緒幾行往
 通者人魚肉鄉里甚老弱失業者飢寒貧病往轉死溝壑
 周郵者人加以媚賄日多色既敗勢日深禍患此內夏日迫之大
 端也至患日迫甚五時起理推乃必至商工之困絕矣為千
 人謀生之門商民等愚拙不能夙夜惕懼因知所措屬集
 中再三籌議同請社外患必先救濟并例清內憂必先禁絕
 捐款要恩則又必設法中兼金銀以賄賂中情又必設法
 事莊劇以辦理交涉凡此端似皆目前之急務而不揣其
 昧其推商民黃乃基徐金九馮仰澤馬心儒等四人據情
 越赴 台階願懇訓示若者可行若否不能行若否急行
 若否宜從行又或四端之外別有急須舉行之事統求飭傳
 房等遵行而示一切房基等事得進知至解以備諮詢并
 求 批示舉行之大恩俾房基等同告大末次策奉行切
 念商民等不量遠屬美體不獲托庇於 仁宇今在越國據法據情
 分土傷民之義即揮諸門外大獲何裨伏念 大人善民之
 誠多分信任金山戶遠播於今三城地事務咸奉命而和解咸
 聲而而清強者何止一端惟平者已受保護之恩今日敢呼以次
 大能令海國通商民安民困救之使信 邑城之在彼也
 特命 王德堂
 保領事黃大人 衛星和示
 計報詳文例一本
 擬設中英金銀舖戶和
 光緒十年二月

楔子

加拿大域多利市的中華會館（The Chinese Consolidated Benevolent Association）成立於一八八四年。直至一九〇八年中國在渥太華設置領事館時為止，中華會館是代表在加華人的首要組織。開館以來，許多經由該館發出的傳單、告示、書無疑問，研究和整理這些流傳下來的文件是不難發掘出一些政府文件、報紙或是其它英文印刷品沒有刊載過的有關華人社區的早期歷史。「域多利中華會館：它的創設因由和功能」是根據該館的檔案作出研究，向讀者提出的初步報告。

華人移民的開始

當費爾沙河發現金鑛的消息傳到加尼福利亞州後，一位被派至費爾沙區負責勘察，名為亞康（音譯 Ah Hong）的華人在一八五九年五月回到三藩市，向僑胞證實發現金鑛的消息。於是許多華人便收拾行裝，由三藩市從海道出發，向北航行到域多利市，再從陸路去費爾沙河鑛區。部份華人也從加州的砵崙（Portland）、西雅圖（Seattle，一譯舍路）或獲錦（Whatcom）步行至卑詩省的紐威士綿士打（New Westminster，又名二埠），再從二埠乘船溯江而上。到了一八五九年，華人才開始直接從香港來到域多利。據一八六一年三月二十八日出版的英國殖民報（British Colonist）估計，在姊妹殖民地（Sister Colony）的卑詩大陸上，全部猜泥慢（Chinamen，原文如是）的數目總共是二，八七五名。去年（指一八六〇年）夏季，華人的口數目差不多有四千名之衆；由於許多華人害怕嚴冬，在初秋的時候便已回到加州去，其它的人則回歸故里，因此華人的口數目便剩下二，八七五名」。在一八五八年至一八六六年間，一連串的華人社區沿着費爾沙河和它的支流各地

建立起來。華人在施美嘉綿（ Similkameen ），奧根那根（ Okanagan ），界限村（ Boundary country ），古天黎（ Kootenay ）和位於哥倫比亞北區（ Upper Columbia ）的大班（ Big Bend ）等地方集居。加拿大太平洋鐵路的興建吸引了一批新的華人移民從香港湧入卑詩省。一八八〇年，安德魯·安德當黑（ Andrew Onderdonk ），一位投得卑詩區內鐵路工程的承建商，從美國西岸招募了大批曾在美國奧利崗（ Oregon ）州建築北太平洋鐵路和在加州建築南太平洋鐵路的華工。這批華工進入卑詩省後，使華人在該省的人口比率由一八七一年的百份之五增加至一八八一年的百份之八點八（參看表一）。一八八一年全加華人人口的總數是四，三八三名，而居住在卑詩一省的佔了四，三五〇名。一八八五年，據渥太華發表的「皇家華人移民委員會：「報告及提議」的記錄顯示，一八八一年至一八八四年間，差不多接近一萬六千名華人曾經從中國，三藩市或其它地方進入域多利市。

表一：一八八一年至一九六一年加拿大全國和卑詩省華人人
口數目統計表（資料源自加拿大十年一度人口統計處
Decennial Censuses of Canada）。

統計年度	卑詩省 華人人 口數目	佔全省 人口之 比率	全國 華人人 口總數	佔全國 人口之 比例	卑詩省 華人人 口 全加 大華 人人 口
1881	4,350	8,8	4,383	0,1	99,3
1891	8,910	9,1	9,129	0,2	97,6
1901	14,885	8,3	17,312	0,3	86,0
1911	19,568	5,0	27,831	0,4	70,3
1921	23,533	4,5	39,587	0,5	59,5
1931	27,139	3,9	46,519	0,5	58,3
1941	18,619	2,3	34,627	0,3	53,8
1951	15,933	1,4	32,528	0,2	49,0
1961	24,227	1,5	59,197	0,3	41,6

因是之故，一八八四年三月，域市的華裔聯名向當時出任三藩市中國總領事的黃遵憲提出在域市成立一華人團體的申請。該信指出：「（卑詩省）議院又於今年議立苛例，禁止華人前往，既在該地者，又要抽丁稅銀十元」。同信並且提及華人流氓如何欺凌同胞（原文作：邇年人數衆多，習染日惡，其狡黠無賴者，結黨橫行；往往串通番人，魚肉鄉里）。老人，窮苦和失業者飽受飢寒交迫，疾病侵襲之苦，甚至露屍街頭（原文作：其老弱失業者，飢寒貧病，往往轉死溝壑）；娼妓，賭博，巷鬥，打架，恐嚇和勒索事件充斥華人社區（加以娼賭日多，包庇攻擊日滋禍患）（參看圖一）。華裔認為消除西人的壓迫必需爭取撤銷歧視華人的法例；至於解決華區內的動亂，首要的行動是禁止娼妓的存在（咸謂祛外患必先駁除苛例，消內憂，必先禁絕華娼），最有効的解決方法還是在域市組織華人團體和設立領事館。

一八八四年會館訂定的章程和附則

一八八四年八月十八日，城市中華會館遞送了一份英文本的「中華會館章程和附則」到該市的公司註冊處。該章程的中文原本較英文的為詳盡，並且清楚地規劃了會館的組織，權力和功能。會章劃分為兩部份。第一部份包括四條規則，闡明中華會館的宗旨和它的服務性質。舉例來說，第三條規則指出了該會的宗旨：「會館之設，所以聯絡家情，施行善舉，凡解息爭訟，扶助貧病，禁除內患，杜禦外侮，皆會館內應辦之事」。章程的第二部份包括三十七條款，其中十九條是關於選拔和委任幹事，會計和值事；至於界定會館在華人間的糾紛、華洋間的爭執等問題上應該怎樣仲裁的條款亦佔了十二項，餘下的九款則傍及社會福利。第十至第十九條則是章程非常重要的部份

[illegible]

圖二：中華會館勸捐通告

，不僅是由於它表明了會館其中首要的任務，並且說明了中華會館在當時實質上是加拿大境內的中國政府；它擁有立法，仲裁和司法的權力。根據這些細則，中華會館在決定採用任何行動前，必對案件或投訴進行諮詢。章程的第十至第十九條附則如下（按第十條至第十九條附則在章程內原屬「會館辦事章程」部份內的第三條至第十二條）：

十、凡華人被洋人欺凌或毆打或搶劫或欠債各事，自己無力伸理者，其人親到會館投訴或寄信來訴，司事即傳正副董事正值事公議，共伸冤抑。如其人未捐會館底銀兩元者，會館不理。

十一、凡華人被洋人斃命，兇手逃匿者，其親友投訴到館，即集衆公議，助訟費銀二十五元，並懸賞格聲明捉獲兇手定實一等罪後，會館謝花紅銀二百元。如死者未捐會館底銀兩元者，會館不理。

十二、凡華人與華人因錢債鬥毆小事，投訴到館者，集正副董事正值事到會館公同調處，以多數斷曲直。如未捐會館底銀兩元者，會館不理。

十三、凡華人或無故或謀財殺死華人，兇手逃匿者，其親友投訴到館，即集衆公議；如議得死者確實冤屈，即由會館懸賞緝兇，聲明俟定實一等罪後，會館謝花紅二百元，另助恤賞銀二十五元，寄交其家屬收領。如未捐會館底銀兩元者，會館不理。

十四、凡華人被洋人誣陷拿禁監獄者，會館集衆公議，推舉舖戶具保候審，並引薦狀師出審，妥爲伸理。如未捐會館底銀兩元者，會館不理。

十五、凡華人被華人誣陷拿禁監獄者，投訴到館，會館集衆及兩造公議；如議得被禁者，確實冤屈，即由公議調處安息；如不允調處，公衆推舉舖戶取保候審，並代爲伸理。如未捐會館底銀兩元者，會館不理。

十六、凡華人平日積惡爲衆共惡者，倘被洋人或華人拿禁監獄，會館集衆公議，凡董事、值事及各舖戶並會館內之人，皆不許出保；如有違衆私保者，公議將該担保人革出會館；以後遇有事故，會館不理。

十七、凡華人因訛詐搶劫及結黨欺人，至被拿禁監獄，會館集衆公議，凡董事、值事及各舖戶並會館內之人，俱不許出保；如違照第十七條款辦理。

十八、凡華人如有串通番人訛索搶劫欺凌華人者，查有確據，會館集衆公議，稟請地方官拿辦，董事等並到堂質證。

十九、凡會館公議公處及代爲伸理各事件，如有惡黨挾嫌尋會館董事值事報復者，不論大小事務，公衆共力擔當，並稟請總領事及欽差大臣行文英國官員及中國地方官員查拿懲辦。

以上各條款的訂立反映當時華人社區的暴亂和華洋間的不斷衝突，甚而出現華人年輕女子被標參與及在城市進行人口買賣事件。根據章程的第二十七條細則（譯者按：即原章程乙部份的第二十條）：凡有拐販幼女來埠者，有人報知，經衆查確，公衆勒令交出，由會館出水腳送回香港東華醫院，訪交其親屬收領；如查無親屬，即由醫院擇良發配。

除了作爲一個保護和仲裁的機構之外，當年的中華會館並且佈施福利。章程內的第二十二至二十五條附則宣稱會館對「

凡華人六十歲以上無力工作難回中國者，公衆查明確實，即由董事等倡捐船費旋唐」。並且「會館現起太平房（譯者按：指醫院）一所，凡本埠及各埠華人，查實患病無人留養者，報明會館，准其入房居住，不取房租」，又「凡入房養病者，倘或身故，囊無餘積，又無親朋料理，即由董事等倡捐殯葬之費」。

域市中華會館在一八八四年製訂的章程聲明任何華人於是年十月三日之前未能向該館繳納二元籌館費用均無權享受該館的保護、仲裁和福利的措施。

作用和活動

從域市中華會館檔案的記錄中，我們可以粗畧地把它過去的作用和活動分爲四類。第一類的作用包括組織力量來反對歧視華人的苛例和稅收，並且在要求撤銷這些不公平的措施的法律訴訟過程時，籌款打官司。在許多的例子裏，在卑詩省議會裏通過的限制華人法例，經由華人在法庭上爭訟後，均被裁定是違法的。舉例來說，域市的中華會館還保存了該館反對禁止華人聘用西婦的規例。一九一二年，沙士革全雲省的成文法例禁止任何華人、日本人和其它東方人士擁有或主理的餐館、洗衣館與及其它生意雇用白人婦女。一九一三年，沙省政府修改該成文法例，刪除了「日本人和其它東方人士」的字眼，因而使該法例祇是針對華人。到了一九一四年的十一月，中華會館爲了反對這件事，籌了一筆一，一七五元的款項，交與雷振那（Regina）的華人，向該省的首席檢察官請願，要求撤銷該法案。西婦僱傭案終於在一九一九年再度獲得修改。新的法案規定凡是聘用白人婦女或白人女孩子必得持有特別執照；修改後的新法案並沒有聲明祇是使用於華人身上。

另一例子是域市政府明令該市華人住宅區的最低人口密度必須爲每三百八十平方尺一人。由於唐人街的人口密度大，許多人必需擠迫在一間房子內，華人因此被控居住過密的頗多。中華會館有見於此，遂於一八九三年十一月三日召開一次會議，決定採取消極的態度抗議這條針對華人的規例；會議通過了任何華人在警方搜查屋宇時被控居住擠迫而罰款，不得繳納任何款項而應該以坐牢取代；期滿出獄後，中華會館將送與每一位依此決議的華人十元加幣作爲補償。任何不遵守此決議而自動繳付罰款的人，中華會館亦向事主徵收十元以示懲戒。

中華會館的第二種作用是仲裁和維持唐人街內的治安和秩序，它不斷地嘗試使用仲裁的方法來解決華人社區內的小爭訟；就是警方已經插手在其間，該館還設法行使它的權力。根據檔案內其中一份紀錄顯示，何五（音譯，Ho Ng）在賭館內被李洪（音譯，Lee Hung）偷去了錢，事後向警方投案。經過中華會館董事們的調停後，何五接受了李洪五十元的賠賞，並且到警局撤回投訴。

中華會館在生意的往還上也提供見證人的服務，這包括年青女子的買贖活動。舉例來說，葉祥麟（Yip Cheung Lun）把一名叫作亞蘇（Ah So）的女子售與陳禎（Chan Chun）作爲傭婦。在這宗六百元加幣的人身買賣上，中華會館的董事們在賣身契上簽了押。在另一單贖身的事件裏，岑偉（音譯，Sum Wai）付了三百三十元給葉祥麟，贖回一名作岑亞桂（音譯，Sum Ah Kwai）的女子，中華會館的董事們也在贖身契上簽上自己的名字。

中華會館的第三類功能包括賑濟籌款，此項工作不僅替在加國的華人社區服務，它的範圍遠及中國及世界各地的華人社區。古巴人民在一八七〇年至一八九八年為古巴獨立而鬥爭的期間，中華會館曾經捐募了一筆金錢，幫助生活在古巴的華人。一八九五年的革命起義失敗後，西班牙的軍事指揮官，雅厘利安納·尼哥羅（Valeriana Seyler Y Nicolau）在次年製訂一套人口集中制，限制古巴農村的人口，把他們集中到衛戍部隊駐紮的市鎮內，因而使數以千計的人死於疾病，飢饉和凍餒。一八九七年，當時中國駐古巴總領事黎榮耀要求域市中華會館賑濟救災，提出以賣官鬻爵的形式，把五個名譽官職在域市競投籌款。一八九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兩名六品頂戴的官職在加西的唐人社區公開拍賣，其中一位為蔣經可出銀一百五十九元五角競得，另一名則為李鑑濤以一百二十五元取去。一八九

中華醫院興建於一八八五年，座落於域多利的夏勞街（Herald Street）。該醫院的前身名為太平房，一八九五年，中華會館把太平房拆掉重建，並改名中華醫院。會館並於哥沙尼灣（Gonzales Bay）和麥尼爾灣（Mcneill Bay）之間則哈寧岬角（Harling Point）置地立一華人墳場。一九〇九年八月七日，中華會館創辦中華學堂，即現今的華僑公立學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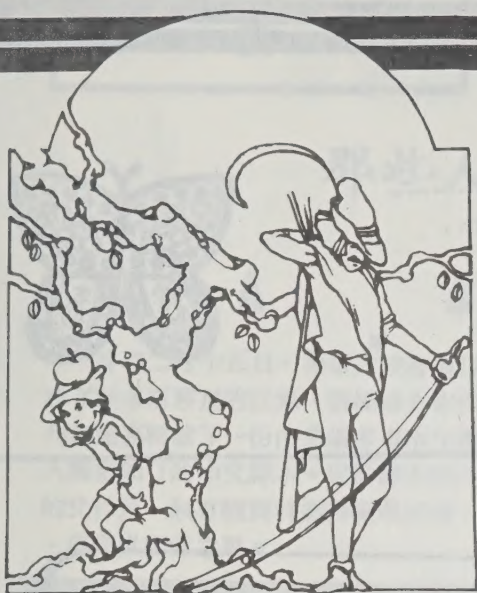
就城市的華人社區而言，現今中華會館在該社區內的影響正在急遽下降，主要的原因是許多該館以前承擔的任務已經不再存在。歧視華人的法例已經被取消，加拿大社會不再擯棄華人，新一代的移民和年青一代的加籍華人與白人社區有着密頻的接觸。「唐人街」不再是他們的庇護所，他們並且不需要中華會館作代言人。目前（譯者按，指一九七二年秋）域市大概有二十三所華人團體會社，包括六個宗親會，八個鄉親所，四個兄弟會，兩間賭博俱樂部，一間音樂社，一間青年會和一所聯誼會。這些社團中，有十一間還是相當活躍的，而其間祇有十五所是與中華會館有聯系的。今天，域市中華會館的最重要工作還是主持中華醫院、華人墳場和主持華僑公立學校的校務，提供大約一百名由小學一年級至六年級的學生學習中文的機會。

先世苗年戊戌歲為奉令領及奉華三舉因戎
捐助吉邑賑濟銀兩散蒙我同鄉士已德飲事
府黎大人敬贈拜請 欽差大臣奏領獎賞品
以戴功牌一名隨于三月十日奉令領回蒙同
投以假高古楊外將投得之活地捐名年歲蓋
三代心錄于左

圖四：當年投得官位的文件。

[illegible]

20



四度時空：

四個青年人在四個不同的時間和空間的思索和感受。

滯 結

方 生

人生的意義？（他感到渾身不適，像是聽了句肉麻的話）難道你從來未想過這問題？

問我幹嗎——噢，人生本來是私人生活的一部份，不能隨便——，不，我的意思是，人生這問題太空泛，無從談起——，噢，對，人生不過是一些喜歡舞文弄筆的人的寫作題材，普通人是不會講的。

你的話可是認真？

當然囉——，不，你當半認真半開玩笑亦沒有關係。看，我結婚已有十年，孩子有了三個，我要顧及自己的事業和孩子的前途，老婆病了要請醫生，水喉壞了要修理，保險單來了要付錢，……人生就是如此這般，有什麼好想的呢？唔，請你別誤會了我的意思，我並不是說做人根本沒有意思，這樣說罷，對一些不着邊際的思想不用過份的認真和操心。

那末，你連想一下都不願？

也許，等我再老一點，這一生已差不多不怎樣改動了，我可能會想一下人生，找出一個能夠使自己滿意的解釋，那末，你可以把這種解釋當作我個人的人生意義罷。人生是通過令自己滿足的闡釋賦予意義，是嗎？你不要擔心到那個時候我會像一個應試的學生一樣臨考試結束時無可奈何地交白卷，每個人的一生都有快樂的時刻和值得驕傲的地方值得回念，是嗎？

為什麼一定要等到老？為什麼不現在想想？

想又如何？想想是否會使人生有了意義？有人說，人生的意義在於不斷地勤奮工作，但在他們的眼中，有些畢生做牛做馬的人，是一些不懂得人生的可憐蟲。有人說，人生的意義在於真、善、美的追求，可是這世界往往顛倒真偽，不辨善惡，不分美醜。有人說人生的意義在於服務人羣，可是怎樣才能取得人羣的信任呢？要是取得了人羣的信任，不會去服務人羣，而成為人羣服從的對象了。有人說……

「爸！」孩子搖頭晃腦地走了進來。

他揉揉眼，不知剛才跟誰說話，便迷迷糊糊地說：「放學了嗎？今天老師教了什麼？」

「今天老師又講了一個偉人的故事。為什麼世界上有那么多偉人？為什麼偉人們過的都是有意義的一生？爸，人生意義到底是什麼東西？」

「民意大會」裏的「民意代表」！ 向東

最近多倫多有一個「民意大會」，主辦者是士巴單拿東南區（即「新唐人街」所在區）指導委員會，目的在徵求居民對該區發展計劃的意見。

「士巴單拿東南區指導委員會」成立歷史，算頭計尾已有五年，一向坊家對「委員會」甚少注目，連唐人街裏面的大小頭目——大抵因為「指導委員會」微不足道——對這個地盤也一向少理。但最近形勢稍變了，「指導委員會」經數年研究，準備於短期內向市政府呈交一關於該區未來之建設計劃。由於此建議影響不少人的切身利益，遂受到某方面的特別照顧！

大軍未動，輿論先行。大會前的數天，多倫多一份中文日報，以頭條新聞報導是次會議，可見某方面之熱心關懷，用心良苦！新聞稿中宏言滔滔，陳情懇懇，大有該區發展一受限制，華人社區便要厄運降臨之意。單看這張「預告」，明眼人便知好戲在後頭！

果然大會之夜，唐人街地產商扶老携幼，拖男牽女，加上「某方面」糾合之大小嘍囉，蝦兵蟹將，居然濟濟一堂，熱熱鬧鬧，好戲要上演啦！

「指導委員會」負責人介紹「發展計劃建議」過後，由於「建議」對投機地產商的「美好前途」大大不利，馬上使到會的「民意代表」沸騰起來，幾個眼色，兩三個手勢之後，只見一個又一個大肚胸，蠟光頭的「民意代表」，「不約而同」地起立發言，一時指東劃西、口沫橫飛，可謂演出落力！不落力不得嘛！老子爺爺的肥肉也想弄糟，「可怒也」！

一幕悲喜丑劇就這樣演下去了，這些愛好「自由民主」的紳士們，連一位代表三、四十工人的小姑娘講一兩句公道話也容不下啦，要用「噓、嚇、壓、喝、罵」的「民主程序」去阻止人家的發言！這些「奉公守法」的道德先生們，拉下了平時的道貌岸然面孔，扔掉了「循規蹈矩」那塊爛招牌，歇斯底里地狂叫着，放恣地搗亂着，「民意代表」也顧不得自己小丑式的洋相啦！這也難怪他們——這是他們垂死的掙扎嘛！

鬧劇就這樣演下去了。

第二天見報，「民意代表」的地位是「法定」了。「大眾」於是又被一小撮人強姦了一次！不知道華人社區內一些「進步人士」、「進步團體」對這些胡鬧事抱甚麼態度？小的認為是該劃開這些「民意代表」的假面孔，讓大家看一看他們的廬山真面目的時候了！

引子：地平綫外空無一物，我還是向它走去

路軌畢直的伸向前方，生命究竟就是這樣的一條直線，還是像天上的浮雲，漫無方向？

火車緩緩的離開了車站，在每個人的面前，就跟所有以前的人一樣，重現同樣的原野，同樣的樹木，感受到同樣的山洞和黑暗。

路是直線的，一切穩妥安詳，但是平淡的，被安排了早已失去了生命。

又有多少人願意自己好好的走路，去欣賞在路上的小溪、深谷，去觸摸一下那些有生命的花朵和小草？

汽笛聲終於離我遠去，只留下一些奇怪的，鄙夷的眼色，和竊竊私語。

一下子整個世界都好像充滿了敵意，但我並不覺得害怕。拋棄了所有的人，也被所有人拋棄，我只感到悲哀。但作為一個人，我還得獨自地向前走。

「人究竟是站在地球上，還是依附在地上，而倒懸在半空中？」

「這倒不要緊，反正人習慣了就是了。」我想。

我大步的向前走，我走了許久，累極了。卻忘記了這可憐的地球是圓的，無論我怎樣走，我還是回到原來的地方。

前面所有的路都很模糊，只有一條路，在我的面前越走越清晰，那就是「墳」。

泥土，使大地開出燦爛之花。

痛苦，使人做成美麗的詩篇。

水，歡快地在石上唱着歌。

我走到泉邊，吸了一口，於是這水成了我身體的一部份，也就跟着我去苦惱了。

我深深的吁了一口氣，這空氣從我身上逃出去，就什麼都忘記了。

曾經替我深深地苦惱的靈魂啊，你是否也將離我而去，無語而來，無語而去嗎？

我問那大海，我問那青山，他們可又記得有些許的煩惱？只有我的聲音，而我的聲音是那末的空洞和可笑。

黃昏漸漸地摸索到我的身邊。

夜，像一朵百合花那樣，柔和地合攏起來，擁抱着整個大地。

一切都顯得那樣地寂靜。

只有一隻不知名的鳥，劃過長空中飛鳴，是嘆息，還是有着什麼的不平？

我很平靜，但又彷彿充滿了熱情。

於是我開始述說着……

沉默的星辰在黑暗中，輕輕地圍攏起來。

靜靜地聽着，

我，和我的故事。



送友人



· 二了 ·

復憶三年前一往事

才看上眼
生命 湔然而去
吐絲春蠶
誰在望？

窗寒雨小風聲唳
去年陌客
今相競
朝江山 三千里外

驚悅於溝通底無言
互評馬老
誰主浮沉 豈須問
談笑千古事

嫣然一笑
飛單躍
白雲高處 別有洞天
要把山顏改
來日縱笑當年

那些人可以申請加拿大公民權(入籍)?

今年二月十五日，加拿大政府執行新的籍民法案，引起了很多新移民的注意，新聞媒介亦作了詳盡的報導。本刊在這裏轉載了一份由多倫多市中文傳譯諮詢處提供的「入籍須知」的中文譯本。這份譯本的內容是根據政府出版的文件及一般有關資料摘譯編寫成的，並非官方正式文件，僅作供參考之用。

根據國會於一九七六年通過的新公民法(BILL C-20)摘譯，合於下列條款資格之人士可以申請公民權：

3、(一) 根據此一法令，下列人士乃是公民：

- (A) 在此法令生效後，在加拿大出世者。
- (B) 在此法令生效後，在加拿大國境以外出世，而其生身父母中有一人是加拿大公民者。
- (C) 根據本法令第五或第十節規定得到公民身份，而其中年在十四歲或以上之人士在被授與公民身份時曾宣誓效忠者。
- (D) 在此法令生效之前已是公民者。
- (E) 在此法令生效之前，根據舊公民法5(一)(B)款已有資格成為公民者。

(二) 本法令3(一)(A)款條文不適於於在出世時，其父母都不是公民或合法移民，同時其父母中有一人是具有下列身份者：

- (A) 外國政府派駐加拿大的外交，領事官員，或其他代表或雇員。
- (B) 受雇為(A)款人士工作者。
- (C) 聯合國屬下駐加拿大之機構之官員職工，或根據加拿大國會的任何法令，由外交部認可而與(A)款提及之人士享受相等的外交特權及豁免權的任何國際組織駐在加拿大之官員或職工。

4、(一) 配合3(一)(A)款的目的，任何人在顯然達到七歲年齡之前，流落在加拿大，被發現為棄兒者，即被視同為在加拿大出世，除非在從被發現的日子算起七年之內發現相反之證據者。

(二) 配合3(一)(B)和3(二)款的目的，父母中任何一人死亡之後才出世的小孩應視同為在該父或母逝世前出世者。

(三) 配合3(一)(E)款的目的，在本法令生效之前，任何人，根據舊法令已可成為公民者，仍保有此一資格，即使他的出世是在本法令生效之後才申報登記而合於舊法令之規定者亦然。

(A) 在出世後兩年以內。

(B) 在本法令生效後，或在生效之前由部長核准之較長時期。

5、(一) 部長可對任何非公民而申請成為公民之下列人士頒授公民權。

(A) 年在十八歲或以上者。

(B) 加拿大合法移民在申請公民權之前四年內在加拿大居住三年者，時間計算方法如下：

(1) 未正式成為移民前在加拿大居住時間每一日作半日計。

(2) 正式成為移民之後在加拿大居住時間每一日作一日計。

(C) 通曉加拿大兩種國語中之一種。

(D) 對加拿大及加拿大的公民的責任權利，有相當之認識。

(E) 未被勒令出境，亦未被最高當局宣佈為不利於加拿大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者（此項宣佈有效期限為兩年。）

(二) 部長可頒授公民權給：

(A) 任何公民的未成年子女（未滿十八歲者）未具公民身份但為合法進入加拿大為永久居民，經由法定代理人代為向部長申請公民權者，或(B)任何非公民。

(1) 於本法令生效之前，在加拿大國境以外出生而其生母在小孩出世時具有公民身份者，以及(2) 在本法令生效之前，根據舊法令5(一)(B)(1)款規定不夠資格申請公民權者。

(三) 部長可以基於慈悲立場，作主取消下列各款的限制

(A) 對任何人而言，(一)(C)或(D)款的規定。

(B) 對任何身體有殘障的人士而言，(一)(A)款有關年齡的有關人人都須要宣誓效忠的規定。

(四) 為了要減緩特殊的非常的艱困處境，或酬報對於加拿大有特殊價值的服務，最高當局可以不考慮本法令的其他規定，作主指示部長頒授公民權給任何人，當部長收到指示後應即照辦，頒授該位人士以公民權。未成年人（十八歲以下）可由父或母代為申請入籍。年在十三歲或以下之兒童申請入籍，不須親自去入籍處填表及問話。

入籍共有三個步驟

- 一、填表
- 二、問話
- 三、宣誓入籍

問話由公民法庭之法官主持，依照法律規定，你應熟諳英語或法語，並應對加拿大的歷史、地理、國情、政府、人民、工業及公民之職責有相當之認識。

典禮：問話通過之後，大約一兩個月，公民法庭會通知你出席入籍典禮，宣誓效忠，並領取公民證書（即籍民紙）

其他：領到公民證書之後，你會收到議員及政府首長的信件對你成為加國公民表示祝賀。

如你須要進一步資料，或填表後，地址有所改變，請撥電公民法庭詢問或更正，（請說明繳納手續費之收條之號碼）。

填表：可打電話給公民法庭，預約時間，到時帶齊下列各證件依時前往公民法庭：

- 1、出生證明或其他足以證明你的出生日期及地點之文件。
 - 2、護照，移民證件，社會保險卡（即俗稱工人卡）。
 - 3、相片：最近一年以內所照之相片兩張。此兩張相片之大小必須符合規定之大小（即1 3/4吋見方，下端並應有半吋可供簽名用之空間），請參照後頁申請上所印之格式。
 - 4、申請手續費：成年人：十五元。
未成年人（十八歲以下）：八元。
- 公民法庭職員可免費代你填表。

公民法庭依法將你的申請表公佈一段時間（大約三個月左右）後，如無人提出異議，即寫信通知你前往問話的時間和地點，同時並附寄給你品行推薦書，替你填寫，證明你確係品行端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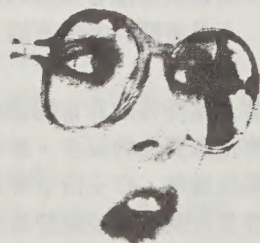
準時前往指定地點接受問話，應攜帶下列各文件：

- 1、繳納申請手續費之收條。
- 2、品行推薦書。
- 3、護照及移民證件。

■ 下期續 ■

陳氏眼鏡公司

隱形眼鏡
驗光配鏡
價錢最平



Gerrard
Walton
Dundas Bay

LUCLIFF PLACE
電話 595-1665

新款品質高
特別優待
顧客最多

多倫多比街七百號地下

如何申請安省政府廉租屋宇

政府廉租屋宇共分三類，分別由以下三個政府部門主辦。
（一）安省房屋協會（二）多市政府房屋公司（三）多市不牟利房屋協會，現依次介紹各類廉租屋宇如下：

（一）安省房屋協會

在市境內住滿一年，六十歲以上之老年人或有子女之家庭均有資格申請安省房屋協會屬下的屋宇，月租是根據個人或家庭每月總收入（未扣稅前之入息），抽取大約1/4作算，房屋種類不同，計有排屋（Town House），栢文（Apsartment），獨立及半獨立房屋。房屋大小分配視家庭人口多少而定。屋宇分佈範圍廣泛，大約33%房屋建在多市，29%在史保祿（Scarborough），24%在北約克（North York），其餘分佈於其他區內。

申請表格可向下列地址索取：

（二）多市政府房屋公司

此等屋宇是專為老年人而設，凡超過六十歲以上在本市連續居住滿一年者都有資格申請。惟申請者收入有限，單身不得超過每月\$600，夫婦不得超過每月\$900，申請人必須有照顧自己日常生活之能力方能被接納。單身者可入住單身栢文，夫婦則可得一睡房之栢文，普通栢文內均有爐頭，雪櫃等裝備，但其中有若干栢文大廈內有公共膳堂之設備，是為不便外出購物及養食之住客而設，若於遷入後要求轉換居住單位，必須呈遞書面通知，而批准機會只有一次，再次申請則無效。

申請表格可向下列地址索取：

（三）多市政府不牟利房屋協會

多市不牟利房屋協會除興建住宅外，還大量收購及裝修現有的房屋以供中下收入之單身人或家庭居住，申請人年齡及收入無限制，租金較市面相等之住宅微低，如收入少之家庭欲申請租金津貼，則必須在大多市境內住滿一年方可，不牟利房屋只設於多市境內，而不建於任何其他市政區。

申請表格可向下列地址索取：

備註：①以上三種政府廉租屋宇均給予申請人號碼各一，獲分派房屋機會以申請號碼編排先後為標準，但若因居住環境惡劣，影響個人或家庭健康，或被業主迫遷，將獲優先考慮，惟所須等候時間，不能預告。

②如申請人家庭狀況有變動或已遷居別處，應負責通知房屋部門，以便更改資料及維持聯絡。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

思雅書舍

加拿大中文書籍最齊備的書店

簡介

「按圖索驥」

關自守

無巧不成話，參加了城市計劃民意大會的第二晚，就在光明戲院（Cinema Lumiere）看了一部反映大城市的日本片（按圖索驥）。（片名暫譯。譯名的用意是：馬兒跑掉了，一去無踪，怎樣找呢？有張圖亦毫無作用。這跟成語原來的意義當然不同。英文的譯名是：A Man Without Map）。該片由敕使河原宏執導，安部公房編劇，跟他們以前的名作（砂丘之女）異曲同工，作風上似乎頗受卡夫卡的影響。

電影一開始，鏡頭從高空俯瞰一個高度發展的大城市，由遠至近，由含糊到清晰，由籠統到細節，旁白是一大串關於一個失踪者的有關資料，有「茫茫人海，往何處尋」之意。跟著鏡頭跳接至一個咖啡館的老板、侍女，再到查問失踪者下落，由勝新太郎飾演的私家偵探，故事就由此開展。以後，私家偵探遇上了生活在充滿「神秘性」的大城市裏形形色式的「離奇」人物。這些「離奇」人物包括家庭主婦，工人，館子老板，女學生，甚至孩子等應視為「正常」的人物。整個查問的過程充滿了荒謬感。例如一個提供消息幫他找尋的一個可憐巴巴的小人物，表現得熱心，忽爾承認所提供的消息都是謊言，作痛苦狀，當他的話再度受到懷疑時，又因自己不受信任而生氣，終於打了個電話給偵探隨後在電話亭上吊自殺。至於雇用私家偵探、失踪者的妻子却沒有把一些重要線索主動地提供給他，似乎對她丈夫的失踪無動於衷，甚至連她自己弟弟的電話地址亦不知道。

編導對於大城市的人潮，擠擁的交通，以及黑暗的角落，有不少特寫。人與人之間互不信任，甚至是充滿敵意，使熱鬧的大城市顯得冷酷無情。有一組用超現實手法的鏡頭，拍攝這座城市空無一人，祇有偵探一人躊躇躑躅，像是在荒漠上一樣的幻象，很能襯出一種強烈對比。結尾是：作為追尋失踪者下落的偵探連自己也在人海中「失踪」。

該片在劇情及手法上雖然相當「現代」，但絕不濫用特技鏡頭。片身頗舊，影響到色彩及字幕，當然，這些瑕疵不能歸咎於編導。

曾在多倫多上映的日本片，除了比較受人熟知的黑澤明的之外，本人鄭重介紹以下幾部：小林正樹的「化石」，「切腹」，「怪談」及「人之條件」，市川崑的「野火」，溝口健二的「赤線地帶」（意即花街柳巷），大島渚的「儀式」，敕使河原宏的「砂丘之女」及本文所介紹的「按圖索驥」。

「飛越瘋人院」（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一度是熱門電影，主角積·尼高森 Jack Nicholson 因而名氣更大。但許多人都忽畧了導演米洛·科曼 Milos Foreman 的功勞。此公來自捷克，以前在祖家時拍攝了「金髮女郎之戀」，一度在香港大會堂上映過。另一部「消防局舞會」可能是第一次在美國公映。開場時，科曼現身說法，用生硬的英語向美國觀眾插科打諢，大意說：「這部電影在祖家上映時，消防局全體人員罷工抗議，到我處來，氣勢洶洶。我跟他們說，這電影並不是詆毀他們，用意是反映整個社會，在手段上假借一下他們的身份而已。於是，他們都快快樂樂地離開了。在這裏我不妨靜靜告訴你一個秘密：「這部電影用意不是反映社會，而是揭露消防局的醜態。」可見此公素來喜歡吹牛。

東歐的確有不少電影人材到西方。在芸芸商業電影堆中創立了一個局面。除了上述的科曼，比較多人熟悉的有原籍波蘭的波蘭斯基 Roman Polanski（他在祖家時拍「水中刀」，一舉成名。）另一個出色而較少人知的是原籍捷克的 Jan Kadar，作品充滿懷疑主義的色彩，曾在多倫多正式上演過。由他執導的有「漂流」（Adrift）及「父親的謊話」（Lies My Father Told Me）。東歐亦有些電影直接來，曾在多倫多上演了幾次的匈牙利電影「辛八達」（Szinbad）很值得推薦，充滿了享樂主義和傷感主義的色彩，以攝影技巧特別見勝，導演是 Zoltan Haszarik。

影訊：

於四月二拾日開始，安大略藝廊舉行美國電影之父格理菲斯的電影節，時間為週三、四晚上七時，週日下午三時，又安大略科學館於五月十九日放映「新日本電影」。

D.W.

Admission: Free on entrance to the Gallery.

Art Gallery of Ontario

GRIFFITH
FILMS 1908-1931

北美洲華僑史

長篇轉載之四

梁啟超

(九) 華猶社區之相較

美國外來移住民之中，其勢力最大者，則猶太人也。聞美國之銀行業，猶太人居十之三四。其銀行職員，猶太人居十之五六云。

布埒委街者，紐約第一大街也，大商店凡數千家，屬於猶太人者十而六七，吾中國則僅一家而已。

紐約市政之權。一惟猶太人所左右，他無足與抗者，其他大市，亦大率類是。

猶太人何以能若是，則以其團結力之大，為他種人所莫能及也。聞之彼族有一公會，其組織規制甚秘密，外人莫得聞，凡一猶太人來美國者，公會量其才而貸以資本，使營商業，獲利則稅其若干以復於公會，折閱則再貸之，復折閱則三貸之，貸之三而猶不能自立，乃不復矣。此所以相扶相導，而全世界之商業，日入彼掌握也，故紐約市中二十餘萬之猶太人，其從事於下等勞動職業者甚希，而小商店營業，不計其數。



余初到紐約時，適遇俄羅斯殺掠猶太人事件，紐約各報，日攻擊之，描寫其慘狀，不遺餘力。其實此次被殺傷者，合計不滿四百人；以視拳匪之役，俄人在黑龍江畔，一日而殺華人七千，其相去亦遠矣，而全球報紙，其肯為我實力訟冤者有幾耶？彼曷為爾爾，則以紐約者，猶太人之紐約也，動紐約則動全美國，動美國則動全世界，而俄人虐殺事件，遂招天下公憤，於此見中國人之生命，賤於猶太人遠矣。此役也，紐約市捐救濟金千餘萬，全美國合捐二千餘萬；紐約之華人亦有助者。聞美國猶太人公會，建議卻盡迎旅俄之同胞至新大陸云。

嗚呼，以數千年久亡之國，而猶能巋然團成一族，以立於世界上，且占其一部分之大勢力焉，則其民族之特色之實力，必有甚強者矣，彼巴比倫人、腓尼西亞人，今何在也。即希臘人、羅馬人，其今昔之感，又復何如也？吾中國今猶號稱有國也，而試問一出國門，外人之所以相待者，視猶太為何如，而我國人之日相軋輾相殘殺，同舟而胡越，闔室而戈矛者，視今之猶太人，又何其相反耶。吾黨猶囂囂然曰中國將為猶太。嗚呼！其亦不慚也已矣。

猶太人之不潔，與中國相類。紐約唐人街與猶太街接壤，其穢湫不相上下。

(十) 紐約華洋通婚

天下最繁盛者宜莫如紐約，天下最黑闇者殆亦莫如紐約，吾請畧語黑闇之紐約。

排黃熱者流，最詆華人不潔。以吾所見之紐約，則華人尚非不潔者；其意大利人、猶太人所居之數街，當暑時，老嫗少婦，童男幼女，各攜一几，箕踞戶外，街為之塞，衣服襤褸，狀貌猥瑣。其地電車不通，馬車亦罕至也，顧遊客恆一到以觀其風。以外觀論，其所居固重樓疊閣也，然一座樓中，僦居者數十家，其不透光不透空氣者過半，然煤燈晝夜不息；入其門穢臭之氣撲鼻，大抵紐約全市作此等生活者殆二十三萬人。

據一八八八年之統計，紐約之赫士達及摩比利兩街（大半屬意大利人所居，德國人，中國人，猶太人亦間有），其人口死亡之比例，每千人中至三十五人有奇。其五歲以下之小兒死亡者，每千人中至百三十九人有奇。較之紐約全市普通統計，每千人實應死亡二十六人有奇耳。其貧民生活之艱難；可以想見，此等率由住宅缺空氣，缺光線所致云。

紐約省統計對於男子一人而有女子六七人之比例。聞由近日東方之民，謀食於太平洋岸一帶及大北鐵路一帶者日多，而其細弱則仍居東部，故懸絕至此甚云，此事於道德上影响亦不少。美國號稱最尊女權，然亦表面上一佳話耳。實則紐約之婦女，其尊嚴嬌貴者固十之一，其窮苦下賤者乃十之九；嬌貴者遠非中國千金閨秀之所得望，下賤者亦視中國之小家碧玉寒苦倍蓰焉。以文明之地，結婚既難，而女性復多於男性數倍，故怨曠之聲，洋洋盈耳。以華人之業賤工者，而中下等之西女，猶爭願嫁之，則其情形畧可想矣。此摩門教所以歲月侵入，而賣淫業者之數，殆逾三萬，其號稱良家而有桑濮之行者且徧地皆是也，此亦紐約黑闇之一大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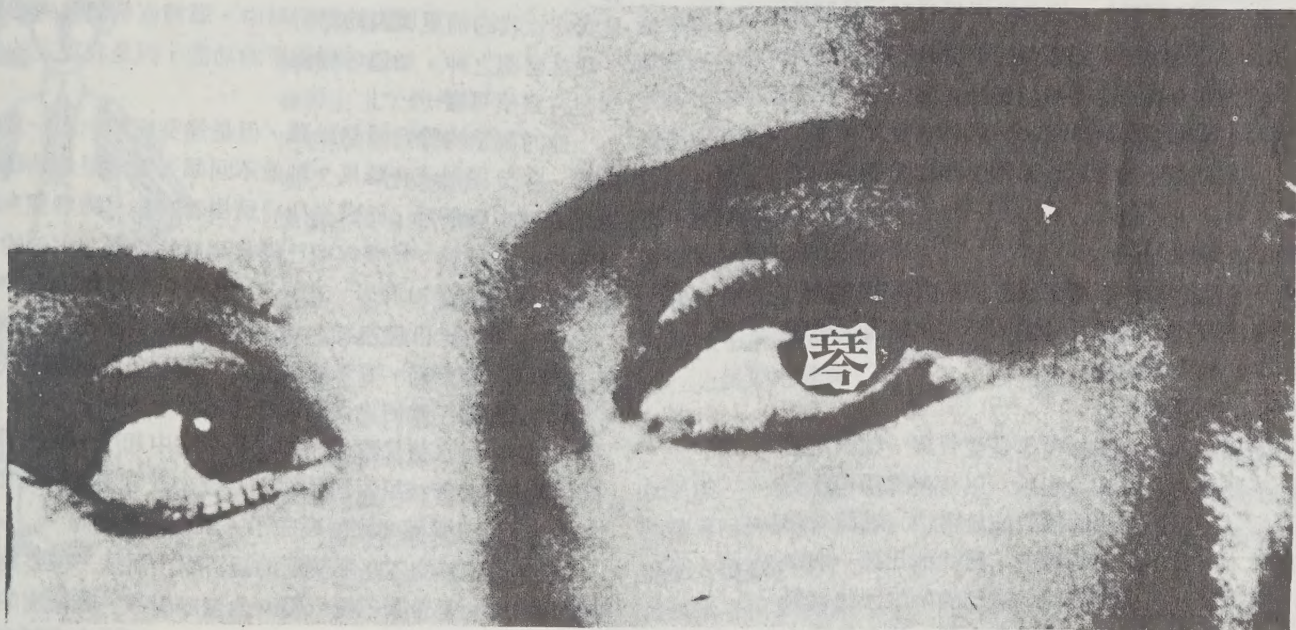
LINGUISTIC SCHOOL OF CANADA INC.

180 Bloor St. W.,
5th Floor,
Toronto, Ontario M5S 2V6.



- ★ 日、夜 班
- ★ 私人 補習
- ★ 托福或密之根 試補習班
- ★ 初級、中級、高級 英語班

Telephone: 961-2753



能盡雅琴，惟至人兮！——嵇康：賦琴。

山林的女神是所有女神之中最美麗的女神。她美麗得像六月裏的一天。

但是她却是那樣的容易羞怯。她每天在山林裏徘徊，和花草生活在一起，她呼吸着風的香氣。游泳在水裏，在草地上跳躍，小鹿似的奔跑，星子似的閃爍，花樣的美。

她在生滿了百合花的山澗裏洗澡，在巉巖的山谷裏踏歌，用各色各樣的美麗的樹葉子編織些希奇的花飾。她情願把花投入溪水裏，看着她往下流，她情願看着月亮掛在山角上，而澈夜的不睡覺，她嗅着花的風，飲着帶着花露的水，她的聲音像水流打在玲瓏的石子上似的，淙淙的發出迷人的小聲，她用手輕輕的彈動着樹枝，把頭髮沐洗在金色的晨光裏，因為她的頭髮顏色，和金色的晨光一般一樣……她歌唱着，跳躍着。

從來不覺得歲月的悠長，從來沒有過寂寞的感覺，她不知道山林以外還有什麼比溪水更清，比花香更香，比風更溫柔的溫柔，比蜂蜜更甜的蜜……什麼東西能比鹿更靈活呢，什麼東西能比燕子飛得更快，什麼東西能比得上月亮的圓，夜鶯的舌尖，雪的白，杜鵑紅的紅，什麼東西能比得上花蕊的細緻，山的富饒，水的深……

達芬妮她每天生活在山山林林裏，過着美麗而溫柔的日子。不想知道山林以外的美麗，她不知道山林以外的愛……愛普羅非常愛她，熱望得到她。

他看見伊的眼睛像春天的星子。他看見伊的唇紅得像一塊紅玉。他愛她的手臂，柔長的豐富閃着一種誘人的光，他愛看她的頭髮，那頭髮金色的火焰似的引逗起來他的情慾。他幻想着沒有給他看的部份必定格外美麗，他熱烈的想得到她。

在一個山林山落的最美的那一天，空氣裏充滿了溫柔的和和協。空中流動着日光和花香，達芬妮走到一個山坡的

下面，旁邊有一個美麗的瀑布，地上有滿天星似的黃色的小花。她就坐下來，想休息一會兒，她最初看見了一朵白色的小花。伊便用腥紅的小咀去親它。她俯在地上惋惜的怕自己的不小心會損傷了那隻花朵，於是輕輕的把咀唇往那朵小花上離開，忽然往山巔的樹林裏發出迷人的琴音……

你死了，希亞更多斯！
被我奪去了你的青春。
你所受的是痛苦；
我所受的是罪名。
我但願我能替他死！
但是這既然做不到，

和將永存在我的記憶裏，
和歌曲裏，
我的七絃琴將贊美你，
我的歌曲將詠唱你的命運，
而你將變成一朵花，
花上滿栽着我的悔恨。

這樣美麗的琴聲，她平生從來沒有聽見過。她聽的都是水流的音響，夜鶯的舌尖的翻弄，露珠滾落的輕聲，雲彩撕裂的微響……

有人在山上彈着七絃琴，有人在唱歌，她恐嚇的跳着，想逃開，可是音樂迷住了她，使她不能走開，人類發明的聲音比天然的一切聲音更美，因為那裏面流布着一種創造的喜悅和一種自信的驕傲……這種聲音留住了她。

她完全被那美麗的歌聲管束住了，雖然她竭力想逃。她被那多情的歌聲帶到一種她從來沒有經過的境界。這種境界無論如何是她沒有經驗過的，這種境界喚起了她有着一種新奇和慰貼的感覺。好像天空忽然湧現了一片莊嚴的都市，她很想像到那高空去看一看。

但是她是這樣的羞怯呀，羞怯帶給她一種奇異的慌惑，一種不安的趕快想逃的心理逼迫着它，使他立刻感到她自己的一切都在改變了……這山林裏又多了另外一種聲音，這聲音引誘着她，使她傾向着它，又使她害怕，她想像着那琴聲像一個懂得聲音的手臂來圍繞在她的頭上，但是她又是那樣的顫抖呵，她恐懼這手臂會將她俘虜……但是那聲音明明在招喚她，使她也傳染了那歌聲一樣的憂傷，

一樣有了感受……她低低的抬不起頭來，睛眼裏充滿了淚水，而且也包藏着最溫柔的喜悅。

於是琴聲止了，一個娟秀的少年，身體像蜥蛇一樣柔軟，美麗的頭像初升的太陽……

少年從山巔抱着琴走下來，達芬妮看得呆了。她被他的美麗和光輝引住了，她相信那樣美的歌聲一定要讓那樣美的人來唱，那樣美的琴一定要那樣美的人來彈……但是她立刻想跑了，因為她不習慣於這山林以外的美麗，她是自然的女兒，山林的女神，她對於那琴聲和歌聲都引起了恐懼。

愛普羅從山上向她走來……。

「達芬妮！」他的聲音那樣狂熱那樣熟習，彷彿她天天聽見過他在喚她一樣……但是她並不停住來聽他，她轉身就逃，快得像一隻受驚的鹿。

「達芬妮！」他喊道。

但是達芬妮只是逃，她不知道他是愛普羅，她祇知道一個陌生（她不熟習的）人在追趕她。以前沒有過青年男子來對她說過話，所以愛普羅的聲音使她害怕，這種聲音是美麗的山澤林木所發不出來的聲音，雖然他比那一切山澤林木的聲音都更美……她對這聲音這樣的陌生因此就引起了更大的恐懼。她急急的跑，想隱藏自己，使自己再也不聽見那種奇異的聲音，而那聲音偏透出一種磁力，在吸引着她，因此她也像更害怕……

「達芬妮！」他喊着，恐怕她跑走了，更追趕着她。

愛普羅相信方才她會傾聽過他的琴聲的，相信他的愛會感動她。但是她在逃避他，像母鹿在逃避獵人一樣。

愛普羅一面追逐，一面懇求。

他說：「停住，拔尼厄司之女，不要逃，我不是你的敵人。不要躲避我像羊逃避着狼，鴿子逃避鷹。我是爲了愛而追求你。你使我苦惱；我怕你要跌在石頭上而受傷，使我成了傷害了你的原因。請跑得慢一點吧，我會追得慢點的。我的歌唱和七絃琴之神。我的箭是百發百中的，但是我却比我的箭更厲害的箭所射中，這箭直刺到我的心裏。我是醫藥之神，知道各種藥草的功能，但是我現在的病却沒有靈藥可醫……」

他的真摯的聲音雖然動聽，但是達芬妮却一心一意的跑着，多分兒是沒有聽見。她並不回頭去看，但是她聽見追者底腳步聲漸近，她聽見他肩頭掛着的銀弓的響聲，她聽見他的呼吸聲。她覺得他已經趕到她的後面了，他的呼吸吹動她的頭髮。

但是達芬妮已經沒有力氣了。她正跑到河邊，就情急大聲的喊叫：「啊，爹爹拔尼厄司，救救我！你變了我的形體吧，我的形體使我受到這樣的危險……。」

立刻，河水彷彿湧起來迎接她，空中起了一層雲霧。（達芬妮的爹爹拔尼厄司是河神）後來愛普羅就看見她站在河邊，他以爲她要到河裏去了，就伸手去抱她。

但是他抱着的不是那美麗的達芬妮，而是一棵姿態優美的月桂樹。愛普羅不覺大驚。他撫摩樹身，覺得樹的全身都在戰慄。愛普羅悲慟的失去了一切，祇抱着樹狂吻着。「啊，達芬妮，達芬妮！」他叫着「難道拔尼厄司這樣的救你嗎？他將你變成了一棵樹，使你可以不作我的妻嗎？」但是他沒有得到答覆，月桂樹還在戰慄。

他伸出他的戰慄的手，用這月桂樹的葉子作了一個花環，戴在頭上，像王冠一樣。這個桂冠，他以後永不除下，來紀念這可愛的處女達芬妮。

大中華貿易公司

祖國工藝品

籐,竹,柳,草,製品

專營批發

送貨快捷

歡迎同業代理 現貨大量供應

Great China Trading Co.

121 Dundas St. West

Toronto

416-368-1242

Mailing Address Box 5181 Stn. "A"

Toronto, Ont.

中國商業貿易公司

經銷：

國產地道藥材，祖國，香港成藥，
專人負責配藥，歡迎外埠郵購。

鹿	蛤	北	蜂	當	雙	參	至	靈
尾	蚧	芪	乳	歸	寶	芪	寶	芝
耙						蜂	三	蜂
						王	鞭	王
精	精	精	漿	片	素	精	精	精

China Commerce Trading Co.

860-862 Richmond St. West

Toronto, Ont.

416-869-0645

Mailing Address Box 50 Stn. "A"

Toronto, Ont. Canada



阮志雄

英倫生活小記
寫於滑鐵盧
七五年十月

在放工回家的路上
人們都喜歡
將牽掛拂掉
像脫去上工的外衣
把它搭在長椅的柄上
倒下 一日的疲勞
傾盡在長椅的懷裏

然後 從親切的擠推裏
擠出一杯酒
隨便搭上一個破落的老紳士
或者 像自己一般的泥工
反正都是一樣
享用同樣的酒
同樣的黃昏

撕下一角新聞紙
就開始高談闊論
這實在精彩而高明
比國會的專家
他們還清楚
怎樣才算公道的價錢
爲什麼遠方還有戰爭
愛爾蘭人爲什麼憤怒
爲自由而戰的人唱了些什麼歌
還有孩子們的俏皮事
上星期的球賽

就這樣 一切可悲可喜的事
都隨著咀角的泡沫吐出
直到太陽都聽累了
會議從黑夜裏散開

很多時就是這樣
沒法猜透
就是這些人
他們的瑣事
所謂生活 所謂
真實和
希望
像這些黃昏
自然的懸著
懸著在這些人的心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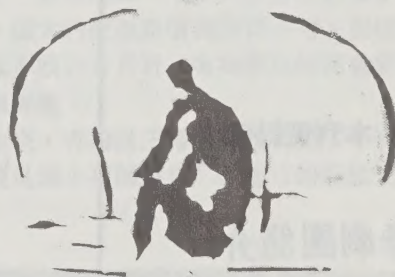
靜靜的在另一端
幾張悠閒的面孔
呼吸著公園吹來的草香
在八月的清新的空氣裏
在等待誰
來搖起那鏗鏘的結他

徵

文

- (一) 本刊為一公開園地，歡迎各地讀者來稿。
- (二) 本刊選稿的原則：凡不作人身攻訐的文章均一律歡迎。
- (三) 來稿請以原稿紙書寫，切勿一紙兩面；除專題特約稿外，以不超過三千字為佳。來稿請附上真實姓名和地址，惟可用筆名發表。文章不願刪改請註明；如欲退稿請附上回郵信封。
- (四) 本刊因經濟關係，暫不設稿費，來稿一經刊載，即致送該期本刊二份。
- (五) 來稿請寄

P. O. Box 53
STATION P.
TORONTO,
ONTARIO,
CANADA.



我是白馬王子

癌石

這個城市有許多樹
多得我想在樹頂上走路

我真的每天在樹頂上走
一個人也看不見

但今天早晨我在城西的樹頂上
碰見另一位白馬王子
他真的騎着一匹白馬，很高傲、很高傲
當然，他後面還有東方初升的太陽

我想以後我還是不要上樹頂的好
因爲我的那匹馬已經很不美俊了
還有，在我背後升起的已不是太陽
而是那古老的中發白



白毛女

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舞劇團
訪加演出

一九七七年五月五日至六月一日



本刊資料室

上海舞劇團簡介

上海舞劇團由上海市舞蹈學校演出。一隊組成。

上海市舞蹈學校建于一九六〇年，是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鍛煉而發展壯大的中國舞蹈藝術的主要演出，教學單位之一。

在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指引下，上海市舞蹈學校自一九六四年起，在革命歌劇『白毛女』的基礎上，創作的革命現代舞劇『白毛女』，滿腔熱情地塑造了王大春、喜兒、楊白勞等八路軍指戰員和貧下中農的高大形象，歌頌了無產階級的鬥爭生活，受到工農兵的熱烈贊揚。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四日，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和導師毛澤東主席觀看了『白毛女』，這是對中國革命文藝工作者最大的關懷和鼓舞！『白毛女』已演出了八百餘場，還拍成彩色藝術片，在國內外放映。

一九七二年，上海舞劇團滿載中國人民的深情厚誼對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日本國進行了友好訪問演出，受到熱烈歡迎。

中國上海舞劇團在加拿大 演出第二套節目單

一、現代革命芭蕾舞「白毛女」選場第六、七場

第六場：「見仇人，烈火燒」

第七場：「太陽出來了」

表演者：白毛女：石鐘琴

余慶雲

大春：凌桂明

史鐘麒

二、琵琶獨奏（琵琶是兩千年前就有的古老樂器）

一、天山之春

烏斯滿江 俞禮純 曲

王范地 改編

樂曲表現了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天山牧場的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

二、十面埋伏

隋代古曲（公元六至七世紀）

樂曲描寫公元前二〇二年楚漢「垓下之戰」，漢高祖劉邦戰勝楚霸王項羽的激戰場面。

演奏者：湯良興

（或古箏獨奏 箏是二千多年前就有的古老樂器）

一、廣陵散 三國時期（公元三世紀）魏國古曲 現在演奏的是全曲的一部分。

二、戰台風 王昌元曲

樂曲表現新中國的碼頭工人戰勝台風襲擊，保護國家財產的英雄氣概和崇高品質。

演奏者：王昌元）

三、幸福光（雙人舞）

編舞：吳顯德 李斌英

作曲：李冰 張龍

表現翻身的涼山人民修起了水電站，彝家父女倆熱情歌頌幸福光。

表演者：翁朱法 榮安尼

四、男高音獨唱

一、熱情歡呼，縱情歌唱

鍾玉新詞

蔡克翔曲

中國人民歌唱粉碎了「四人幫」，決心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前進在社會主義大道上。

二、滿載友誼去遠航

劉玉文詞 羅世勤曲

歌曲表達了新中國的海員，乘風破浪，航程萬里，和各國人民結下了深厚的情誼。

五、草原女民兵（舞蹈）

黃伯壽編舞，竹林等作曲

一隊英姿颯爽的草原女民兵巡邏在祖國的邊防線上。

表演者：顧蓓蓓 邵慧芳等

休息

六、採茶舞（舞蹈）

浙江省歌舞團創作

表現江南山區人民公社的社員們以大寨精神幫助採茶的歡騰情景。

表演者：周華英等

七、二胡獨奏

一、江河水 民間樂曲

樂曲表現了在舊社會勞動人民的苦難和不滿。

二、賽馬 黃海懷原曲

沈利羣改編

樂曲描繪了中國蒙古族人民在豐收節目里的歡騰景象。

演奏者：閔惠芬

（或民族樂器合奏）

一、三六 民間樂曲

我國江南地區的民間傳統樂曲，樂曲洋溢着歡樂的節目氣氛。

二、夕陽簫鼓

又名「春江花月夜」，原為琵琶古曲。樂曲贊美了祖國的錦綉河山。

演奏者：湯良興 俞遜發等）

八、女高音獨唱

一、世世代代銘記毛主席的恩情

余吐肯詞 祝恆謙曲

這是少數民族錫伯族的民歌。

二、洪湖水，浪打浪

張敬安 歐陽謙叔詞曲

劇歌（洪湖赤衛隊）選改

歌曲表達劇中人物韓英對美好未來的嚮往。

九、笛子獨奏

一、牧民新歌

簡廣易 王志偉曲

樂曲展示了中國北方遼瀾草原人民的歡樂心情。

二、苗嶺的早晨

是用八公分長的笛子演奏的，這是中國西南地區苗族人民的一首民歌改編的曲子。

十、弓舞（舞蹈）

舒巧編舞 商易作曲

在十九世紀中葉，反對外國侵略和封建主義的鬥爭風起雲湧，舞蹈表現了農民起義的英雄們刻苦頑強的練兵情景。

表演者：張南 史鐘麟等

比鳥雀更吸引我的是在這兒下相棋的人們，老頭們一早就在對壘，小伙子們多在三時以後，他們多是工廠裏的工人，中班下班之後，夜班上班之前，這段時間在這兒鍛鍊棋藝。這兒雖有三張石桌和石凳供下棋之用，但一來不夠用，經常有十多局，怎能擺得下？二來棋手們都喜歡蹲着的多，自帶小盒相棋，紙棋盤往地下一鋪，開始下起來，觀眾也或蹲或站的圍起來。我曾一口氣站了一個半鐘頭，看完了一局棋，一點不覺累，而且心上很滿足。回家的路上，回味着那些險招的化解，比自己上戰場過癮的多。因為我屬於旁觀者清之流的人，若是親臨陣地，定會大敗虧輸，所以一直藏拙，沒敢出手向人討教。

這兒下棋分兩大類，一是不賭錢的，一是賭錢的。不賭錢的多是老頭們在消遣，或者中年人棋藝低劣，老不進步，所謂屎棋！於是喧嚷吵鬧，奪車回地，旁觀者亂加指點，甚至動手移子，越俎代庖，從小在鄉下見慣的情形，甚是乏味，賭錢的棋局情況就不同了，旁觀的人都要閉嚴嘴，就是間接評論，也會遭人干涉，這才看出對局者的棋藝高下。

一局的賭注由兩元至十元是普通的，大注到四十元一局。小伙子多喜賭錢，棋王更是賭注少了不肯出手。年青的常請這些棋王過招，每局多為十元，有時降至五元，棋王贏了他們的

我們這兒有個小花園——或者像廣東人說的『花園仔』。裏面有兩個足球場，一個網球場，至於花木真是少得可憐，花園為球場佔去了大部份，空地所餘無幾，沒栽了多少花木，叫花園，可謂浪得其名。不過，我幾乎每天下午，日落之前，都要來溜躑一趟，這時玩鳥的人提了鳥籠來聚會，經常有二十多籠，聽聽鳥兒的賽歌，是一樁樂事，也生一點感觸，鳥雀身處囹圄久了，竟不羨天地寥廓，飛翔之樂，都要以歌喉壓倒羣雄，爭一時之快意？還是在囚籠裏罵陣，互相指責不敢造反？就非我所知了。

錢，也點破一些他們致敗之道。有一個棋王坦白的說：「本來是你贏我的棋，就是因為你心裏怕了我，該走的不敢走，我一步閒棋，你認成了遠招，想贏棋，要放大胆！」

棋王逢人讓雙馬，勝不了，再減讓單馬，很少頭一局平等對壘的。有一個老頭，開着象牙批發庄，天天來和幾個棋王輪流對局，他的棋藝平常，但是錢多，每局賭注四十元，棋王要讓一馬一炮，如果他連輸兩局，棋王就得加讓二先或三先，他下的慢，一下午頂多三局，以他的身份說，他輸得不多，他是來找棋王喂招，棋王總得叫他贏一局，開心一下。

有一個棋棍，棋藝稱得準棋王，但他們專門哄騙小伙子，給一個小伙子戴高帽，說他的棋高，一定要他讓雙馬才肯對局，他會贏得對方感覺不服氣，於是一局一局的着下去，小伙子輸光了仍是不服氣，至死不悟，這種對局，棋格低，去欣賞的是看小伙子的那股優勁，

真正棋王實際上是職業家，每天「開檔」總有幾十，甚至上百元的收入。有一個銀行的小職員來玩過兩個月，只在星期六和假期才見他。他的棋藝不錯，初時和小伙子們玩兩元一局，都是他贏，後來和棋王交手，表現出他比棋王似乎僅低了半個馬，他不要棋王讓子，但只肯玩十元一局，棋王俯就他，每三四局他可勝一局，他大約想和棋王殺成平手，可是，四五個星期過了，他還是佔不到上風，而棋王似乎尚有餘裕。他便絕跡不來了。最後的那一下午，我看他們對了十局，他最少輸掉六十元，這大約使他覺悟到非同小可。而棋藝差了半招，要想追上，真不敢以日月計，有如跳高的運動員到了他的極限，再增高一線都難。

三年來，有的棋王轉移陣地不見了，有的棋王新從別處來，但還沒見過小花園裏有「紮起」的新棋王。

多倫多攝影器材

在多倫多攝影器材，我們使用閣下的語言……不論是攝影界裡的國際語言還是中文！多倫多攝影器材被認為是過去三十年來加拿大最先進的攝影器材公司。價錢相宜、售貨員的豐碩知識替本公司贏得如此美譽。滿足閣下攝影需要，請光臨多倫多攝影器材

TORONTO CAMERA

... because you've got to be good to make it on Yonge Street

340 YONGE

Mon.-Wed. & Sat. 9-6, Thurs. & Fri. 9-9 • 597-1891
We accept ChargeX • Master Charge • Trade-Ins • Mail Orders

我們說閣下的語言

Canon

NIKON



加拿大安省多倫多市央街三四〇號

醜女之戀

方生



當她進入金碧輝煌的客廳的時候，意想不到看見一大羣喧鬧的孩子。

「這位是張先生，這位是張太太。」

「這位是王先生，這位是王先生的千金貝蒂。」

「這位是曹太太，曹先生在那邊。」

作為女主人的若詩，很有耐性地逐個跟她介紹；然而差不多都是「先生」，「太太」，最後——，

「這位是史提夫，是我的表弟，在大學唸二年級。」

他很年輕，看上去像個大孩子，跟她比起來似乎是隔了一代。她想到了自己眼角的魚紋，……。

「趙小姐，」他打斷了她的沉思。

她愕然地抬起頭來，作出很感興趣的樣子聆聽着。

「趙小姐，聽說妳在醫學院的實驗室裏做。」

她點點頭，毫不經意地說：「你來了加拿大多久？」

「兩個月。妳呢？」

「唔——，有七年了，」她遲疑了一下，「不，八年了。」

「妳當初是來唸大學的嗎？」

「我是在香港唸完大學，然後來這裏的研究院深造。」她吁了一口氣，像是犯人招供後的無可奈何。

「我要跟小朋友打打招呼，失陪了。」

他興高采烈地逗着小孩子玩的那股勁兒，很討人喜歡。她悵然若失地望着。

畢竟，他是一個孩子！——她心中在想。見到他那副年輕俊秀的臉龐，想到了自己又老又醜。她長得醜，亦明知自己長得醜，反而毫不諱言——有時，她會在朋友面前打趣地說：「像我長的一副醜樣子，怎能找到男朋友呢？」至於別人對這話的反應，幾乎祇有一種：「不，妳長得並不醜。」當然，這是出於安慰——一種掩飾的安慰；在心底下，人們怎樣想着？有人在慶幸着，亦有人見了她的模樣油然產生憐憫的心理。出於憐憫，有不少同窗姊妹替她想辦法結識異性，跟她安排機會或乾脆直接地介紹對象。可是，這樣祇會損害她的自尊心和增加她的痛苦。有一次，顧柳眉替她介紹了一個男人；那男人見了她之後，很是生氣，說顧柳眉這樣委屈他，是一種侮辱。當然

，也有些男人樂於跟她聊談，似乎，這樣可以證明他們不會因美醜而有偏見，以博取其他異性對他們的好感。

來加拿大時，她相信自己的運氣會好轉。後來，她發覺所謂到外國見見世面，生活的圈子祇有更封閉，朋友之間祇有更冷淡。一年後，若詩亦與她的丈夫移居至多倫多，跟她住的說遠不遠，駛車祇須三十五分鐘，在地理上的距離已縮短，可是她倆在心理上的距離驟然增加了。

他給孩子纏得不可開交；可能，他自己亦喜歡跟孩子頑在一起。她感到自己這樣呆呆地望下去沒有什麼意思，便走近站在聖誕樹前談笑風生的太太們。

太太們起勁地談論着，把她冷落在一邊。

「妳真有福呀，又添了一個孩子，……。」

「多個孩子多點麻煩，結婚之後一直忙到現在，未曾停過，唉，我現在後悔太早結婚，不然可以多快活幾年。」

「早結婚？到了外國後，差不多誰都急着結婚……。」

「那時我可沒急着呢，急的倒是男人，……。在香港，家中還有個傭人，現在什麼都靠自己幹了。」

突然，她感到胸臆之間，有一股令人窒息的力量襲擊着，令她幾乎厲聲尖呼，或猝然暈倒。

她強自鎮定，踱入廚房，看見若詩在準備點心，便幫着她。

「你的表弟唸的是那一科？」她若無其事地問。

若詩看她一眼，沉下臉說：「史提夫已經有了女朋友。」

她搖搖頭笑一下，不知道是苦笑抑或嘲笑。

聖誕派對結束了。她表示可以順路送史提夫回宿舍。若詩替史提夫婉言拒絕了，但在客人中却找不到一位住近學校的，終於還是讓她送。

郊區的靜夜，車輛特別少。夜，要不是屋宇前一明一滅的燈飾，以為是凝固了的。她執着方向盤，望着遠景漸漸迫近，在眼前展現。他坐在另一側，侷促不安。

「你的女朋友為什麼不跟你一起參加派對？」

「女朋友？」他像是聽不懂她的話。

她點點頭，把問題重覆了一遍。

「我還未有女朋友。」

她把車子駛上路邊的沙地上，停下來。他詫異地望着她，心跳逐漸加速。

「你會否愛上一個像我這樣的人？」

「我……，我不知道，」他劇烈地口吃起來，「妳，妳……妳長得好醜。」

「是，我長得很醜，」她款然一笑。

「妳，妳又，又上了年紀。」

「是，我老了，」她笑得更得意，「還有呢？」

「妳，……」他吞了一下口水，「妳，妳不能這樣。」

「為什麼？難道一個醜陋的女人就不能追求愛情嗎？」

他整個身子顫抖着，額上冒出了汗珠。可憐的孩子！——她心中想。

突然，他推開了車門，逃出來，急步地向前走。

她慢慢地駛動了車，跟着他。

最後，他上了車，兩人默默無語。車子抵達校園後，他沒有跟她道別便入了宿舍。

始終，她未曾結過婚。

陶朱公

(電視劇本)

李 萬

「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

「史記」卷四十一

序

春秋末年，范蠡爲越王勾踐滅了吳王夫差，報仇雪恥之後，便辭了勾踐，駕着扁舟，載了西施，遨遊五湖，過了一段快樂時光。他却沒有隱埋下去。他雖和那些淡泊隱逸之士互相欽敬，樂與之遊；但他所學的富國術在他身上作怪，不去富國，便要富家，這滿腹經綸自然向外發洩，要使他自身致富。

開頭時艱難一些，比着去事君，去爲侯王師苦一些，等到後來富可敵國時，便王侯不換了。

開頭難，由越國帶走的，除了西施和幾個家人外，就是十來個搖船的奴婢。他的船隻沿海往北去，先在齊莒的海沿上，晒鹽捕魚，求其魚鹽之利，慢慢向裏發展，養起牛馬羊豕來。這時改名鴟夷子皮。這段生活最困苦，全家日夜勞動。西施原是浣紗女，縫縫洗洗，担任了全家的針線活。一雙兒女雜在奴婢羣裏去打魚放牧。他本是練兵的將官，上山下海，都能帶頭。更招納些亡命之徒，擴大他的鹽場牧場。不過十年，便騾馬成羣，車輛成行，轉而做起「交易有無」、「逐什一之利」的商賈事業。由東到西，自北而南，中原列國，他都行得通，走得進，各個大國京城都安了他的莊口。那時黃河平原上的陶國，地方雖小却是天下之中，舟車輻輳，四通八達，他選了這裏定居下來，乃以陶爲姓，朱公爲號。陶朱公三字便成了後世買賣人的祖師爺。

人物簡介：

陶朱公

陶夫人

陶嬌（又稱陶商）朱公長女

陶賈——朱公次子

陶器——朱公幼子

陶大爺——朱公老僕

陶能——陶大爺子

莊先生——楚隱士

孟蝶——莊先生弟子

田開六——朱公駐郢掌櫃

楚王

崔涓——楚太監

二流子，吳娃，獄吏等。



黃河平原上的春三月，桃李爭艷，楊柳盛發，一片欣欣向榮風光。

陶邸庭院廣袤，屋廈深邃，樓頭瓦際，槐榆招展，窗前簷下，花木掩映，前臨小溪，溪畔垂柳成行，駿馬錦車繫列門前。

陶朱公年紀六十五歲，鬚髮黧白，步履穩健，精神矍鑠，智慧丰盈，正臨案披閱簡冊，進行著述。

這是朱公的書房，寬大整潔，簡冊滿架，時有奴婢進出，送茶送衣，噓寒問暖。

一個丫環進來稟報：「朱公！陶大爺由楚國回來了，要見你！」

朱公漫不經心的說：「叫他這兒來！」

陶大年逾七十，是朱公的老家人，自幼的伴兒。身材高大，有點呼鍋腰，比朱公顯得衰老。他進了書房，見朱公正注意在書簡上，便道：

「朱公，放一放您的簡，我是由楚國逃回來的。賈公子在郢都殺了人。」

朱公一驚的站起來，問：「殺了誰，怎麼闖的禍？他呢？」

「叫人給逮起來了！郢那個蠻子地方，一見了點血，通街的人都喊：『殺了人啦！』『出了人命啦！』四城馬上就關門，那個兵像潮水般圍了來！我本來不想走，可是公子說：『你不回去送信，咱們都得玩兒完！這兒是殺人償命的地方，不論情理，不究原因的！』」

「殺死了誰？怎麼引起的？」朱公截住問。

「一個二流子，買賣人不像買賣人，公子不像公子的，——爲了個女人，朱公！那小子自誇劍法無敵，要賈公子把他相好的吳娃讓給他，公子那能讓？兩人便劍上見高低。就在章台上動了手，那小子真有兩下子，要不是我們的賈公子，換換別人，真得栽在他手裏！鬥了五十個回合，公子賣了個破綻，那小子中了計，一劍刺來，使老子，人向前衝，賈公子已到了他的背後，就那麼順水推舟，一劍插進他後心去，穿出前心來！」

「你幾時離開的郢都？」

「當天晚上，算來有十七天了，那天中午，我陪了賈公子去章台吃飯，叫了吳娃，沒有外客，殺了那小子後，我打鬧裏回到田開方的櫃上，日落前，他送我出城來，他說，他會去打點，隨時派人送信來！」

朱公沉吟一下，說：「你先去休息，我聽了田開方的信，再說。」

二

陶嬌和陶器沿走廊往書房去。

陶嬌年方二十二歲，美而健，衣着質樸，陶器比她小着十歲，天真活潑。兩人在書房門口遇上朱公，朱公剛出書房來。陶嬌搶上前去：

「爸爸，老二在楚國犯了事，您想出辦法嗎？我可就要去看看他，您不能叫晉國的大夫把他要出來嗎？關在那蠻子地方，怎麼受得了！」

朱公嚴肅的訓斥道：

「這麼點小事，你慌張什麼！我會想辦法的！等田開方來了信再說，大不過抵償！現在才春末，隔着立秋還有幾個月，急什麼！你和器兒哪兒去？」

「二哥殺了人，我想去看看他，叫他教我那一手絕戶劍法！」陶器邊說邊比。

「哼！你就是知道玩，不知道上進！」

三

夜分，雅緻的小廳，左右是兩間寢室，懸着綉花的門簾。

朱公一人靜坐，為次子殺人事沉入到回憶裏，陶賈和陶嬌是西施一胎生的兩個子女，那時正在遨遊五湖，夫妻極端喜悅。等他們北到齊莒，姊弟倆已經學步，跟着來的是他倆一面勞動，一面學習，八歲上，西施去世，隔了一年，朱公續弦，不久生下了陶器，生活雖漸好轉，但姊弟倆仍須堅苦的勞動，也習慣於勞動和堅苦，到十八歲上已是奴婢成羣，各國設了買賣莊口，陶嬌執掌北路，陶賈經常來往南邊……

陶夫人四十歲的中年美人，由左邊掀簾進來，關切的問：

「你在想什麼？老二的事怎麼樣，有楚國的消息嗎？」

「剛才田開方的一個專差到了，送來的信上說，老二在獄裏受不着苦，由他打點着。但是楚國的國法是殺人償命，死者姓熊，屬於王家的遠支，執法人更不敢徇私，一定要老二抵償，今秋便要處決！」

「那怎麼好？」陶夫人變了色：「你想不出辦法嗎？咱們多化點——」

我正在這兒想，」朱公截住說：「楚國有位莊先生是我的好朋友，當年互相欽敬，我寫封信求求他，打點一點禮物，叫器兒送去，他能救老二的命的！」

「器兒行嗎？十二歲的孩子，沒出過門，玩心重，不會誤事嗎？」

有陶大陪着去，一切陶大經理，有什麼不行的，器兒不過是我的替身，見見莊先生有如我親到，顯得鄭重一點，並不要他幹什麼事，等於叫他出門玩一趟！」

陶夫人狐疑不安！

四

近午，書房裏，朱公，陶夫人，陶嬌。

朱公習慣的踱着步，有時望望陶嬌，又看看夫人。

陶嬌正說着：「……這是我份內的事，該我去，怎麼好派老么去！他沒出過門，這麼遠，這條担子可不輕；萬一誤了老二的命，您不後悔？我可會一輩子埋怨您！」

朱公停下來說：「這只是送一封信的事，才派老么去，田開方既打不出關節來，這行賄的事就不要想了！老二

的命交給莊先生，以莊先生的智慧可以傾國傾城，個把人命在他手裏真是欲生則生，欲死則死，別看他是個閒散人，無官無祿的，我信他能打救老二，咱們的人去，不是去拿主意，不過送份禮物和一封信，要你去做什麼？你不管你北路的買賣了？」

「我去楚國一趟，也就不了兩個月，誤不了買賣上的事，您放心！」

「我還是認為器兒去比你合適！」朱公又走了幾步說。

「這我可不懂了，我還不及一個不懂事的孩子，那我真是枉活了這廿多十！」陶嬌憤憤的說。

「朱公！」陶夫人說：「我看就叫大姐去吧！她走東闖西的這些年了，你怎麼不放心她去送封信。器兒，不懂禮兒，我倒担心他貪玩悞事！萬一莊先生說，「怎麼叫這麼個小的來見我，沒有大人嗎？」人家一怪，作興不肯一——」

朱公沉吟着。

陶嬌堅決白說：「爸爸，我坦白的說，你叫小弟送信的主意我不贊成，人家說：『家有長子，是為家督』，我還不等於您的長子？這大的事，您不叫我去的話，人家會瞧不起我，說我沒用，我也就不打算活在這世上！」

朱公：「你——？」

「我會自刎！」

「這是怎麼說的，大姐，好好的怎麼說出這個來，朱公？——」陶夫人用乞求的眼光看看朱公。

朱公踱步，沉吟，然後坐下來，長嘆一聲：

「好吧！就依你們！或者天意如此！」

五

晚上，朱公在書房裏給莊先生寫信，陶嬌入。

朱公：「你來得正好，你還是男裝着去，叫陶商？」

陶嬌：「當然囉，誰不知道我陶商！若是女裝着出門，那可麻煩多啦！我是『易釵而弁，去女為商！』」

朱公：「你和陶大爺一塊去？」

陶嬌：「不，我和能哥一塊去，我一個女孩家和陶大爺一個老頭子作伴很不方便！」

朱公：「和他的兒子就方便啦！你這丫頭，真說得出口！你和陶能幾時成婚，早點行了禮算啦！」

陶嬌：「到非行禮不可的時候，再成婚不遲！他現在還是我的僕人！」

朱公，「誰說的？我早就和陶大稱兄道弟了，我瞧不起那些士大夫的酸門第，臭架子，咱們是商賈，叫他們對着我們的貨幣磕頭，你還想攀門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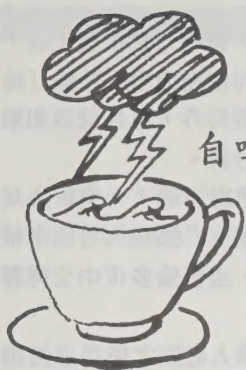
陶嬌：「爸爸，給你說句玩話，就認真的教訓我呢！我說能哥的衣裳不是僕人的衣裳？給我們商人雖差不遠，可多少有點兩樣！」

朱公：「他要商人打扮就商人打扮，有什麼不可？何必給我說！你們明早就走？」

「呵！」陶嬌只應了一聲。

（待續）





自嘲自受集

血 本 無

歸

關自守

我做咗咁多年生意，信奉嘅哲學唯一嘅「厚黑學」。七嘢馬克斯牛克斯，馬爾薩斯牛爾薩斯大家講吓就有所謂，千祈咪當認真。如果無產階級真係革咗資產嘅命，我哋呢班腰纏萬貫、腦滿腸肥嘅資本家，重有戲唱乎？又如果大力推行節育，減少人口，D嘢就少人買咗，又請人難咗即是人工貴咗，咁我哋呢班生意佬會猛蝕老本，變相嘅「為人民服務」矣。「厚黑學」者，我盡畢生之精神體索玩味，心得良多，叻過李宗吾都唔知幾皮。黑也者，就係祇顧自己唔顧人咗，有幾多賺幾多，不擇手段，人地死，人地嘅事；厚也者，就係做個樣出嚟照顧人地，呢度捐幾千，個度捐幾萬，大做慈善，成個救世活佛下凡咁。

普通D買賣，我嫌銀水嚟得唔夠快，於是做埋外圍狗馬焉，炒地皮焉，搞風搞雨，搞到天怒人怨。我D錢塞到成個袋都爆，亦有人走嚟鬧我一句「喪盡天良」，事關我係出名嘅大慈善家也。殊不知天道循環，報應不爽，以前我滾得人多，終於有一日畀人滾，以前我自認為係厚黑高手，偏偏就遇上一個厚黑絕手天下無敵，結果一敗塗地。

當我賺到滿盤滿鉢，做咗百萬富翁之時，一心就嚟住要做億萬富翁；啱啱香港興起炒股票，我就連忙買個不亦樂乎，炒呀炒，股票愈炒愈高，個心就愈睇愈開心，有班老友勸我話：「喂，老關，好收手囉，唔係話一跌親你就死晒。」正所謂人心不足蛇吞象，自己都知道係收手嘅時候，穩陣一D就應該開始拋售，但係睇住重可以賺，就不妨等耐D；做生意都要冒風險，更何況炒股票乎？於是就話：「車，使七急，咁快就縮沙，正有膽，依家正係旺季，重有排可以玩下。」殊不知講完呢句話有幾耐，恒生指數暴跌，一跌萬丈。哇，慘！事前一D迹像都有，一錢熟。個D外國大企業大商家，刮晒我哋D錢，重厚起副面，黑起副心，侃侃而言曰：「你哋呢班中國人，既貪又蠢。」我聽到之後，氣到七竅出烟，暴跳如雷，國罵省罵七都出齊，就奈佢唔何。

領過一次嘢，學咗一次乖。好在自己未激氣到發神經要去青山，「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於是又重頭起過，又做狗馬，又炒地皮，果然慢慢東山復出矣。重新艱苦經營，就得小心翼翼，唸起香港將嚟前途都幾暗淡，大陸政府話一聲「收番嚟」，個陣時又一錢熟？依家有人話：「喂，唔使杞人憂天，大陸政府唔會咁快收番者。」呢個道理我都知，但係自從股票慘跌之後，成個人變咗驚弓之鳥，唸住大陸政府始終會攞番香港，不如早D遠走高飛，於是乎，身挾巨款一飛，飛到加拿大 Toronto。

雖然講，呢排加國移民政策收到鬼咁緊，但係見親我哋班有錢佬就國門大開，任君入來，無限歡迎。等到我一嚟到多倫多，望唐人街一睇，咦？形勢大好唔！新唐人街的餐館好似雨

後春筍咁嗖嗖聲標，舖頭隆隆聲開，炒地皮嘅時候矣；於是開心到眉花眼笑。更加上一位房屋經紀舌粲蓮花，口吐珠璣，勸我快D買地買屋，更毫不遲疑矣，擺出巨額現款當場交易，面不改容。素來我祇怕錢少，唔嫌錢多，有錢時想更有錢，更有錢時就想最有錢，至於咁樣炒地皮法，有冇害咗附近D居民，冇心機研究。喂，有七怨言，千祈唔好賴晒我，唔關我事吓——你估炒地皮淨係我一個人咩。溫哥華已經有班唐人將地皮炒起咗，攞到好多入息低微嘅，或嘅年紀較大概住唔起，被迫搬走。依家多倫多亦因為地皮炒起咗，D屋租嗖嗖聲一路上昇，昇到有的商號做唔住要遷址，或索性執笠。呢個世界就係優勝劣敗，弱肉強食，唔面厚心黑，都幾難生存者，有七良心好講也。

依家全世界經濟鬧不景，而炒地皮則甚景氣。D人一聽到話 Inflation，漲價，個個煩到頭都漲晒，事關人工唔見得會漲也，所以佢地一聽見地價漲咗，有幾個開心者。但係我哋呢班搞風搞雨嘅炒家就唔同，見到的地價漲，就開心到手舞足蹈，樂極忘形，事關個荷包跟住漲也。

炒呀炒，自以為一到外國就得米，發佢一筆橫財。殊不知加拿大政府非吳下阿蒙，畀你哋的人嚟賺大錢。佢一早就睇準晒班有錢佬，有佢哋嚟加拿大投資，大表歡迎，但係偏偏唔想你响度發達。我响香港炒地皮個陣時，一帆風順，嚟到外國以為可以照碗照煲，炒佢個不亦樂乎，殊不知外國唔同香港，建築嘅不同區內隨時有不同嘅條例出現，我初到貴境，就唔清楚呢吓嘢，而且有人做咗手脚，勸我快D買，好似以前自己開大檔個陣時叫人哋落注一樣：「喂，老友，快落，快落」。見到個個猛咁落，心入便認真快樂，等到落齊注，一開，就叫：「通殺」！呢班友仔就個個都落晒空。依家我買咗屋正如落咗注一樣，忽然市政府攤牌，响華埠呢區訂咗新法例，唔到我地鍾意可以自由發，夾硬搵低咗地價。哇，慘，呢次又一錢熟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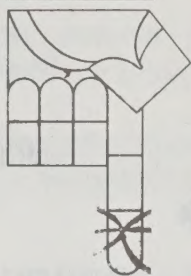
新笑林廣記

笑笑生

★ 因隱瞞水閘真相而被逼離職的前美國總統尼克遜，現在正在編寫他的回憶錄，據「新聞週刊」稱：他最近要求其出版商多給他一年時間去完成草稿，尼克遜所給的理由是：他在核對事實時發生困難，這當然是啦，美國人民亦化了不少時間才能審核出水閘事件的事實。

★ 據云：有某國際機構會議室的演講台上，有人刻上了一句對演講者的忠告：當論點甚弱時，可大聲高呼以壯聲威。

★ 英屬哥倫比亞省溫哥華市公務司署的一名成員最近入稟高院，票控該省政府及另兩名高級官員，控訴他們「剝奪他人的人格，使他天天枯坐無工作做」。該人可算甚有良心，空坐無工可做的政府官員實在多得很呢！



■ 誠如本刊的發刊詞上說：「唐人街的結構非僅是一系列的餐館及雜貨商店，它是代表僑胞的一個有形而複雜綜錯的社會組織。」近年來，由於北美洲的移民政策一度放寬，大量的華人湧入北美洲各地的華人社區，衝擊着數十年來沒有多大改變的體系，包括它的經濟結構，傳統社團的代表性，新的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的興起。舊有的勢力受着挑戰，新的力量正在形成。

多倫多市士巴丹拿東南區發展計劃的爭論，正好說明了這一點。

華人社區的發展應朝那一方面走？

誰來決定？

部份研究北美洲華人社區的人士認為，表面上，它是一個民族的聚居地、假日遊客觀光購物的場所；實質上，它却是殖民地，一個當地政府默許並蓄意培植出來的「特區」。

發展士巴丹拿東南區的初步計劃建議頒佈後，引起相當多的爭論，甚至有人喊出唐人街（多倫多市的）將要滅亡的口號。無疑，這是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誇大之詞。華人社區是否祇該局限於唐人街內，是值得關心華人社區前途的人士重新考慮的課題。部份人士認為從長遠計，華人應該「打入整個加拿大的經濟市場，而不應只局限於華人社會，不再封閉。」（參看本刊第二期，華人地產事業問題，訪問嘉年地產公司陳慶之先生，第十七頁）。保守的人士們相信祇要華埠繁榮，則華人在社會上的地位亦隨之高昇。

發展士巴丹拿東南區的爭論，帶出的問題既複雜且微妙。除了一直注視該事件的人士外，局外人也許未能了解個中真相。本刊為了使更多的人知道事件的起因、經過和目前的發展，分別整理了一些資料，訪問了三位有關的人士，和發表了一個團體的立場書，希望透過這些報導，引起讀者的興趣，來信討論。

■ 傳統的勢力既然受到挑戰，新的力量正在形成，這現象是怎樣產生的？「中華會館：它的創設因由和功能」除了在歷史方面展示一些鮮為外人知曉的資料外，並且就該組織近年在華人社區內的影响力作出精闢的分析。

■ 今年二月十五日，加拿大政府通過了一項新公民權法令。究竟那些人才有資格申請入籍呢。「那些人可以申請加拿大公民權」給大家提供了參考資料，由多倫多市中文傳譯諮詢處供稿，謹致謝意。

■ 唐人街是否一定要發展，華人社區才能得以持續下去？從滿地可郭唯理君給本刊的來稿中，大家也許有新的看法。

■ 由於語言的隔閡，接觸面的不夠廣泛，新移民往往喪失許多享受本地社會福利的機會。本刊從今期起，開始編輯一些有關福利的事宜和申請的程序。這一期，我們刊登了「如何申請安省政府廉租屋宇」，希望可以幫助為租屋的人解決居住的煩惱。

■ 月來加拿大幣值低貶，不時滙款往外地的讀者，一定十分關心加元是否繼續下降。于天君的「加幣的價值」解釋了加幣幣值下降的原因。

■ 過去一個月來，本刊收到許多各地讀者的來信，由於稿擠的關係，未能一一刊登。來信提到有關本刊的編輯方法、文章的選取等等，我們作了個別的回覆；涉及公眾事務的來信，則以時間性較重的為首選。其餘來信，一俟它日有空檔，定必刊登。讀者給我們來信，是本刊得到大家愛護的例證，還望大家不嫌編者的經驗不足，來信提出意見。



海外述林

The Crossroads

VOL. 1 No. 4
April, 1977

定價：加幣 75 ¢

第一卷第四期（總第四期）1977年4月號

編輯：海外述林編輯委員會

編輯部地址：加拿大多倫多市登打士西街二〇五號二樓C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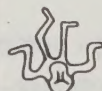
電話：1-416-598-0296

海外述林總發行處：

思雅書舍

加拿大多倫多市登打士西街
二〇五號二樓C座

電話：1-416-598-0296



EDITORIAL

Toronto's Chinatown is frequently drawn into the limelight of the mass media these days. Gone it seems are the days when Chinatown was no more than an 'elephant graveyard' where Chinese bachelors congregated for reasons of companionship and survival. More humane and liberal immigration laws towards the Asians drew an influx of new Chinese immigrants around the mid-sixties. More recently, Asian capital is also crossing the Pacific in search of a more stable environment for investment -- not a small part of it has landed in the major Chinatowns of North America. Toronto Chinatown, having experienced these changes, is taking on a new look. Multi-million night club restaurants are replacing the small traditional family-partnership type of operations. Spicy, earthy and ain't-nothing-but-real-good-food Hong Kong style eating places proliferate, leaving the sweet and sour chop suey house to the less adventurous palates. All this is happening within the gloomy milieu of the Canadian economic slump. Perhaps this surface glitter makes good media material, although one fears a new myth is also in the making.

Undeniably, external money and the increase of the Chinese population brought Chinatown a new vitality and flourish. A 'new Chinatown' is developing and thriving west of the Dundas-Elizabeth axis. Still, the idea and existence of a Chinese community is an elusive one. It has been pointed out that many of those who work and shop in Chinatown do not necessarily live in the area and those who do are not always its vocal and prominent members. However, a community can only come into being when the people living and working in it are conscious and desirous of its existence. Steps will then be taken by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to preserve and make it grow. In this regard, the development of a Chinatown community in the past was too often shaped by external forces from outside the community. This partly reflects the fact that larger social and economic forces are often decisive in shaping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ies, but also partly reflects the passive and uninformed attitudes of the people who live and work inside it.

There are signs of this changing recently. The South-East Spadina question galvanizes the interest and concern of many in the area. The issues basically boil down to the community's attitude towards the Part II plan, which was

in the process of being drawn up for the past five years. Perhaps it is useful to point out that the Part II plan is essentially a much more detailed study of particular areas designated by the Central Area Plan, which is designed to preserve and stabilize the downtown area of Toronto. One would imagine that as the plan claims to aim at preserving residential neighborhoods as one of its prime goals, the Chinatown community would have little to quarrel with. Not so, says the Chinatown Planning Association, an organization which claims the support of 25 organizations within the community. The association sees downzoning as a major issue of contention. They oppose the plan because they claim that its implementation will have very adverse and limiting effects o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Chinatown.

On the other hand, the Grange Community Coalition claims the support of residential and tenant organizations in the community. The coalition supports the plan in principle, explaining that downzoning is good for the community as it prevents land assembly,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 rises and the host of undesirable ecological effects on the community. They see this preservation spirit of the plan as progressive and beneficial to the Chinese community.

Although The Crossroads has some views on the subject, it is thought best at this time to simply let both sides articulate their own positions on the issue. The reader can likewise make up his own mind after he has investigated the issue. Hopefully, the two interviews presented here might provide some useful insight on the South-East Spadina question.

One way or other, we feel that the South-East Spadina issue is a significant event for the Chinese community. It provides a rare opportunity for debate and meaningful discussion on those questions which directly influence and affect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It is an issue which concerns everyone in the area, and everyone can and should participate in the debate. It is incorrect to downplay the issues for fear of polarizing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into antagonistic camps. We believe instead, that the genuine and relevant will emerge through debates and clarification. The well-being of the community depends on the conscious understanding of the issues affecting it.

INTERVIEW WITH

SAMUEL L.C. YANG

SAMUEL L.C. YANG, LAWYER, VICE-CHAIRMAN OF THE CHINATOWN PLANNING ASSOCIATION *

(* The views expressed here by Mr. Yang do not necessarily represent those of the Chinatown Planning Association)

THE CROSSROADS:

Who are the major officers of the Chinatown Planning Association?

YANG:

Mr. Fred Wong is the chairman, I, myself am the vice-chairman and Mr. Bill Tang is the secretary. There are 15 officers in the association who are elected from the 25 organizations which this organization initially represents.

THE CROSSROADS:

What is your interpretation of the major issues involved in the South-East Spadina question?

YANG:

The most important effect is that the Part II proposed zoning will inevitably curb or hinde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town. The Chinatown as we know it started around Queen Street and eventually moved to the area where the new City Hall now stands. Because part of Chinatown was expropriated for the site where the new City Hall is, it moved to Dundas and Elizabeth Streets. Because of a higher demand, Chinatown has since moved to this side -- Dundas and Huron. The way I look at it, in the future, if there is any room for growth at all, it will grow either to the north of Spadina where the utmost it can go is to College because right there is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Whereas south, we can probably go as far as Queen Street. But with the new development which, with respect to the growth of Chinatown business, we're really afraid it will stop the growth of Chinatown. We are concerned about areas like residential down zoning. Basically, we do not want to see no growth, but we are not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buildings like those on Bay Street or any extensive growth like that. What we are asking is that there is reasonable room for growth when the future demand arises. I see Chinatown as a baby -- it's growing and you just cannot kill it. So on that basis, I think this is the main problem -- whether the Part II proposed zoning fits the future growth of Chinatown.

THE CROSSROADS:

The Part II proposal covers an area from Queen to College and University to Spadina. Obviously you're not talking about the whole area when you talk about the growth of Chinatown.

YANG:

I'm looking at the natural tendency for the future growth of Chinatown. Of course, we are concerned with the whole area, but the direction of Chinatown will never go back to the east (of University). As far as

growth to the west is concerned, there's a big church there and a school there. There is room for growth, but the natural direction it will go is along the north and south. It is very possible in the years to come there will be an extension of Chinatown on Queen Street.

THE CROSSROADS:

With respect to the Part II plan, it seems that in relation to the other areas, the one bound by Queen and Dundas and the area east and west of Spadina is the most disputed area of the plan. The Part II plan designates it as a mixed industrial/commercial zoning area. What would you like to see happening in that area?

YANG:

Let me go back to the Part II proposals. Basically, the planners are saying that you can have five times density. It allows you to build two storeys -- the basement and the ground floor as commercial and you can build a five storey building as industrial. If someone elects to build only commercial, there will be a penalty attached which says he can build only one and a half times density. If that is the situation, I do not think it is proper for this particular area. The area immediately south of Queen on Spadina is zoned as industrial area all the way down to Front Street. Everytime I drive by this area, I notice the signs up with space for rent. There are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of vacant spaces. In this area, there are some industrial buildings and looking at it from my point of view, I would suggest this area for mixed use of industrial, commercial and residential. If this proposal is accepted, what I'm afraid of is it eventually will curb any development on Spadina. Spadina is one of the widest streets in the city. It is as wide as University and it could be as beautiful as Avenue Road. Speaking on principle, we are not looking for any very high, big development in Chinatown. Basically, I think we agree with the planners that this area should be kept as residential.

THE CROSSROADS:

You say you'd like to see mixed industrial/commercial/residential zoning for this area. What kind of density would you propose for the area?

YANG:

I am not in the position of proposing anything but I personally would like to see medium instead of high density zoning. I don't want to see (Chinatown) turn out to be another Bay Street or Wall Street. My main concern, as I have said, is that the majority of residents and businessmen in the South-East Spadina area are Chinese. In recent years there has been more development along this area (west of University towards Spadina). It is more difficult to work backwards (to old Chinatown). In that sense what we are asking the planners to do is think in terms of the future natural growth of Chinatown. Let us have a little room so that when we need some growth, there will be somewhere to go. If the Part II proposals are adapted, the only logical place to go is north of College and that's it. In the south, no one in their right sense will build industrial buildings there because the demand is obviously declining.

THE CROSSROADS:

Some say that Chinatown has already reached its capacity in terms of development, others say Chinatown is 'overdeveloped'. To what extent does the C.P.A. want the Chinatown area to expand?

YANG:

This is not true. We have to look at it in a more far-sighted sense. At the present time, the economy across Canada is going down, there's a high rate of unemployment -- there are problems everywhere, but then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better days to come and maybe there will be similar years like what we had in 1973-74, which were good years. I would like to see in the near future the economy of Canada more stabilized and at that time there will be a natural demand for growth. Basically, what I'm saying is that we should not only look at today. If Chinatown grows, it has to be a natural growth -- it's not a matter of somebody coming in and pouring in another million dollars. If that is the case, eventually it's going to kill the other small businesses. Assuming the fact that the majority of businessmen are small businessmen with groceries and stores, in the natural growth of it, it will bring more people to Chinatown, not only the Chinese but also the Canadian and people from the suburbs to shop and dine in this area.

I do not think it will affect any store here with the natural growth. If that is the case, every businessman in Toronto would be against development. Development does not mean the killing of businesses in this particular area. With more people coming in, there will be more businesses around. There are many stores in the Eaton Centre that have a similar business nature. Of course there is some competition, but with a better flow of customers, I certainly think they will retain or even increase their business.

THE CROSSROADS:

What precisely does the Chinatown Planning Association oppose in the Part II plan?

YANG:

I would rather leave that to the meetings in South-East Spadina but there are several areas over which we are concerned. There are the residential pockets in the north and south of Dundas Street, there's also the area north and south of Spadina and also an area on Dundas and McCaul. We'd also like to see a comparison between Queen and College. Basically there are five areas we are concerned about.

THE CROSSROADS:

The two residential pockets in the South-East Spadina area are designated as low density residential areas. What is the issue there that you oppose?

YANG:

Basically on the basis of potential for growth. One thing I agree with personally, is that I don't want to see this pocket changed to high rises. The way the area is zoned will make it very difficult for the present property owners. We have to admit the fact that none of these owners are developers. They are small people like you and I. Probably the whole family works hard to save up say \$5000 as a down payment and every month they chip in for the mortgage. What we are looking at is this: Because of the downzoning, it inevitably will cause the land value to be lowered. What is going to happen when the houses get very old or are beyond repair and the owners cannot afford repairs? Assuming the property owner wants to move, he can hardly find another building similar to that in another area for the same price because inflation is a fact and the rise in land values is also a fact. If the value in this particular area stays the same and the other areas go up, this small man's investment probably will end up nowhere.

THE CROSSROADS:

Are you suggesting that the existing zoning be retained, rather than adopt the Part II plan proposal of downzoning?

YANG:

I would like to see zoning such as R-4 which will give a bigger density. In other words, there will be room to build a relatively compatible building. The city has some "devices" to curb this area. Assuming that in this area you keep the height of 38 feet, then no developer can build anything higher than that. Also there will be development agreements with the city, so by using this as a device they can keep the area within the proposed intention. There are development agreements which have to be taken care of, there are setback requirements and also a height limit. As I said, I don't want to see this particular area with high rises everywhere, but there should be a reasonable room for growth where the people can move.

THE CROSSROADS:

You say you'd like to see the zoning changed to R-4 for example, where homeowners are given room to fix up their properties to maintain competitive prices on a city-wide basis. At the same time, doesn't that eliminate a lot of fixed income people from staying or moving into the area? Won't the prices be driven up?

YANG:

But it's not only in this area, the rent is going up all over the city. There are some devices which governments at various levels use to try to protect the people. The recent ceiling on rent increases is being reviewed for a change from 8 to 6 per cent.

THE CROSSROADS:

The Steering Committee has been in existence for several years. Alderman Dan Heap has said that notices were sent to the majority of businessmen in

the area inviting them to take part in the shaping of the Part II plan, and yet the Chinatown Planning Association is only coming out now. Why wasn't there more active participation on the part of the C.P.A.?

YA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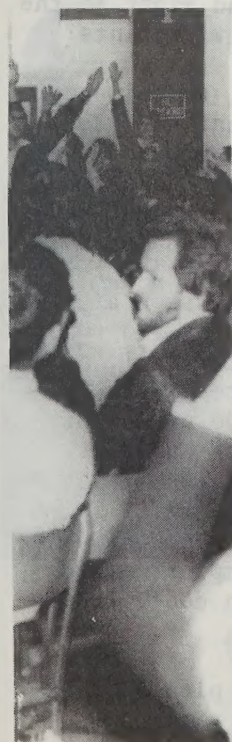


You will definitely agree with me when I tell you that the area west of Spadina was never included in the Part II study until very recently. It may be individuals that Mr. Heap has approached, but I do not think that the majority of property owners or tenants received any notice at all. As it has been disclosed in Jack Hill's presentation to the planning board, initially he sent out 700 letters. I'm not saying these people are not working. I appreciate the work they have done for the community and notwithstanding we hold different views, it's only a different view that's all. In the initial procedure of the Steering Committee, they sent out 700 leaflets. Subsequently the procedure they adopted was that the people who attended a meeting would receive minutes and notices of subsequent meetings. If they did not attend the next meeting, they would not receive any minutes or notices. By the way the procedure is set up, it will effectively discourage people so that fewer people will come. I also know that you can request to be put on the permanent mailing list. Some people do, but I think the majority of people do not or are not aware of this. I have read through the minutes of meetings for the past two years; the average attendance is about 15. In some meetings there were as few as 8 persons including the planners. It's very difficult to say that some 8 or 15 or even 20 persons' opinions will represent the opinion of the whole community. It's only been very recently that there has been a great deal of involvement of community members. Of course because they are more aware of the situation they may agree with the planners or they may agree with the way we think, but that doesn't matter. By having more people participate and express their views and opinions, I believe that only in this fashion we will be able to contribute more to the planners.

THE CROSSROADS:

The University Settlement House has been instrumental in pointing out what they consider to be some undesirable side-effects or defects of 'overdevelopment' of the area. They point out that the existing social, recreational facilities, roads and parking facilities cannot adequately deal with a dramatic increase in development. They advocate the preservation and stabilization of the existing situation. How does the C.P.A. respond to this?

YANG:



I certainly agree with them when they say we should have more recreational, parkland and services in this particular area. I personally agree with them that there is not sufficient park in this area which is always the case in downtown. I do not know how we're going to solve this problem, but I agree with the way they look at it. I agree with them in principle, but as I said, I am not looking for any extensive development such as high rises in the area or anything of that nature. What I'm concerned with is that when the time comes, there is a necessity to grow, there is room. That's basically what we're saying. Whether the people along the area will put up apartments may or may not happen. I know the Mambro's have this in mind. Lotus Court in their initial plan I think proposed to have residential and subsequently dropped the idea. It all depends on the particular individual. They have to calculate whether the investment is a sound investment or not.

I personally would like to see more housing put up where more people will benefit and I agree with the planners and committee members that the low-income people should be taken care of. However, we have to look at the community as a whole. We want to take care of the low-income, moderate-income people and also the businessmen and property owners who might have a conflict of interests because of their different viewpoints and positions. They as planners and those of us who are very involved in community planning would like to see some of the problems resolved and I can see because there is a difference of interests, maybe there will have to be some kind of compromise on the part of different groups so that everyone will benefit. If we only take care of one area and ignore the other, I don't think this is the way the community works.

INTERVIEW WITH

DOUG HUM

DOUG HUM, CO-CHAIRMAN OF THE GRANGE COMMUNITY COALITION.

THE CROSSROADS:

How and why was the coalition formed? What is the coalition doing presentl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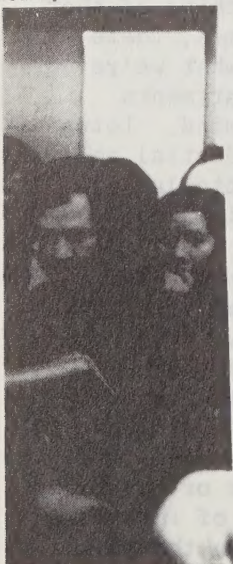
HUM:

I think it was basically in response to those meetings on South-East Spadina in which the businessmen and their followers started coming out in large numbers, who were critical of the planners and were denouncing the Part II proposals. They made all kinds of erroneous statements such as 'it's going to devalue the land price', 'it's going to cause expropriation' or 'it's going to restrict housing', etc. Prior to this there had been a number of individuals working with the planners and each other in addressing themselves to a tentative support position of the Part II plan proposals. It was discovered that a number of people from various organizations were sympathetic to the Part II and a few people thought it would be useful to get all these people together to form a common front to deal with the Part II plan. So it was decided a steering committee be set up to hold a founding meeting of all community groups in South-East Spadina which was scheduled for March 27. We subdivided the members of the steering committee to make contacts and each of us was assigned certain groups to contact. We had representation (for the March 27 meeting) of close to 20 organizations at the founding meeting and 10 put in their names to support the founding of the coalition.

THE CROSSROADS:

Some people interpret the South-East Spadina development issue as one between Chinatown versus city encroachment, later it was interpreted as the Chinese community versus certain non-Chinese members in the steering committee. Some even see it as a polarization between the left and right in the community. How much credence do you ascribe to any of these viewpoints?

HUM:



THE CROSSROADS:

At the public meeting prior to the founding of the coalition, certain businessmen and representatives of large property holders said that the plan was formulated without the consultation of the Chinese, so they based their argument on the grounds that City Hall again was trying to push Chinatown around or destroy Chinatown. It makes me laugh when I see the recent Hong Kong investors coming and saying Chinatown has been pushed around and they're trying only to capitalize on the sufferings of other Chinese, trying to make money on what other Chinese had to go through. Certain businessmen are using the racial issue based on the fact that there was insufficient Chinese participation in this steering committee meeting, but that's not the fault of the steering committee. Over the last five years, the steering committee has made every attempt to contact the Chinese businessmen. 50,000 pieces of literature were distributed. Every single door was knocked on and every single household was called on at least once. When I was chairman last year (of the steering committee), I had a leaflet drawn up specifically inviting businessmen to come out to meetings, but nothing happened. Now they're coming out in great numbers because it's reaching completion and it's putting certain restrictions on the area the businessmen don't like. They're seeing it as a threat to making great profits.

What are the issues as the coalition see them in the Part II plan as they pertain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town?

HUM:

In principle, the coalition approves and supports the Part II plan. The principle here is that the Part II views the area as a viable low density, low-income residential neighborhood. It sets out to keep it that way with such things as preserving existing housing and discouraging land assembly, the replacement of existing housing stock, discourages expansion of the commercial area and generally makes the community more livable and safer. The crux of the issue of downzoning is really whether one wants to preserve all that or not. This really upsets land speculators and real estate people -- Chinese and non-Chinese.

THE CROSSROADS:

The Chinatown Planning Association claims that if the Part II plan is implemented, it will effectively limit the future growth of Chinatown. How true is this?

HUM:

The Part II plan is designed to limit the expansion of the commercial area. I understand that the C.P.A. interprets Chinatown as meaning Chinese restaurants, curio stores, boutiques, dressshops, grocery stores, etc. The Chinese community is not just the restaurants, the bricks, the stones and the mortar, it's the people. Without the Chinese people, you'd have no Chinese community. Without the plan eventually you'll have the same kind of Chinatown in this area as you had in the old Chinatown -- 25 to 30 years ago on Chestnut, Centre, Armoury -- all these streets were like South-East Spadina. You had houses with families in them. The forces that destroyed that were the kinds of forces which I feel the businessmen would interpret as good for business. The kind of development that takes place on Dundas and Elizabeth Streets needs the office tower, the traffic and congestion, it needs the destruction of the residential community. In fact, I would interpret it as the commercial area cannibalizing the residential area in order for it to develop and grow. I see the same thing happening in South-East Spadina. Without the plan, it will certainly be very difficult to prevent Chinese real estate developers from assembling land and destroying the residential community the same way old Chinatown was destroyed. Sure, City Hall expropriated and took a large chunk out of it, but the kind of unplanned development around then encouraged that. If there was some organization like the South-East Spadina steering committee or central planning in existence then as there is now, there probably would be a different story and different approach to building the new City Hall.

THE CROSSROADS:

Does the Part II plan limit small business expansion in the future?

HUM:

No. The small businessman can do everything he wants within the guidelines of the Part II plan except expand into the residential area. This is what many businessmen wanted to do -- to move up to the side streets and convert the ground floor. The plan restricts commercial activity to the arterial roads. This is good for the community as the plan recognizes that this is basically a low density residential area. This is the approach of city council in recent years in that it expresses concern for neighborhoods. This is because it has seen the destruction of many neighborhoods in the 50's and 60's when the trend was big development growth that brought up the Toronto Dominion Centre, the Bank Towers, the C.N. Tower and a few other projects. But with that you have to pay a price and that price is the loss of your neighborhood. One can look at Chicago and New York -- you have total growth there and what kind of city do you have -- New York is totally unmanageable. The core is rotted away and the middle class is living in the suburbs leaving the low-income people rotting away in the city. When Mayor Crombie took office, city council felt that this was not the kind of direction that Toronto should be heading toward. They've set out to preserve the neighborhood and that's why we have the Part II plan which basically reflects the spirit of preservation and stabilization of the downtown core.

THE CROSSROADS:

Of course, the Chinatown Planning Association is not saying, at least formally, that they want to build high rises and develop the area on the scale of downtown New York or Bay Street. What they are saying though, is that they want to see an area reserved around the 'new Chinatown' area for the future expans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business and residential area. And they see the area north and south of Dundas on Spadina as ideal and strategic in this

regard. If the Part II proposals are implemented, won't that limit the (present and future) commercial and residential expansion of Chinatown? What will the direction of the future of Chinatown take?

HU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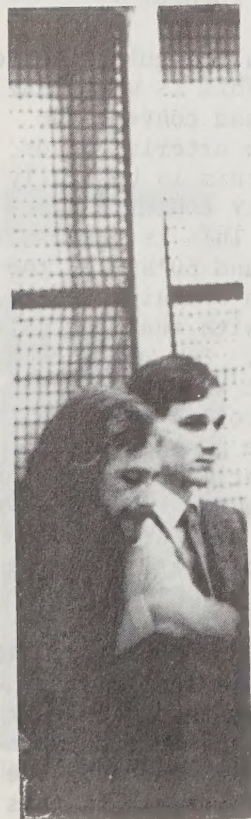


THE CROSSROADS:

There are several questions there. But basically I think the C.P.A. is directly concerned with their investment around the Dundas-Spadina area. When we negotiated for the settlement of Dundas Street West, those businessmen who came to meetings expressed no desire to specifically develop the Spadina area, specifically the area south of Dundas to Queen. Now these were property owners of Dundas Street. Now the group that is coming out is an entirely different group. The people we negotiated an arrangement with are not part of the C.P.A. I think the C.P.A. is saying that Grange, Sullivan, Baldwin and D'arcy are streets to grow and expand. I see that as an attempt to fatten their own wallets because the people that are involved in the C.P.A. are people who are in the real estate and insurance business. They see that if residential areas are changed into commercial zoning, they can go in to buy and sell properties to investors from overseas who want to develop commercially. If the area is not downzoned, they see that as a better opportunity with the higher density as a better selling point and a greater opportunity to profit by buying and selling properties. I see that now there is a tremendous desire by overseas capital to get over here; to get out from politically unstable areas of Asia and into stable areas such as North America. Without downzoning, it is more feasible for them to assemble properties and have a great opportunity to turn over the residential zoning to commercial zoning. The downzoning puts a severe crimp on this kind of activity. When the area is zoned as one times density, the real estate businessmen will have a very difficult time selling properties to developers for development.

Another aspect of the plan which the C.P.A. takes issue with is that they point to downzoning as restricting the rebuilding and reselling of the existing housing in the area -- some of which are 80 to 90 years old.

HUM:



First of all, I don't see the average home owner in the area as someone who purchases a house for speculative or profit motives. They purchase in this area because they like to live in this area and make a home here. Chinese families have a preference for their children to grow up among other Chinese so that they can preserve their language and to a degree their culture and also take advantage of Chinatown to fulfill their daily needs. For the Chinese to give up these amenities, they would be paying a high price for them. As to the point about 80 to 90 year old houses being too old in the area -- in Quebec city, there are houses that are three hundred years old. This goes back to the need for city council to preserve neighborhoods. Especially in the South-East Spadina area which played a great part in the history of this country. To demolish this neighborhood would be asking this country to give up a great part of its heritage. Some of the founding fathers lived in this neighborhood -- John Brown, Robert Baldwin, D'arcy McGee, McKenzie King, for example. That's why the city council has come out with the Heritage Act to preserve these historic houses. Now as to the argument about the houses in this area being too old, that can be completely refuted by the City Buildings department. They did a study in 1972, and concluded that 98 per cent of the houses in the area are in good structural condition. If rehabilitated, they can last for many, many decades to come. When you look at the city's non-profit housing on the Hydro Block and on the Dundas-Beverly site, these are fine Victorian mansions, with a little bit of care and money, these houses are good for at least another century. The city recognizes this, so the three levels of government have gotten together to initiate a rehabilitation program for this neighborhood and it's called the Neighborhood Improvement Program in which federal, provincial and municipal funds are available for the rehabilitation of the neighborhood. Another aspect of this program being the residential rehabilitation assistance program in which loans and grants are available to home owners in the neighborhood for them to bring their homes up to housing standards. The inspectors and names of contractors are supplied free. All the homeowner needs to do is to put in an application and obtain two estimates, work with a building inspector and see the work is done properly. The maximum amount of money available under this program is \$11,000 and depending on one's income, \$4,000 of

that is forgiveable. Say if a pensioner applies for that -- he gets \$4,000 as a grant right from the start. If the cost is below that, he gets it done free. If it is above the amount, it is payable probably up to 20 years at 6 or 7 per cent interest.

THE CROSSROADS:

Some say that Chinatown is already overdeveloped in the sense of the myriad of curio and grocery stores, restaurants, etc., and that the rent in the area is already too high for small businesses to make it as evident in the many vacant stores in the Spadina-Dundas area. Could you comment on this?

HUM:

This ties in with the fact that all the forces which destroyed the old Chinatown are present if we don't restrict them with the Part II. Large parts of South-East Spadina are assembled already, especially the areas between McCaul and University Avenue. These are held by the really big developers, such as Windlass, Y & R, Hydro, Belmont, Canada Trust, etc. I guess the city has already drawn a line in that there is enough of this wastage in the existing housing, so that's why they have set out to conserve the neighborhood. I look at the Chinese real estate interests that are coming in as small fry compared to these big developers. They got on the bandwagon a little too late. They cannot compete with these big developers and yet they still want to profit from this area and the only avenue that is open to them now is the small Chinese property holder in the area -- that is, if they can sell their idea in terms of selling this land to developers. So they have come out in recent steering committee meetings saying all these things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town being restricted and so on, because if they don't destroy the Part II plan, it will be quite difficult for them to profit from the area. But in doing so, they run counter to city policy, which is to conserve the neighborhoods. In a sense, they are a little too late.



BOARD OF EDITORS

Chinese Section:

Lee Wai-man
Chan Chin Cheung
Rex Chiu
Ho Lok San
Fong Chi-kau
D. Yiu

English Section:

Frank Moy
Ann Quon

Contributing Editor: Johnny Sam

Photography: William Y.T. Wong

Production this issue: Chan Chin Cheung,
Rex Chiu, Mary Chong, Fong Chi-kau, Ho Lok
San, Lee Wai-man, Frank Moy, Ann Quon, Nancy
Tong and Angie Tsang.

THE CROSSROADS is published monthly by The Crossroads Publishing Company at 205 Dundas Street West, Suite C, Second Floor, Toronto, Ontario M5G 1C8. Contents may be reprinted by obtaining written permission. Subscription rates: One year \$9, libraries and institutions \$13. (Outside North America, second class air mail \$20). To change your subscription address, please send your new address with your old address to THE CROSSROADS, at least six weeks before you move. Manuscripts should be between two to four thousand words in length and will be returned when accompanied by a stamped self-addressed envelope.

multiculturalism

and

schools

MEI HUA

In December 1974, students entering classes at Ogden and Orde Street Public Schools were greeted with the words "ni hoa ma?" Instead of the usual "Hello, how are you?", most of them were hearing the familiar sounds of Chinese they heard every day at home. For half an hour each day, these students take part in an experimental program designed to teach them Chinese culture and language -- a program that was approved by the Ministry and Toronto Boards of Education after more than a year's struggle with Chinese parents at both schools.

Back in 1973, there was a feeling among Chinese parents that their children were rejecting their ethnic and cultural heritage in favour of the dominant Anglo Saxon North American culture. Mostly immigrants, they could understand a system that taught everything you needed to know about survival in Western society, but not one that robbed their kids of the ability to understand their own language and culture. So they turned to the educational system and pressed for multicultural rights in their schools. After all, weren't the seats of Ogden and Orde being warmed by over 80 per cent of their own and didn't parents have a stake in their children's future? They knew education was a springboard out of the ghetto, but they also wanted their children to know they'd be climbing out on the sweat of their parents' backs.

It took 18 months of meetings, negotiations and desk pounding before the Ministry and Board of Education finally approved the Chinese Bicultural/Bilingual Program. While this and similar programs in Greek and Italian have signalled a new era in preserving ethnic culture in the classrooms, the fact that such programs exist is a tribute to the persistence of minority groups in maintaining cultural integrity, rather than to the system within which they function.

Ten years ago such programs would have been rare indeed, but during those years forces were at work to make the concept of multiculturalism a political reality. The relaxation of federal immigration policy and a burgeoning economic order saw such a vast influx of immigrants from Asian and Third World countries that the social fabric of what was a predominantly Anglo Saxon society was being visibly altered. In its place was a multiple culture society which has since been incorporated into a policy of multiculturalism and embraced by all levels of government and institutions. However, it wasn't until May 1975 when a six member work group on multiculturalism produced a report for the Toronto Board of Education that informed us over half the children in Toronto's schools were learning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It also said the culture being conveyed by the schools was "no longer compatible with the cultural base of the society which supports its endeavour". It went on to recommend that ethnic language and culture programs be expanded; that administrators and teachers undergo a program of 'system sensitization' to adapt to newcomers' needs and that the curriculum be designed to reflect the contributions made by different cultural groups in Canada.

While their recommendations did much to accommodate the New Canadian student into the system, their approach was far from new. The drive to restructure educational needs first began back in 1962, when a research report prepared by the Toronto Board of Education's research department suggested children be taught in their native language and gradually be given increased doses of English until they could be weaned into a regular program. By using their native language to teach other subjects, it would allow the child's education to be carried on uninterrupted from home to school. Also, by incorporating the student's cultural heritage and daily experience into the curriculum, it would foster self-pride and confidence in the student.

The rationale of both studies is based on the belief that children should not be penalized for cultural or linguistic differences, nor should they feel compelled to conform to a school sanctioned culture by forfeiting their own. For years the Chinese, Greek and Italian communities have fought with the Board of Education over this last point-- publicly, they said the Ministry and Board of Education supported the concept of multiculturalism, but its practices were more along the lines of Anglo conforming assimilation in the classrooms, where teachers and administrators alike instilled a negative attitude in the immigrant child toward his native culture.

It's hard to see the schools as models when the head of the place is overheard to make snide remarks about the immigrants.

There's great objection among the teachers by and large. There is a position that if you let them use their own language they will never learn English. It's garbage but that's their argument. I remember a discussion at a big high school and eventually it came down to 'you know, let's face it, we are talking about peasants, and who wants to go back to being a peasant.' That's what was said from one table in the room and nobody else said anything. Nobody rose up and said, 'that's a lot of baloney.'

Although the rhetoric for Canadian society is cultural pluralism, the reality is assimilation in Toronto's educational system. It is only when we look under this mantle of cultural pluralism that the real issues emerge about immigrants in this country and we begin to see how the policy of multiculturalism conceals the dilemmas many immigrants are faced with. It is a bitter reality that many immigrants get shunted into the most menial, low-paying jobs in the country. Often language proficiency, job skills and education are tools they lack to get out from under the labour pyramid. If this is the case, two questions arise. Are the problems of an immigrant child the result of ethnic differences which socially sanctioned institutions like the school system can't comprehend, or are their problems the result of deeper social and economic factors -- that they come from poor working class backgrounds? Statistics from the Toronto Board of Education point to the latter.

The evidence in the recently revised 1975 Every Student Survey shows that a key factor in determining how far a child will climb on the socio-economic ladder may lie not in his ethnicity as much as in his class background. The study indicates that a higher number of non-English speaking immigrants end up in the dead-end two year or vocational programs than do their English-speaking counterpart. While this suggests that there may be a lack of motivation on the immigrant child's part, it ignores one important factor -- the socio-economic status of the child's family. Whereas higher income groups have a 90 per cent chance of being in the five year program, that figure for low income groups is reduced to 40 per cent. Immigrant families are twice as likely to occupy a lower socio-economic class than their Anglo counterpart and a middle-class immigrant child does just as well as the Anglo Saxon child. So the problem isn't cultural.

In Toronto's highly streamed educational system, the only time language is a handicap is a year before the grade eight streaming out process. Children of families who immigrate at this crucial time more often than not are herded into the lower stream dead-end programs because they have lost vital time needed to learn English.

The rhetoric of cultural diversity is no better than an idealized dream to most immigrants and minority groups as there is little question of the need to learn English as quickly as possible in order to function in a school sanctioned society. However, to ignore and penalize a student for his ethnicity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is to teach a child that forgetting his native language and culture is the other half of learning English.

Despite the recommendations of the work group and ethnic community members for increased ethnic language and culture programs, the school board continues to resist such measures as pandering to ethnic interests. The response of the board to multiculturalism is germane then to understanding how immigrants are treated in this country--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ose immigrants have just arrived or been here for generations. Take the Chinese for example. They have a long history of working and helpi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country, yet from their initial presence, skin colour, language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were considered by the dominant white society to be so great and total assimilation so impossible, they were alienated and oppressed by social and economic institutions, the educational system among them. Thus, the efforts of groups like the Chinese, Italians and Greeks today to protect their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identities is a response to preventing the total destruction and disappearance of their ethnic heritage.

The concept of multiculturalism in the schools locates one of the most persistent problems facing minority (non-English speaking) members today -- equal rights. Certainly the public institutions, the people and politicians alike perceive Canada's social fabric as too delicate to sustain the scores of cultures that thrive here. The Chinese, Greek, Italian, Black and other minority groups should then address themselves to the problem of equal educational rights for non-English speakers, if they are to maintain and secure their cultural integrity. Indeed, the deficiency in the educational system lies not in its inability to diagnose the dilemmas immigrant children must face so much as providing a meaningful education for them, particularly those from low-income and minority (non-English speaking) backgrounds.

The concept of Bicultural/Bilingual programs and the work group's recommendations have shown the potential exists for immigrant students to receive a meaningful education without great psychological displacement. However, 30 minutes daily can hardly provide much less preserve much cultural or linguistic heritage. Certainly the school system has allowed B/B programs into the schools, but they are hardly an integral part of public education.

Hopefully, the concept of B/B programs will not be lost on a few token programs and the lack of response from the educational authorities will provide the impetus for more vigorous B/B program to prevent the high drop-out rates, low achievement and lack of self esteem of immigrant students.

Oh Canada!

lament of a foreign student

Xue Yung

It has been more than three years now since I trod the soil of Canada as a foreign student. Canada used to give me an image of harmony and freshness, and it is somewhat regrettable to think that this image has to change just about a year before I return home.

I have visited quite a few countries, and in almost every case I have retained a good image of each country. Not so with Canada. Maybe it is because of the long stay here, or maybe because Canada has struck me as such a beautiful and democratic country when I first arrived.

I can still vividly recall the early autumn sun that greeted me when I first arrived in Toronto and the cab driver who waved me, illegally as I afterwards learnt, to his cab at the Toronto International Airport. Aggressive, but open, he explained to me how he made more money driving a cab than an assistant professor with a Ph.D. Two other Torontonians I met also impressed me a great deal. One was the old lady who looked after the tourist rooms where I stayed the first few days. She was of the opinion that the people in that neighborhood were so honest that I really did not need to lock up my luggage. The other was another old lady living in that area who complained hysterically how the government and the corporations were putting chemicals in the food to poison people. I did not understand her, though I looked upon both as lovable people.

Soon I moved to a very friendly co-op house. I had an excellent Canadian roommate and several very nice house-mates. It was with these people that I went on a canoe trip for the first time, tried sailing on Lake Ontario, experienced dope though I avoided inhaling and also learnt to know the families of two of them by spending a weekend or two at their homes.

"We have a very good country. Unlike most countries of the world, we do not suffer from wars, earthquakes, typhoons or high crime rates.

And we have a very capable prime minister, Mr. Pierrerr Trudeau," my roommate Ron often told me, and I agreed. The movies 'Catch the Sun' and 'North of Superior', both of which I watched several times at the Cinesphere of Ontario Place, tended to confirm these beliefs.

Canada being such a good country, I failed to understand why and how my friend could indulge in beer and dope to the extent that he did. He was studying at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Law School, had a professor father and had apparently done quite well as an undergraduate philosophy student. He often complained about this and that. Certainly he had a very strong personality or more appropriately, a strong ego. While drinking bottle after bottle of beer, he was always singing in a rather hoarse voice tunes unfamiliar and uncomprehensible to my ears. The only thing I disliked about him, however, was the way he left the kitchen in such an awful state after each meal. I always wondered about him. He must be very smart to be able to go through university the way he did. I would have thought that anyone who got admitted to law school would be in a very good position to serve the country, if not himself or his family. What then, was he dissatisfied with? Then there were "Iron Lung" and other kids in the house who would spend several hours a day 'stoned' and 'high'. I did not know if these new ways were part of the "culture shock" that people often talked about. But I lived comfortably with them and in fact I liked them a lot.

Then I spent my first winter in Toronto. It was harsh, but beautiful most of the time.

The next year, we had several new faces in the house, but it was still friendly and easy-going. The house was generally too noisy for studying. John and Tony were still making the "horse-scream" every now and then and the speakers from John's room were producing exciting rock and roll. Ron, who had decided to take a year off school, was no longer living there.

That year I made friends with an artist living close by. He was very fond of booze and he told me how he was fired for drinking on the job while working in a hotel. He was in his late forties and living singly. The studio where he worked and lived was badly ventilated and smelled strongly of paints. He told me his income was highly unstable and whenever he could not afford to have both food and booze, he would choose the latter. He looked like a real artist to me: a man insisting on living his own way, carefree and bent on creating shapes and shadows on his canvas, and seldom complaining about the apparent poverty in which he often found himself. He did not seem to have much to do with the rest of Canada beyond the production of some pictures that some Canadians choose to collect.

Talk of "multiculturalism" quietly intensified over the months. It was a very noble goal I thought. Multiculturalism implied racial, cultural and religious tolerance. Canada, having an official policy of multiculturalism, must be one of the most peaceful, or at least one of the most peace-loving countries in the world. It happened that this year I got a fellowship from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and I was very glad that I received financial support from Canadian sources. I was very proud of Canada and rather critical of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which only gave me partial support during my M.A. year and would not support my studies in the doctoral program. I thought, from whatever sources my support came, society was investing in me with the expectation that I would contribute worthwhile efforts in return. I did not want to disappoint anyone who held strong hopes in me.

While my feelings for Canada heightened, there gradually emerged a movement against racism. What was all the fuss?, I thought. I knew that quite a few reports of 'racist' attacks were substantiated, but my concern for racism was only peripheral. I was able to dismiss such reports as merely reflecting the imperfection of men or human nature. I was not sympathetic with the "Ban Banfield" movement, which held that since Edward Banfield was a "racist", he should not be allowed to speak at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I was all for freedom of speech. Why not let him speak first and then voice counterarguments?

It was said that Banfield and other "racists" spoke with the benefit of wide (media) coverage. If so, my answer was that to solve the problem, the right approach was, instead of preventing him from speaking, rather, to try to achieve an "equal degree of freedom of speech". That is, the adequate representation of different views.

Given my high regard for Canada, I was able to convince myself that despite various complaints by people, what was wrong more often had to do with the complainant than with Canada, and at other times where such was not the case, Canada, like any other country, simply could not be perfect. Things would get better if the minds were the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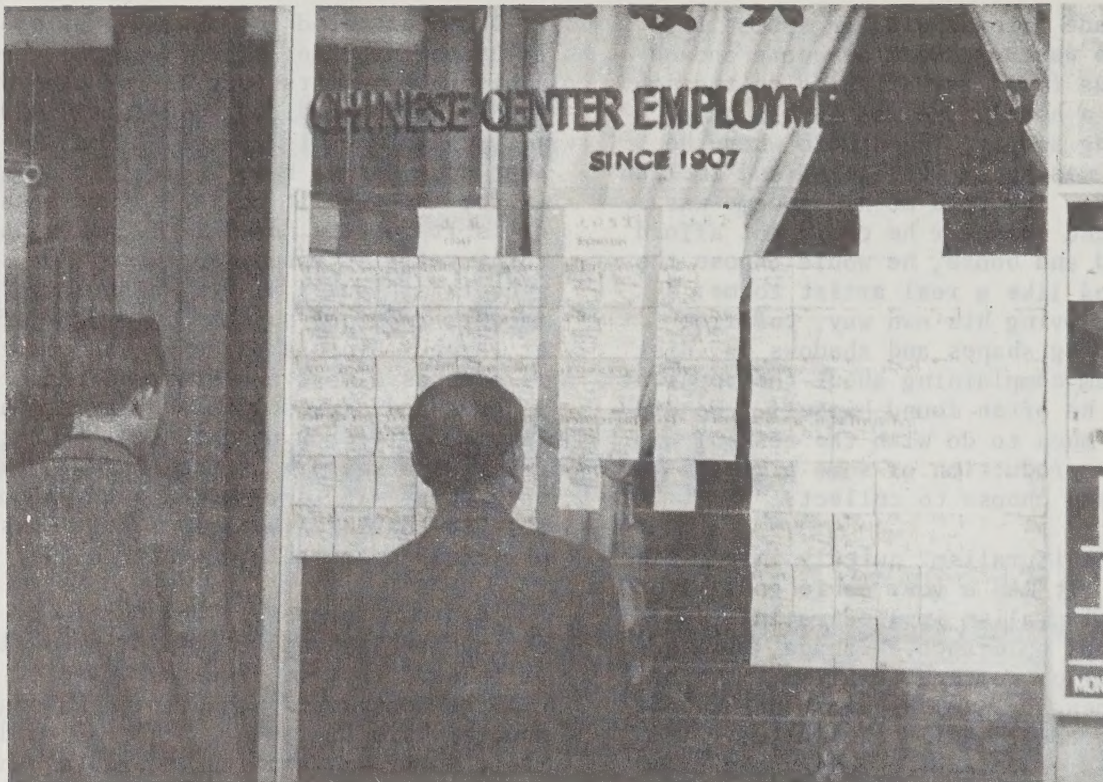
I did not need to wait long before my disillusionment came. There was the charge that 'Chinese' students took 25 per cent of all the places in the medical school at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This charge is crazy", I thought. What does Canada have medical students for? Is it for the benefit of these future physicians or is it for the benefit of Canada that the country trains them? Racist or not, the proponents of such a view must have sectarian interests in mind, not the interests of Canada at large. Since a place in the medical school is seen as almost a guaranteed ticket to high incomes and a prestigious future, many people have come to look upon medical education primarily as a stepping stone to serve these private ends. It is remarkable how people are able to convince themselves that this is a perfectly honourable and natural way of thinking.

Then came proposals for quotas in the engineering faculty and other professional faculties. It is said that in times of crises, it is natural to look after Canadian interests first. I doubted this statement. I began to differentiate between "Canadian interests" and "the interests of some Canadians". Some Canadians were certainly looking after their interests first.

Then came the cutback of government support for a number of social services, including the closing down of a number of hospitals in Toronto. I thought this was absurd. The policy suggested that Ontario could not afford to have so much social services and so much health care. By closing down the hospitals, Ontario was in fact passing along some bills to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n payment to unemployment benefits. It occurred to me that Ontario was merely doing what was expedient, neglecting the quality of social services and the national interest. Even more disconcerting was the fact that while essential services like health care were being cut, there were complaints from some civil servants that they were not given enough work to do. The government seemed to be keeping many underemployed civil servants on their payroll, while undercutting some public services.

Is Canada really going broke? The thousands of eggs that turned rotten because the price wasn't high enough; the artificial maintenance of high milk and dairy products prices;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practice of on and off lighting at Robarts library at closing time, notwithstanding complaints that such a policy wastes electric energy so much so that the money saved could be used to finance all expenditures of the Department of Criminology -- all say no.

If Canada is not really going broke, then it is at least acting as if it were. For example, many provinces have already decided to raise the tuition fees for foreign students who, at the same time, cannot be gainfully employed, lest they take the jobs away from Canadians.



I almost cannot believe my own eyes and ears. Despite her rich resources and favourable man-to-resource ratio, Canada seems incapable of standing up as a nation of responsible citizens. Recent records show that Canada holds the world's record for hours lost per thousand workers due to labour disputes and strikes, losing five times as many man-days per thousand workers as Britain.

Over the years I have become more conscious of my role as a foreign student. I feel that I am no longer welcome in this country. People are quickly building up an image that we just help drain away their resources. Of course, I do not want to believe that this is the case, because I also have my part to contribute. But it is unbelievable how effectively the various levels of government are helping Canadians develop this image.

At this time, perhaps a year before I leave this country, the news continues: physicians cheating OHIP; workers cheating on unemployment insurance; corporations engaging in dishonest or irresponsible policies; Quebec trying to assert its independence; the Inuits trying to assert their native land rights; students and their parents trying to squeeze themselves or their children into the professional schools, which however, must not be unduly expanded lest someone's interests are endangered; politicians accusing each other; dissatisfied youth engaging in increased criminal activities, the list goes on. Apparently in Canada, it is always other people who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demise of this group or that. Little wonder Canada will not make any headway in her multicultural policies. Little wonder Canada is going to have a rough time.



Since we began publication, THE CROSSROADS has adopted a policy of printing articles that are both pertinent to and explore the Asian American experience. We hope that THE CROSSROADS will continue to be an important outlet for this expression.

We welcome submissions by readers and authors who are interested in publishing in THE CROSSROADS. We also welcome the submission of photographs and slides for inclusion in future issues. All materials will be handled with great care and returned in its original condition. Please send material to THE CROSSROADS, 205 Dundas Street West, Suite C, Second Floor, Toronto, Ontario. M5G 1C8.

travels in the new world

(Second in a series)

WRITTEN BY LIANG CHI-CHAO
ENGLISH TRANSLATION BY
LEE WAI-MAN AND FRANK MOY

In British Columbia, there were also legal restrictions on the Chinese workers. In the past, upon entrance to the province, a tax of U.S. \$100 was imposed. Recently, this was increased to U.S. \$500, which amounted to more than a thousand dollars in Chinese currency. This law was proposed in the B.C. Legislature five years ago, though it was never adopted. This year it was proposed in the Canadian Parliament. It was passed on April 1, and effective January 1, 1904. From then on, one more door was closed overseas to the Chinese workers. How sad!

With the exception of South America and South East Asian Islands, almost all white colonies excluded Chinese workers. As far as I know, in terms of restrictive laws,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territories had signed treaties with China which severely prohibited the entrance of Chinese workers into its boundaries.

The New South Wales province of Australia levied a tax of a hundred pounds (equivalent to a thousand Chinese dollars).

The Victoria and Queensland provinces of Australia had a law which stipulated a ratio of one Chinese per 500 tons of cargo on board every ship. In the Western and Southern provinces of Australia, only those who demonstrated comprehension of more than 50 English sentences were allowed to land.

That was all before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All the provinces in Australia were then autonomous regions. Province A might allow a Chinese to land but he was not allowed to enter into province B. Since the confederation of Australia in January 1900, the six provinces became one. Those who already landed were permitted to travel freely between provinces. But since then, the immigration law towards the Chinese became even more restrictive. At present (1903), no Chinese is allowed in. A restriction more severe than the United States.

In New Zealand, a tax of 30 pounds was levied (which is equivalent to 300 Chinese dollars).

In the past, mobility of the Chinese workers was not restricted in Hawaii, Cuba and the Philippines. However, since their subjugation by the United States, the U.S. example was followed. Cuba recently gained her independence. Therefore, it would not have been difficult to negotiate with the new regime for the abolition of these restrictions. Unfortunately, one government ignored the opportunity and the chance was lost forever.

The white man dealt with the Chinese in two different ways: (1) Restrict the entrance of Chinese; but for those who were already resident within the country, the same laws applied equally to them as to other citizens; (2) Chinese were allowed the freedom to come and go, but there were particular laws which applied solely to them, apart from other local citizens. The first method was used in those places where white people constituted the majority, such as the U.S. and Australia. The second method was used in those places where the white people were the minority, such as the South-East Asian Islands, Annam (Vietnam), Siam (Thailand), etc. The purpose of this was to forbid equality with the Chinese.

The last time I was in Australia, I learnt that for the voyage there, it cost every Chinese worker seven to eight hundred dollars -- while the ticket on the ship itself was only around a hundred dollars. This huge discrepancy was due to the fact that in compliance with the tonnage law of Victoria and Queensland, only four to five Chinese could be carried on board every vessel. But there were 10 times more people who wanted to come, thus it was necessary to go on a waiting list. Sometimes a waiting period of five or six years produced little results and a situation of competition to bribe the staff of the ship was created.

If A paid three to four hundred dollars for a place; B would pay five to six hundred; C might then be willing to pay seven to eight hundred dollars. The final price might come to be seven or eight hundred dollars. This was similar to the buying of official titles i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 Westerner could travel first class for three hundred dollars, but we Chinese paid seven to eight hundred dollars for a third class ticket on the ship. Sad indeed!

Chinese who came to Australia aimed to go to New South Wales, (Sydney was the capital of New South Wales). However, it was not easy to pay the tax of over a thousand dollars. Most Chinese would therefore first go to Victoria or Queensland, then sneak into New South Wales through the borders of the two provinces. (the two provinces were adjacent to New South Wales).

This was known as 'to steal across the border'. Those who were caught, were taxed a hundred pounds, plus a fifty pound fine. Those who could not afford to pay were jailed for one year, then deported.

It was quite difficult to find jobs in Canada. The continual arrival of Chinese was motivated by the opportunity to enter into the U.S. secretly. Last year, over 5,000 Chinese landed in Victoria and Vancouver -- 60 to 70 per cent of whom then entered the U.S. The pattern occurred in other years.

There were some Chinese businessmen here in B.C. who specialized in smuggling people across the border. Over 200 U.S. dollars was charged for each person. The U.S. customs and American Consulate in Vancouver shared in the process. Today, a Chinese worker who intends to enter the U.S. through a detour (Canada) also needs seven to eight hundred dollars. Five hundred to enter Canada (Head Tax), another hundred for bribery, and just over a hundred for transportation. The fertile land in our homeland number in the tens of thousands of miles, yet her people were not fed. Driven out of the country, our people paid such a huge sum in order merely to secure a living overseas. Whose fault was this?

THE CHINESE EMPIRE REFORM ASSOCIATION IN B.C.

The sense of patriotism was strong in the Chinese which was the cause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overseas Chinese Empire Reform Associations. Since its founding in 1899, the association has been prospering. In Vancouver, 60 to 70 per cent of the Chinese there were members of the association. Over half in Victoria, while in New Westminster nearly everyone there joined.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association was efficient and regulated in detail. Speeches were given every week, a big joint meeting of all those cities was held annually. Several tens of thousands of dollars were collected to build the association's headquarters in Vancouver, which was comparable to a miniature government.



This year, the activities of the association steadily expanded. A system of election modelled on that of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was set up to elect a vice-president and an inspector (the president was appointed). One month prior to the election, each of the three cities (Victoria, Vancouver and New Westminster) announced two candidates for the posts. The election would be carried out by ballot simultaneously in all three cities. The result in each city was then announced to others by cable. The period before the election was marked by intense competition. Each candidate campaigned and gave speeches everywhere, espousing his own ideas and policies. This was comparable to the system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civilized countries, of which China had never seen the like for thousands of years. In the future, anyone who intends to compose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olitical parties must certainly begin here.

It happened that I arrived here four days before the election. According to the constitution, every member of the association was entitled to vote. There were over 6,000 eligible voters, only a thousand of whom voted. Many did not understand the preciousness of the right to vote -- a phenomenon pervasive in every country. It turned out that the first candidate received 671 votes and was elected as vice-president. Certainly the election next year will see a decrease of those eligible voters who failed to exercise their right.

The association's new headquarters began construction on March 26, 1903. According to Western custom, whenever a public building begins construction, a celebrity is usually invited to lay the cornerstone and deliver a speech in commemoration. The ceremony is known as laying the foundation with a cornerstone. Fellow comrades of the association took the opportunity of my stay and invited me to conduct the ceremony. During the ceremony, Chinese and Western spectators surrounded the site like a wall. I placed the cornerstone and delivered a speech afterwards, which was greeted by thunderous applause. This type of occasion, China also had never seen the likes of before.

TO BE CONTINUED....